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主流媒體中新聞專業的實踐與追尋：

以《中國時報》調查採訪室成員為例

The Process of Practicing Journalistic Profession in

Mainstream Media: A case study of China Times

葉冠妤

Yeh Kuan-Yu

指導教授：林麗雲 博士

陳順孝 副教授

Advisor: Lin Lih-Yun, Ph.D.

Chen Shun-Xiao, Associate Professor

中華民國 100 年 7 月

July, 2011

謝誌

2008年夏天，我在中國時報社會組實習。當時中時正經歷裁員變故，我的記者師傅，在這波調動中，丟了飯碗。那一刻，我從旁感受到即便是執春秋之筆、針砭時弊的無冕王，在資方面前，終究無法跳脫一名勞工的渺小與無奈。

發想這份論文之際，我將它想像成一種在困境中的尋覓出口、一種身為後備軍的自我救贖，更是一種對人生态業的致敬。於是，如何在媒體裡好好活著，如何讓筆下的報導別具意義，成了我書寫這份論文的初衷。

感謝這份論文的受訪者，也是我所敬愛的新聞前輩們：何榮幸、黃哲斌、高有智、郭石城、謝錦芳，是他們豐富的生命故事，成就了這份論文。感謝五位前輩的不吝分享，也感謝有他們在前方，化為指路的星星。

謝謝指導教授麗雲老師、阿孝老師，以及口試委員何旭初老師，在我漫長又拖磨的論文寫作過程，給予智識上的協助，當我迷失於雜沓的思緒中，替我撥開雲霧，並教育散漫的我何謂嚴謹的治學態度。尤其感謝麗雲老師的安撫與鼓勵(偶爾也帶有脅迫)，不曾放棄萎靡的我。

謝謝莊其穎，我們的生命情調如此不同，他卻總能梳理我的混亂，鎮靜我的躁動。謝謝台大新聞所R96的同學們，喪志的當下，這群優秀的同學讓我看見堅毅與勇氣，其中特別感謝尚儀、世函、淳予、雅娟、文政、乃綾、珮君、致中，在每一次酒足飯飽的聚會與嬉笑怒罵的哭笑中，消化我的焦慮。謝謝蕭民岳，在寫作後期扮演了苦海明燈的角色。

謝謝爸爸媽媽、哥哥嫂嫂們對我無盡的縱容與疼愛，讓我理解到唯有親情，是世上最純粹的愛。

最後，我將這份論文獻給自己。藉此提醒自己，永遠保有熱情，寬容，並且無所畏懼。

中文摘要

過往傳播研究多由巨觀脈絡檢視新聞產製與新聞工作者個人行為，認為分析組織行為模式更能解釋產製過程中的種種抉擇，近幾年不少研究則將焦點轉向新聞實作，從新聞工作者個人出發，更為突顯結構中的行動者主體。

本研究透過 Bourdieu 的場域(Field)概念，解釋分析台灣新聞場域的生成與變化軌跡，指認出新聞場域受制於社會空間的事實，並且賦予場域中行動者的能動性；並以生命史的研究取徑，由這五名主流媒體記者的專業意理、新聞實作與職涯路徑，觀看記者如何在組織與專業兩者間取捨、應對，以及他們如何藉由專業知識與社會資本的累積，建立一種王牌模式，在組織內換取自主的發展空間。

由於本研究關懷在於主流媒體記者，因此以《中國時報》調查採訪室五名記者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當代新聞工作者有必要轉換新聞價值，從解放政治轉向生活政治，而當個人迂迴零星式的突圍方案已不敷使用，若能以團隊為單位，善用團隊記者各自的專業才能，集結資源，共同創造報導價值，不只增加與組織協商的籌碼，也能適度減低記者個人與組織的互動風險，以一種正規、積極的方式追尋新聞專業自主。

關鍵詞：主流媒體、新聞自主、場域、專業意理、生命史

Abstrac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used to study the news production and journalist's individual behavior in a macro context, which they think better expla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es. Recently, there is a turn to shift the focus from the macro context to the agent in it and their practice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journalistic field in Taiwan by Bourdieu's Field theory, emphasizing on the social space as well as the agent in it. Using the life history and narrative research approaches, the thesis seeks to examine how the journalists reconcile their professional ideology with the media's requirement, and find out how they struggle for autonomy by exploiting their social capital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his thesis is a case study of the five journalists in China Times, who work in the 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According the study, nowadays the journalists should change their focus from emancipatory politics to life politics. Moreover, from the case study of 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journalists who work as a team are able to organize resources in a more efficient way and reduce the risk when interact with the organization, which is a formal and positive way to pursue professionalism and autonomy.

Keywords: Mainstream media, Editorial autonomy, Field, Professional ideology, Life history

目 錄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誌謝.....	ii
中文摘要.....	iii
英文摘要.....	iv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 問題意識與研究問題.....	5
第二章 文獻探討.....	9
第一節 分析途徑：場域理論.....	10
第二節 新聞專業意理與自主.....	15
第三節 記者與組織互動的資源與策略.....	21
第三章 研究方法.....	28
第一節 研究取徑：生命史.....	28
第二節 研究方法：敘事分析.....	32
第三節 研究範圍的界定.....	36
第四章 研究詮釋：記者圖像.....	41
第一節 何榮幸的職涯圖像.....	42
第二節 高有智的職涯圖像.....	58

第三節 郭石城的職涯圖像.....	66
第四節 謝錦芳的職涯圖像.....	75
第五節 黃哲斌的職涯圖像.....	81
第六節 調查採訪室.....	93
第五章 研究分析.....	110
第一節 行動場域.....	111
第二節 行動者的生存心態與資本.....	116
第三節 當五人同在調查採訪室.....	125
第六章 結論：當行動者集結歸來.....	130
第一節 研究結果與討論.....	130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134
參考文獻.....	136
附錄一：訪談題綱.....	144
附錄二：訪談時間與地點.....	146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研究背景

2009 年元月開始的每周六，《中國時報》固定刊登〈我的小革命〉專題，報導內容多是介紹台灣社會各個角落的生命故事，看似平凡無奇的人物報導，卻從聳動的政治口水、八卦謠聞與社會案件新聞的夾殺中勝出，每周末固定刊登於《中國時報》第一落的精華版面。

〈我的小革命〉報導，有別於以往將媒體聚光燈打在社會聞人、名流身上，反倒是轉而照亮了一群在各自領域以具體行動顛覆傳統觀念、挑戰主流思維的「小人物」，藉由每一位報導人物的日常生活，看見他們的理念、實踐方法與歷程，報導主題涵蓋了人權救援、公民行動獨立媒體、環境保護、微型趨勢、網絡力量、社區或公民行動、災區重建、獨立音樂創作、移工／民運動等。

隨著專題篇數的累積，2009 年年底，第一本《我的小革命：相信夢想，相信自己內在的力量》出版，該書登上了博客來網路書店「人文科普」類暢銷排行榜，更獲得 2009 年中時開卷好書獎；2011 年小革命專題一口氣出了兩本「續集」，分別為《我的小革命：顛覆主流》與《我的小革命：永續生活》，策劃、執行小革命專題的單位—《中國時報》調查採訪室，也因而受到關注。

(一)危涯有花：調查採訪室

調查採訪室成立於 2008 年八月，在《中國時報》內為獨立編制的單位，專門負責深度專題報導。

2008 年六月，《中國時報》全面裁撤地方中心以及社內一半員工，並轉型精英報，試圖在報業市場重新定位，走出一條非蘋果化的路，時任總編輯的王健壯

與政經中心主任的夏珍，於是臨危受命時任政治組主任的何榮幸成立新單位—調查採訪室，目的是讓《中國時報》走入分眾市場，做出有區別於其他報紙的「質感」報導。

乍看之下，調查採訪室的成立乃時勢的產物，但其實調查報導在《中國時報》已行之有年，過往《中國時報》就曾在楊照、林照真、楊索等人的帶領下多次設置深度報導的單位，2005 年中時更一度成立「調查部」，並將組織層級拉高和採訪組平行(林照真，2006)，但因固定版面維持不易，深度報導與路線記者相互踩線、領域劃界不明，或是淪為例行式作業，最終都以裁撤收場。

之所以在報社動盪時刻反向操作，重新設立過去屢遭裁撤的單位，緣由可追溯至 2005 年，當時以何榮幸為首的政治組記者群製作了〈體檢公共建設〉、〈休耕啟示錄〉深度報導，連續榮獲吳舜文新聞獎及卓越新聞獎¹，何榮幸因此趁勢呼籲恢復執行深度報導的單位，只是礙於過去經驗，中時內部傾向以機動式編制進行調查報導。最後卻意外地在報社變動時刻下成立調查報導單位，於是「廢墟開出一朵花，亂世守護一畝田」便成了《中國時報》調查採訪室陣痛催生下的寫照，以及其肩負的存在意義(何榮幸，2009)。

調查採訪室成立後不久，走出大裁員風暴的《中國時報》又捲入了易主的漩渦，傳聞沸沸揚揚到 2008 年歲末終於底定，由余家一手打造的時報王國轉而由旺旺集團董事長蔡衍明掌管。

據《今周刊》第 622 期報導指出，蔡衍明強勢干預報社新聞走向，對報社內部發表全力擁護馬英九總統、化解兩岸人民誤會、所有新聞皆無關統獨的三大指令，讓披上旺旺招牌的《中國時報》在其新聞專業自主表現上顯得備受控制，組織文化不若以往自由，再加上媒體產業環境的萎靡緊縮，改版、易主後中時雖然財務狀況看似好轉，但當商業力量左右了新聞內容，新聞記者的專業自主與勞動條件仍遭限縮。調查採訪室五名成員是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下，策劃出〈名人家族

¹ 2006 年，由何榮幸帶領的中國時報國會小組記者所製作的《體檢公共建設》專題獲第十九屆吳舜文新聞獎「新聞深度報導獎」；《休耕啟示錄》專題獲第四屆卓越新聞獎「新聞採訪報導獎」。何榮幸本人則在 2005 年以《追尋媒體公共化願景》獲第三十一屆曾虛白新聞獎「報紙評論獎」。

故事〉、〈我的小革命〉、〈民國九九、台灣久久〉、〈消失與重生〉等系列專題報導。

以已經集結出了三本書的〈我的小革命〉專題為例，調查採訪室之所以選定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為報導對象，是期許藉由報導故事主人及其精神、作為，在紛亂不堪的社會中鑿出一道光，帶給人明亮希望，並將這些美好的價值，一點一滴匯聚成集體趨勢，成為社會關注的潮流。

這同時也對應了這五名調查採訪室的記者。在組織處於變動時刻，前景一片茫然之際，五個記者分別由財經組、政治組、地方特派、中時電子報匯集至此，共同激盪出具有多元價值的新聞題材，並獲得台北市新聞記者公會九十八年度社會光明面新聞報導獎以及九十九年度吳舜文新聞獎文化專題獎，他們或許就如同〈我的小革命〉裡的報導人物一般，不只提供理念想法，而是付諸行動身體力行，在不知還能存活多久的高度不確定氣氛中，懷抱「最後一戰」的心情攜手前進。

二、研究動機：從調查採訪室看突圍的如何可能

1988 年報禁解除後，解構了台灣的報業生態，辦報的狂飆時代來臨，各式各樣的報刊如雨後春筍冒出，在市場上立足已久的舊報張數也大幅增加，報業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景況；直至 90 年代中期，因經濟不景氣加上電子媒體興起，報紙發行量急速下跌，廣告量遭到擠壓，報業因而式微(王天濱，2002)。之後，隨著一家家 24 小時全天候放送的新聞台開台，以及壹傳媒的成功搶灘，台灣媒體市場的形構與邏輯再次轉變，以閱報率／收視率機制建構出一套新的媒體經營學。

為了因應市場的嚴重萎縮，報紙開始尋求特定政治立場的讀者來穩定發行量，於是主要的傳統大報將藍綠區隔與市場區隔緊緊捆在一塊，各家媒體也紛紛因收視率／閱報率／廣告量至上原則及惡性市場競爭，養成了「零碎化」、「躁進」、「去政治化」的新聞實務模式。因此，即便脫離了解嚴時代的權威管制，台

灣媒體產業卻進入了市場導向新聞學(Market-driven Journalism)的混戰時期。因此，當代新聞工作者的課題，除了應付市場的激烈競爭之外，還必須面對廣告主、公關操縱、置入性行銷無所不用其極地入侵。

而這五個各自擁有不同路線專業與新聞閱歷的記者，被調查採訪室主任何榮幸稱為「武功派別截然不同」的「史上最強先發陣容」(何榮幸，2009，頁 6)，於煽色腥與政經報導的主流報導中逆勢操作，關注一些社會角落的小敘事，並抵禦置入性行銷等商業力的左右，積極地運用有限的版面、時間和經費，製作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聞報導。這不禁令人想問，究竟需要具備何種條件才能在主流媒體內另闢蹊徑，追尋新聞專業自主？

五個人之中，除了主跑政治線，對原住民、環境與農業議題多有關注的高有智²外，其他四人在進入調查採訪室之前，在各自的路線上經營皆逼近 20 年，已累積了不少專業資歷：

擔任調查採訪室主任的何榮幸，自 1991 年踏入新聞界不久後便投入媒體改革運動³，並擔任第一屆台灣記者協會長，資歷從《自由時報》市政組組長、《中國時報》政治組主任，到現在的中時副總編輯兼採訪中心副主任與調查採訪室主任，其新聞作品曾榮獲曾虛白、吳舜文與卓越新聞獎。

來自《中時電子報》的黃哲斌，1994 年考進《中國時報》前，做過蘭陵劇坊演員、影響電影雜誌總編輯，進中時後任臺南市地方記者、社會組記者、政治版編輯、台北之音新聞部主任，之後在《中時電子報》擔任副總編輯，開展了八年的網路生涯。當過財經組主任的謝錦芳，先後主跑市政、財經新聞；而中時大裁員改組後才從桃園地方特派調回總社的郭石城，主跑過農業產經與社會司法新聞。

何榮幸(2006)曾在《媒體突圍》書中交代每一篇得獎作品的產製流程，並將

² 高有智於 2002 年入《中國時報》，在政治組參與了《體檢公共建設》、《休耕啟示錄》專題，獲第十九屆吳舜文新聞獎與第四屆卓越新聞獎。

³ 1994 年自立事件發生，何榮幸投入九〇一遊行與成立台灣記者協會等新聞記者自主運動；2000 年加入「無線電視民主化聯盟」擔任執委；2007 年擔任媒改社諮詢委員。

報導產製過程所遭遇的瓶頸與應對方式攤在讀者眼前，其中最精采的莫過於其與報社對於專題刊登時間以及版面位置的拉鋸戰，一場「中國熊貓 vs.台灣老農的戰爭」點出了記者與編輯台對新聞價值的認知差異，以及當唯有記者主動出聲向高層表達意見時，才可能得到報社高層的回應，進而取得一個讓雙方都能接受的折衷方案。這一段小插曲附和了何榮幸自己所言，「新聞自由、媒體專業自主不可能從天而降，必須依靠新聞工作者長期爭取才能獲得」，吳佩玲(2005)研究地方記者反抗策略時也曾下此結論：新聞工作者的自主權絕不是「天賦人權」，是要靠自覺、努力爭取、施展反抗策略才生成的。

鍾宣杰(2006)也提到，媒體改革不應該只是朝「改革媒體機構與組織」的方向思考，而是要嘗試從「媒體從業者」的改革上著力；林照真(2006)在《記者，你為什麼不反叛》一書中的自序中更講出個人期盼，欲解救即將斷裂的新聞生命，不該僅關注在大面相的政治經濟改革，該寄託在記者「個人自由意志」的解放，她認為媒體改造的主動權，應放在新聞記者身上，而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在媒體內好好「活著」。

然而，如何活，甚至如何「好好」活著，卻是一個大哉問。這群堅持在《中國時報》內奮戰的記者們，是如何在一次次突圍的行動中存活下來？本文將從他們跨入新聞界以來的職涯軌跡尋求答案。

第二節 問題意識與研究問題

過去關於傳播產製端的研究，從 White(1950)的守門人理論(Gatekeeper)、Breed(1955)提出新聞室的社會控制，到 Tuchman(1978)新聞網(News net)的概念，皆從新聞組織內部去分析新聞生產，並強調新聞產製流程及記者的專業意理，乃是來自於組織文化的例行化需求。此觀點就如 Merton(1968)所指出，當個人行為

受到某種組織力量的規範時，不同的動機可以表現出同樣的行為，Merton 因此認為分析組織行為模式比起分析個人行為更能正確地解釋新聞產製。

台灣相關的研究主題如外部環境如何影響記者的個人勞動條件、媒體科層組織在工作場域中對記者的壓迫、生產政治如何使記者自願順服、記者面臨職場上的困境如何調適、抵抗等(楊秀娟，1989；蕭蘋，1989；蔡佩琳，1990；楊志弘，1991；陳雪慧，1993；陳雅琳，1994；陳科佃，1995；劉智慧，1996)，也都顯示出一種由上而下、由巨觀脈絡檢視新聞產製與新聞工作者個人行為的視角。

然而，Touraine(1984)指出，研究者越是探究社會結構與條件，就越容易忽略各種行動者的角色，因而使行動者被視為依其在某種社會系統中所處的位置，反而使得行動者個人之影響與主體性被隱沒再分析巨觀條件的研究之中；Cottle(2003)更指出以機構組織觀點出發的新聞產製研究取向，有著組織功能主義(Organizational functionalism)的傾向，新聞工作者的能動性(agency)與實作(practice)在其中消失蹤影，因此 Cottle 主張將焦點從媒介組織轉移至新聞實作上。

直至近幾年，台灣才有關注組織內新聞工作者的能動性與實作的相關研究，並發現新聞工作者在報社科層組織的瑕疪、規訓權力的矛盾下，各自採取自我順服或正面、迂迴的個人抵抗(陸燕玲，2002；陳順孝，2003；林韋任，2003；吳佩玲，2005；蔡莞瑩，2007；張文強，2009)。如陳順孝(2003)分析在報老闆在和社會政經勢力互動下行使的權力形式下，新聞室內仍有許多模糊地帶和折衝空間，指出老闆與記者非絕對對立，記者在面對通案或個人時，也能以避實擊虛、迂迴轉進或集體抗爭的策略來應對；張文強(2009)也提到，抗拒不應該被化約成諸如革命等正面衝突行為，利用平民抗拒策略也是一種工作者能動性的展現。

但過往研究中的新聞工作者，雖在面對組織控制時能發展出一套隱微、消極的抵抗策略，但時常也只是流於紓解心理不自主感受的層次，並非設法在妥協基礎上，以行動交換實質主體性空間，也就是說，這些新聞工作者的抵抗僅朝向基本能動性的維護而已(張文強，2009)。而本文關注的便是在採取隱微抵抗策略以

外，還能以一種正規路線在組織中爭取主體實踐與能見度的新聞工作者，試圖在組織權力越漸綿密散佈之下，尋找一種積極超越的可能性。

不過，在探索正規抵抗路線的同時，本文並未忽略所有的新聞工作者都是在特定社會條件的形塑以及既有的生產結構的限制下，發揮其能動性。採取正規抵抗路線的新聞工作者，之所以擁有相對較高的自主權與實踐的能動性，是因為他們在新聞場域中各自擁有不同的位置與條件，受權力結構的限制與施壓的程度不一，因而得以採取不同的抵抗策略。簡言之，新聞工作者因其資歷、聲望等專業上的累積，呈現出程度不一的專業自主權（舒嘉興，2003；黃順星，2008）。

黃順星（2008）便援用皮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場域理論（Field Theory）分析台灣政治新聞記者的想像與實作，場域理論闡述了外在場域或社會空間的型態，決定新聞工作者進入新聞場域時所欲爭奪或積累的資本類型，但新聞工作者也會因進入場域的不同時間，產生殊異的生存心態⁴（habitus），並在一定的條件限制下，憑藉其所掌握的資本（capital）而產出不同競爭策略與實作。由此可知，新聞生產場域是一個結構化的動態過程，新聞工作者的生存心態、專業表現與生產結果會回過頭來形塑其生產條件，並連帶影響到新聞工作者在所處場域的位置。

而過去也曾有研究指出大牌記者猶如當紅明星，其擁有的資源與自主化程度與人微言輕的小記者不可同日而語（Breed, 1955），但未曾有實證研究具象描繪出這些大牌記者如何成為所謂的大牌記者，又如何動用其資源，展現其自主性。

因此，本文認為應進一步關注在社會環境與組織權力結構下，這群在主流媒體內的記者擁有哪些不同的資本與條件，如何在新聞場域中形塑出屬於自己的職涯軌道，發展出不同的生存策略，並在與組織的互動、抵抗間，一步步拓展自己的專業自主空間。基於此理由，本文向 Bourdieu 的「場域」概念借鏡，以更清楚地指認出新聞場域受制於社會空間的事實，賦予場域中行動者的能動性，並且具像化地呈現出新聞場域內記者的行動輪廓。

⁴ Habitus 有不同譯法，有些人將其翻成「慣習」、「習性」、「習癖」，本文依照高宣揚（2002）所著的《布爾迪厄》，將其譯為「生存心態」。

又由於本文感興趣的是即使在惡劣的傳播生態與記者汙名⁵下，依舊獻身於新聞事業的記者們，這些人除了有自己對「新聞」的想像與堅持外，並且選擇留在主流媒體裡頭，積極地實踐工作者的專業自主與能動力。究竟是甚麼樣的核心理念讓這些人選擇在主流媒體內另尋方法，實現其專業自主？又是什麼原因與條件支撐這些人在新聞場域中擁有專業自主權？是以《中國時報》調查採訪室的五名記者為研究對象，提出三組主要的研究問題：

一、《中國時報》調查採訪室的五名記者，進入新聞場域的背景分別為何？其專業意理為何？

二、這些記者在各自的條件限制下，如何累積、掌握資本，並發展出自己與組織的一套互動策略？

三、進入調查採訪室之後，如何繼續實踐新聞專業與意理？如何以集體為單位與組織互動？

而因為人的理念與實踐並非單獨存在社會裡，是在個人生命經歷當中，不斷與社會各種政經文化結構互動下形成(蔡士敏，2008)，是故，本文將採生命史的研究取徑，讓研究關懷回歸到行動者身上，關照記者的主體能動性，從記者的個人生命歷程(life course)與實踐，做為探討上述問題的研究主體，藉由當時的社會情境、媒體場域與記者個人生命/採訪經歷，試圖理解這些人在特定的歷史脈絡與新聞場域中，在行動中如何逐步養成其專業意理及文化資本，作為讓自己「活」在新聞界的養分與動能。也唯有經由對個人的時空定位，了解其和歷史與社會脈絡因素的互動關係，才可能知道行動者面臨的限制與可能出路(王麗雲，2000)。

⁵ 2002年《天下雜誌》報導，指出台灣民眾認為聳動的新聞報導是排名第二的社會危機，除了政府當局，媒體亦是社會亂象的製造源頭；2007年台灣師大公布的民意調查中，媒體更以三成二的比例，高居民眾心中社會亂源的第一名(黃順星，2008)。

第二章 文獻探討

誠如第一章所提及，本文的研究問題有三組：一、《中國時報》調查採訪室的五名記者，進入新聞場域的背景分別為何？其專業意理為何？二、這些記者在各自的條件限制下，如何累積、掌握資本，並發展出自己與組織的一套互動策略？三、進入調查採訪室之後，如何繼續實踐新聞專業與意理？如何以集體為單位與組織互動？而本文的研究目的是理解在主流媒體內持續實踐新聞專業意理的記者，如何在與組織的往來互動中一邊累積自己的資本，一邊發展出積極、正規的抵抗策略。

因 Bourdieu 的場域理論強調場域自身的運作邏輯與行動主體(即新聞記者)能動性的同時，也關注到場域外部的權力制約關係，得以跳脫過往研究裡行動與結構二元對立的觀點，進而提供一個動態且細微的視角(Garnham&Williams, 1992[1980])，讓研究者分析行動者的行動時，有一套具體兼顧行動者自我選擇與社會影響的思考工具(張錦華，2002；邱鈺婷，2006)。因此本文第一節以 Bourdieu 場域理論為分析架構，企圖補足以往新聞工作者研究缺乏主體能動性的分析缺漏，並且具像化與動態地呈現出新聞場域內記者的行動輪廓。

而在 Bourdieu 的場域理論，「生存心態」構成了行動者對社會的看法，以及對事物的觀點，因此在新聞場域中，生存心態便成為新聞工作者的專業意理，影響工作者的新聞表現，是以本文第二節進而探討新聞專業意理的內涵。第三節則爬梳過往對於新聞工作者個人抵抗策略的相關研究。

第一節 分析途徑：場域理論

由於 Bourdieu 主張人的實作、物質環境的建構以及意義系統的生成乃是互相確認的，對社會研究乃至社會知識的形成，這三者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新聞記者做為一個社會世界中的行動者(agent)，應如 Bourdieu 所觀察到的是處在受到各競爭勢力相互牽引的場域(champs)之中，行動者是在一定的條件限制下，憑藉各個行動者的生存心態(habitus)及其所掌握的資本(capital)而有不同的實作，繼而複製或改變其所生存的場域(黃順星，2008)。簡單而言就是，行動者除了受到自己生存心態的影響外，亦受到其所涉及的場域位置所影響，而這個位置是由行動者所擁有的資本數量與結構所決定的。

因此以下便從 Bourdieu 場域理論的三個概念—「場域」、「生存心態」與「資本」，揭示行動者在場域中的行動。

一、 場域(Champs)

Bourdieu 認為「社會」是一個空洞的概念，無法具體分析人們生活其中的社會世界，因此才提出「社會空間」和「場域」的概念取代「社會」，以社會空間指涉社會世界的整體概念，認為社會空間是由不同的場域所組成(Bourdieu&Wacquant,1992)。在 Bourdieu 看來，社會結構並非是抽象的，而是由行動者在不同場域中進行象徵性實踐的社會空間，它永遠是和從事象徵性實踐的行動者的生存心態、和行動者在權力鬥爭和較量中的各種不同類型的社會實踐緊密相聯繫 (高宣揚，2002)。

因此 Bourdieu(1986)將場域比喻為一種遊戲，是鬥爭和策略運用的地方，但遊戲的前提是參與者必須認同遊戲規則，並認為此遊戲是「重要的活動」，付出努力；而生存心態、資本總量與結構則決定了遊戲的型態與成敗。在既有遊戲條件下，行動者各自利用資本採取策略，而資本的類型與數量便決定了行動者在場

域內所能佔據的位置以及與他人的相關（合作與競爭）關係，而場域在此也同時作為提供各種資本相互競爭、比較和轉換的場所，身處其中的行動者透過彼此相互競爭，以建立有效資本的壟斷地位與規定場域中各種權威形式的層級與轉換率，特定形式的資本轉換率亦會形塑場域本身的運作邏輯。

除此之外，Bourdieu 認為場域裡存在各式各樣的關係，這些關係是「獨立於個人意識和意志」而存在的客體關係，就像地心引力一樣，無聲無息必卻強加作用於行動者身上。也就是說，場域就像是在某一社會空間中，由行動者之間的相互關係與各種客觀關係所構成的網絡，它沒有嚴格的劃分邊界，場域間相互有機地聯繫起來，並具有滲透性，又由於這種相互滲透性，場域除了自身的運作邏輯外，同時也受到外在社會空間與權力場域的影響，兼具了自律性與他律性的特性 (Bourdieu&Wacquant, 1992)。

二、行動者在場域內的位置

(一)生存心態(habitus)：一套持久的秉性(disposition)⁶系統

在一場社會遊戲中，行動者固然主動參與遊戲，卻是根據內化的遊戲規則來應對，這套內化的遊戲認知與規則即是 Bourdieu 解釋個人實踐和社會結構之間的關鍵概念：生存心態。

Bourdieu(1990)將生存心態定義為一套「持久的預設及原則」，既能再製既有客觀結構的規則，也能根據情境的潛在需求有所調適轉換。換言之，生存心態是作為社會結構與實際行動之間的媒介，其功能是提供基礎架構、一種製造策略的

⁶ 依舒嘉興(2001)的解釋，秉性(disposition)系統是一種在社會各個不同階層行動者的日常行為當中，一種經由環境而形成或被加以塑造的行為傾向系統。關於秉性系統，Bourdieu 提出了八種解釋(轉引自舒嘉興，2001：24)：

1. 秉性的特質表現在個人所擁有的階級，與他人跟外在世界保持著客觀的距離
2. 秉性是存在於相同階級的社會制約中，所呈現出的行為表現
3. 秉性也是在社會環境內展現其所佔據的優勢地位
4. 秉性具有隱性轉移的功能以及穿透的能力，可以引起社會的共振現象
5. 為了造就有利的生存條件，秉性可以在既定的時空條件下跟各種社會特質加以統合或分割
6. 秉性強烈地否定社會其他的喜好特質
7. 秉性所擁有的一切特質都具有非理性，類似於暴力的特質傾向
8. 秉性壟斷或阻止其他社會特質的擴張與冒犯

原則，整合過去經驗、認知、領悟與行動，作為行動者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行動與反應的導向。

舒嘉興(2001)則解釋生存心態為在社會各個不同階層的活動者的日常行為當中，一種經由環境而形成或被加以塑造的行為傾向系統，它同時是透過歷史與社會環境的脈絡而支配或被支配的行為體系。也就是說，生存心態一方面是行動者既成的行為習慣(已結構)，同時也受到社會環境變遷所改變(被結構)，並非固定不變的行為體系。然而，生存心態雖是一套持久的秉性系統，但這些秉性並非有意識地被行動者所論及，而行動者也無須意識其影響，它們就會簡單地呈現在行動者的行為中。

不過，Bourdieu(1984)並不認為在生存心態影響行動者的過程中，個人是全然被動的，他認為行動者仍具有主體性，並以「秀異」(distinction)⁷方式不被同化，理性地追求場域中的最大利益。而在追求的同時，除了依據生存心態，也會運用資本，採取各種實踐方式。所以，必須去細究到底在相貌各異的行動者身上，到底存在哪些相近或相異的生存心態而促使了不同的新聞實作，而這些不同的實作邏輯背後又隱藏了哪些不同類型的利益與資本形式。

(二)資本(capital)：行動者所擁有的資源

在場域中，行動者所擁有的資源即為「資本」。資本是 Bourdieu 建構其場域的動力邏輯，是權力的來源，也是鬥爭的標的；他認為，社會空間是由許多不同場域的存在而結構化，都是為了持續占有特定的資本而鬥爭，而先前所攫獲的資本往往決定下一次鬥爭的成敗(邱天助，2002)。

Bourdieu 以經濟學的「資本」概念來具體描述行動者所擁有的不同形式的資本，而這些資本具有投資、積累、轉移與轉換的特質，行動者亦可透過這些資本維持或改善自身在場域內的位置(Bonnewitz，1997／孫智綺譯，2002)。

⁷ 在行動者利用有形、無形的資本爭奪場域中的優勢利益時，也會在場域中建立自己的秀異符號，讓自己的差異性在與他人的比較中凸顯出來。

在社會空間中眾多的場域，就像市場一樣，所有涉入其中的行動者，進行著多重多樣的「特殊資本」的競爭，以及其他依據其階級地位與家庭座標而擁有的各項資本。雖然所有的資本皆以經濟資本為根基，但資本的最大效力是彼此的轉換，進而發揮功能，卻不能完全取代，因此其分配結構也決定了該場域的動力關係(高宣揚，2002；邱天助，2002；黃義書，2004；邱鈺婷，2006)。

而 Bourdieu(1986)在此提出的「特殊資本」可分為以下四種型態：

1. **經濟資本：**

由不同生產要素(土地、工廠、工作)及經濟財貨(收入、遺產、物質財產)所構成。經濟資本可以立即的、直接的轉換成金錢，而且可以財產權的形式予以制度化。

2. **文化資本：**

是一種掌握創造、轉化使用文化資訊能力的資本。它以各種不同的型態顯現出來，主要可分為三種形式：(1)內化形式—在行動者身上長期、穩定地內化了的才能與秉性系統；(2)客觀形式—被實體化或客體化的文化財產，如襯托身分的名畫作品；(3)制度化形式—由合法化機構或制度所確認的學歷與頭銜。在某種情況下，文化資本可以轉換成經濟資本，而且可以教育資歷的形式予以制度化。

3. **社會資本：**

指行動者發展出的社會關係網絡，能提供行動者資源或財富。因此，社會資本是由個人或團體所擁有的社會關係所組成，是實際上或潛在性資源的聚合。在某種條件下，社會資本可轉換成經濟資本，而且可以崇高頭銜的形式予以制度化。

4. **象徵資本：**

指名望及認可的資本，包括榮耀、名譽與聲名。象徵資本是對其他三種資本之擁有的認可所帶來的信用及權威，因其使用的脈絡而有不同的詮釋。

當個人擁有這種象徵資本，且被確認為具有正當性時，就可轉化成顯貴的象徵，更可以轉化為各種資本(Bourdieu&Wacquant，1992)。

三、在不同場域位置中產出不同實作

Bourdieu 視人類行動與客觀結構之間的關係是持續辯證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個人的抱負和實際行為會不斷的調適，經由與客觀結構的互動，生存心態也就不斷地改變。因而 Bourdieu 以生存心態與場域之間的結構關係取代結構與行動力的糾結，他認為有一個結構統轄著日常生活的實際行為，而個人行為會受到因生存的客觀結構所孕育而成的生存心態以及所擁有的資本所影響，並依其在場域中的位置而定。其公式如下(邱天助，2002)：

$$[(\text{生存心態})(\text{資本})] + \text{場域} = \text{實際行為}$$

$$[(\text{habitus})(\text{capital})] + \text{champ} = \text{pratique}$$



綜合而言，Bourdieu 場域理論欲表達的是：各個行動者所擁有的資本組合與總量，與這些行動者在場域裡所佔據的位置，有相互影響和相互決定的辯證關係。一方面，各個行動者的資本是由其歷史的和現有的場域位置所決定；另一方面，各行動者的資本又反過來決定各個行動者在場域位置的高低和強弱(高宣揚，2002)。

因此，場域內的行動者會根據他們所處的位置空間採取實踐策略。例如，在場域中佔有優勢地位的人會用某些策略來鞏固他們在場域中的位置，進而把對他們最有利的資本價值與分配的等級化原則，強加於其他行動者身上。而在場域中的被支配者，有的汲汲營營爭取具有較高價值的資本，以改善他們在場域中的位置；有的則漠視這些資本與場域的規則，遊走場域的邊緣；有的則積極研擬策略，

善用現有的資本去顛覆支配者所定義的等級化原則，改變場域結構(古淑薰，2004)。

所以，場域裡的行動者一方面有自主性，能根據其本身的資本組合而發揮不同程度的能動性，採取各種不同的積極作為以改變場域內的權力關係；但另一方面，他們的行為卻又是在場域結構的支配關係下所做的思考與實踐，他們的自主性是有限制，而非全然自主(Bourdieu, 1990[1980])。但儘管如此，以場域理論分析新聞場域中的行動者，仍具有以下二項優點：

1. Bourdieu 的場域分析重視社會權力脈絡下行動者的實踐，使我們瞭解到不同位置的行動者的實踐策略與競爭的過程。一方面，資本和資源較占優勢的行動者，必須極力鞏固傳播管道以及其他「政治正當性」的象徵利益，同時也必須極力爭取新聞場域內的鑑賞標準與合法性。另一方面，其他的行動者或新進人員，不論有意或無意，皆會受到之前的行動者在作品風格、特定流派的師承或位置攫取策略等等因素的影響或制約。
2. Bourdieu 的場域理論強調社會體系中結構與行動有相互影響辯證的關係。行動者雖然會受到特定權力場域的壓力與限制，但仍有相對自主性。行動者能根據他們所處的位置進行思考與判斷，選擇最有利的實踐形式與生存路線；經由行動者的實踐，新的結構可能成形。

第二節 新聞專業意理與自主

生存心態的概念，轉化至新聞場域即表現為新聞工作者的「新聞專業意理」。而李金銓(2005)認為，所謂新聞專業意理是指作為「專業人員」(professionals)的記者，經過長時期培養出來的價值系統，內化成為其日常新聞製作的一種指引，並據以採取行動。

一、新聞專業意理的內涵與分類

專業意理的內涵包括了記者對於媒介功能及記者角色的「信念系統」(belief systems)，以探討「記者的專業價值」(the professional values of newsmen)和「記者責任」(journalistic responsibility)為主(蕭蘋，1989)。

Cohen(1963)區分出記者對自我角色的兩種看法，一是中立報導者(neutral reporter)，另一個是參與者(participant)。前者是將報業視為資訊告知者、詮釋者和管理工具，並且認為媒體是反映社會真實的一面鏡子；後者有著「第四權」(fourth estate)的內涵，視報業為大眾的代表者、政府的批評者，或政策與政策制定者的擁護者。

Weaver&Wilhoit(1986)則將記者角色再細分為「資訊傳佈者」(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role)、「解釋者」(interpretative role)、「對立者」(adversary role)。其中「資訊傳佈者」的基本理念是在民主社會中讓民眾自己作決定，強調客觀，認為記者的目的是要傳達事實給閱聽人，故新聞報導必須呈現純粹的事實，排除個人對事件的價值判斷。

「解釋者」則認為加入記者個人的詮釋，才能顯出新聞的重要性，不過，雖然解釋者的記者角色會陳述個人意見，但並不是將自己的意見強加給讀者(Weaver&Wilhoit, 1986)。解釋者的記者角色相當於 Johnstone et al.(1976)提出的「參與者」(the participant)，認為媒介的主要任務就是守望環境及連繫環境的各個部門，記者角色不僅是「呈現真實」而已，還要竭盡所能地尋求相關的新聞，做深入的報導，故關連性(relevance)才是記者追求的主要新聞價值。

而「對立者」記者角色強調的是解釋者較沒有的介入、參與過程，這類型記者有意藉由新聞報導，或是主動介入來影響政策結果，因此也被稱為「行動的促動者」(蕭蘋，1989；蔡士敏，2008)。對立者除了和解釋者一樣分析、揭露事實之外，還會主動參與政策決定的過程，這是它和解釋者最大的不同之處。而其

主動參與方式有兩種，一種是「政策的鼓吹者」(advocate of policy)，用報導來表達對某一政策的支持或反對，以達到影響政府或公共部門的效果。另一種是「政府的批評者」或「對立者」(critic or adversary of government)，這樣的角色意味著他們是站在政府的對立面，自詡代表公眾，監督政府的決策、呈現政府未完成的事務給人民知道。對他們而言，記者不應只是旁觀者，還應該是人民的保護者，新聞報導也不只是一種工作，還是一種使命感(楊志弘，1991)。

二、中國脈絡下的新聞專業意理

以上所回顧新聞專業意理，立基於西方脈絡下的研究基礎。而本文所探討的新聞工作者，他們的新聞理念不僅是西方學理分類上的中立／鼓吹，更可回頭追溯至華人社會裡的記者角色傳承。換言之，探討中國脈絡下的記者專業意理發展，除了能補充記者專業意理的理論內涵之外，更可據此深入分析本文研究對象的特質。

西方新聞專業主義在歷史上是市場經濟興盛下的產物，在追求利潤的過程中形成多元報導的風格，進而衍生出不同的記者角色觀。相較之下，在中國新聞史上，清朝光緒以前的新聞事業在中國不受重視，且多為落拓失意文人所從事，新聞工作以及記者這一行，一開始並不為中國社會所重視，甚至多以鄙夷的態度視之。直到光緒中葉後新式人才陸續歸國，知識份子開始藉由報章鼓吹變法或革命，以及 1905 年(清光緒 31 年)廢除科舉，傳統士人失去晉升仕途的主要管道後，新聞事業才有「產生脫胎換骨之轉變，影響政治之鼎革，與社會之變遷，至是發揮功能，使國人對之作截然不同之評價。」(賴光臨，1980；黃順星，2008)。

其後由《大公報》張季鸞所揭橥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四項原則，將報刊視之為公共論壇並充當社會各階層間輿論的橋樑，及至對國是發揮顯而易見的影響，更被引以為現代中國文人論政的典範。因此，早期的中國報業，有士人報刊之稱，結合了中國知識份子傳統及現代知識份子精神，形成一種鮮明的文

人論政風格(李金銓，2008)。

而就這群中國知識份子的精神與特質而論，可歸納為以下三點：第一，國士精神，傳統士人具入世襟懷，抱有憂樂與天下為共的信念。這種精神移植於報業，成為士人報業的特殊標誌。第二，道德精神，受儒家思想薰陶的士人，重視規範道德，故士人辦報格外自我要求，在新聞立論與報導上要求公平誠正、紀事貴實。第三，批評精神，庶人議政是悠久的傳統，士人入仕更將對國君的諫諍視為上天賦與的責任。是故，批評精神為士人報業的一大特色(賴光臨，1998)。李金銓(2004)便將這些傳統士人出身，以辦報抒發己志的報業模式稱呼為「儒家自由主義」。

儒家自由主義的文人論政傳統與受專業義理影響的西方近代報業，在形式上類似，但精神上卻不盡相同。李金銓以《大公報》為例，比較中西方報業的差異：就言論自主性而言，西方報業相信由於財源來自獨立的發行與廣告收入，而不易受到其他黨派勢力的影響；但《大公報》的張季鸞卻認為報紙言論的獨立來自知識份子的良心(黃順星，2008)。換言之，傳統知識份子的入世情懷與批判精神，影響了華人社會裡的記者角色內涵，而這也是中國脈絡下的記者專業意理發展與西方不同之處。

三、專業意理的形塑：實踐過程中的動態養成

蔡士敏(2008)在研究《自立事件》的記者生命故事時，發現個人生命、組織和環境這三大因素並非截然可以劃分，而是在人的生命歷程中展現錯綜複雜的影響力量。她認為儘管個人主觀意志可以決定自己要走的路，但是大環境提供的機會與限制，有時候更勝於個人主觀意願。

同樣以參與《自立事件》記者群為研究對象的管婺媛(2008)則提出，過往研究將記者依照專業角色概念化的分類，並將研究範圍侷限於記者在媒體科層組織裡受到的影響、因應的策略，忽略了記者個人生命經驗如何與新聞場域、生命情境互動。由於記者角色的內涵，深受其個人特質與所處社會脈絡的影響，並在媒

體組織的互動中不斷變動，進而做出各種不同的實踐。因此管婺媛採用記者生命史的研究途徑，並援引關懷倫理的概念，探討個人經驗與特質是如何影響與形塑一個記者的專業意識養成過程。

蔡士敏與管婺媛的研究皆開闢了另一種研究記者專業意理的形式。撇開專業量表和專業角色的三種分類，也不只關注於記者角色在媒體場域裡受到的影響，而是進一步從記者個人的生命經驗裡，找出記者不同專業意理實踐背後的深層因素，了解這些個人經驗和特質如何影響與形塑其專業意理的養成。如此一來，這些記者才能跳脫出中立／鼓吹的二分，抑或是資訊傳佈／解釋／對立的三分法，看清他們是一群什麼樣的記者，補足過去對記者主體能動性研究的不足。

而本文基於對記者主體能動性的重視，及希冀更具像化、立體化與動態地呈現出新聞場域內記者行動輪廓的企圖，因此選擇採納蔡士敏(2008)與管婺媛(2008)對於專業意理養成的新視角，探究這些在主流媒體內積極維護新聞專業的記者們，在進入新聞場域後的生存心態與資本，如何影響記者對新聞專業意理的認知與行動策略；而隨著在場域中資本的逐漸累積，記者的專業意理又將如何轉化與變動。

四、新聞專業自主

然而，無論是中立報導者或是參與者的記者角色，或是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辦報精神，擁有記者專業自主權都是實踐新聞專業意理的前提。

「自主」或「自主權」意指個人以其專業知能執行專業任務做專業決定時，不受外力干預(吳佩玲，2005)。Bourdieu則認為，「自主性」是針對機構或個人，相較於某種權力中心，某種層級屬性與權威所做出決定的可能或獨立性(轉引自舒嘉興，2001)。

Johnstone(1976)研究顯示，美國有八成以上記者都是在媒介組織工作，且公司越大，限制也越多。初入行的生手記者，被組織指派路線採訪、被編輯刪減稿件，在此情境下，工作自主權是有先決條件的。Johnstone因而為記者自主權定下

操作型定義：「決定新聞該強調的重點、選擇報導題材的自由、組織中有人指派記者採訪工作、記者報導內容由其他成員刪改次數的多寡」。

林淳華(1994)研究結果發現，在實際擁有工作自主權方面，記者在新聞採訪、寫作方面擁有相當高的自主權，但在交稿方面，擁有自主權較低。而記者在實際擁有決策參與權方面自主權低，只有在發生重大爭議事件決定報社立場時，記者參與權較高，大多數記者認為主管在這方面會徵詢記者之意見，再下決定。林淳華研究還指出，記者採訪路線及報社型態也會影響記者自主權的高低。

Curran(1990)則從組織觀點來看記者的自主權，提出相對自主權(relative autonomy)與特許自主權(licensed autonomy)的概念。所謂相對自主權，是指記者所擁有的自主權，是基於他在組織中的權力、地位，所以他可以聯合路線上的同業，決定那則新聞要發、那則新聞不發，以擺脫報社組織的干預。而特許自主權，是指專家記者、明星記者對新聞判斷有其獨立性，加上在新聞組織的年資久、累積不少採訪經驗與路線人脈，呈現一種「專業壟斷」。

但無論是相對自主權或是特許自主權，記者所擁有的自主權力除了來自於組織的分享，也有一部分是他們把組織規範、工作常規內化為自身價值，並且透過知識、技能為自己爭得專業名聲。換言之，記者專業自主權仍必須透過與組織權力交換而來。對此，陳順孝(2003)與張文強(2009)皆指出，在面對組織行使權力或是外在壓力要求記者屈從時，為維護新聞專業自主，記者除了選擇離開、順從兩條出路外，還可以採取陰柔、隱諱的反抗策略，以達到記實避禍。以下，便爬梳過往對記者抵抗策略的相關文獻。

第三節 記者與組織互動的資源與策略

古典政治經濟學在詮釋組織權力時總認為組織裡有隻魔手掌握權力，或認為權力屬於宰制階級，是個人、集團的所有物。科層結構中權力的流動，永遠是從上而下的，儘管集權，必要時也可以分層負責，但老闆終究是權力的擁有者、支配者、宰治者。權力導致各方競逐，並引發衝突，造成上下對抗(黃結梅，1998；李猛，1999；吳佩玲，2005)。

而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認為權力不像古典所定義，集中在少數人手上，由上而下、由中心向外擴散。因此他提出了一種新的權力觀，此權力觀像是一種治理生命的權力，將權力視為一項策略，不斷滲透地運作、流動，透過對他人的控制和處置，進而產生生產力(楊大春，1995；蔡莞瑩，2007)。

若將 Foucault 的權力觀對應到媒體組織，會發現媒體是科層組織與控制體系下的運作結果，權力透過組織制度、工作常規等技術性操作，讓記者自願順服，產生自我規訓。Breed(1955)即指出，不少新聞記者是以不斷的修正概念架構或行動的求生存心態，來符合工作場域的需求，並視這過程為一種「執行階層順應編輯政策的作法」。採取消極順服的記者，通常只把跑新聞當成一項只向主管負責的工作，或是自己找出順從報社的好理由，像是替公司利益著想、主管也有為難之處等，又或是找出報社優點，自我說服忍受不贊同卻又不得不做的工作(陸燕玲，2002；陳順孝，2003；蔡莞瑩，2007)。

但也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工作者無法認同報社政策或指令時，採取或正面高調或迂迴低調的抗議行為，正面作為如內部協定編輯室公約、籌組工會，或援以外部團體(如台灣記者協會)聲名抵制，但通常效果不彰，影響力也有限，甚至有工作者被迫捲舖蓋走路的例子。

張文強(2009)則提出「抗拒」概念的重新思考，他認為既然 Foucault 權力觀跳脫古典權力觀，主張權力能以細膩、多樣的方式運作，那麼記者抗拒的方式也

可以細膩、多樣，以一種非古典的方式進行反抗。因此抗拒不應該被化約成諸如革命等公開行為，而抗拒與不抗拒這種二元分類也是不真實的，或者說，組織內部權力運作不是上對下的單方宰制，而是一種發生於集體互動中的動態過程。張文強於是以「平民抗拒策略」一詞來涵括記者在日常工作上的陰柔反擊，嘗試跨出傳統專業論述對於能動性的觀察範圍。

而早就 1955 年，研究新聞室社會控制的 Breed 便已指出，記者在五個情況下比較可能突破組織桎梏：一是政策規範不明顯時，記者的自由度較大；二是主管未必了解某事的細節時，記者可以運用知識去迴避政策的規定；三是記者可以技巧地「佈局」，例如請其他媒體記者寫一稿，然後藉機向自己的主管遊說；四是記者對主動發掘的新聞想有較高主動權，例如採訪路線的新聞次之，被派出訪的新聞又次之；五是「明星」記者較有出軌權；Gans(1980)也認為，記者通常以三種方式來回應外力：一是勇敢反擊、二是屈服、三是先行避免。而記者通常採用的是第三種先行避免，也就是活用社會智能、語文智能與分散智能來達到記實避禍(陳順孝，2003)。

以下，以 Breed(1955)提出的五種可能突破控制的情況為基礎，並參照張文強(2009)歸納出平民抗拒策略，提出兩類新聞工作者的抵抗策略，而兩種策略經常是相互為用的，並非只能選擇其中一類施展：

一、游走於科層組織的空隙之間

李金銓(1983)審視報社的組織特性，發現報社權力不似以往古典的權力觀，權力不會只握在支配者手裡，也可能透過組織的時間、空間調配來運作。張文強(2009)進一步整合組織中時間與空間概念，指出組織權力其實是循著生產流程與科層結構制度展現的，報社組織的權力支配並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那麼赤裸、粗暴，而是不著痕跡地透過主管、生產制度、規則與流程散落在新聞工作者的周遭，或是變成工作者的自我規訓。換言之，完全顛覆了過去的古典權力觀，而以

Foucault 的權力觀點來看，權力會循著組織空間、時間、生產流程、人員交互運用，呈現出一種網絡型態來發展。

吳佩玲(2005)則提出「反抗資源來自權力本質」，表示既然權力是藉由時空與制度，如此幽暗地無形滲透著，其反抗力量勢必也來自幽暗，吳佩玲以 Foucault 圓形監獄概念比喻，瞭望台探照燈所照映不及的暗處，就是權力監控之外的漏洞，也是新聞工作者爭取自由的基地，使得反抗成為可能。因此新聞工作者的反抗資源，便是組織制度的缺漏之處。

(一)規則空隙：模糊規則的彈性與解釋權

基本上，規則空隙的產生是來自於新聞工作程序缺乏標準，或採訪寫作規則不具封閉性，記者對自己所寫的稿子擁有最大的詮釋權。而由於新聞是種結構模糊、難以定義好壞的工作，因此留給工作流程規則與獎懲制度相當大的彈性與不確定性。這不僅讓中階主管們得以利用詮釋或重新制訂規則的方式控制下屬，而不同主管實行不同規定、或相同規定但執行的鬆緊程度不一，卻也留給記者們鑽規則空隙的機會(張文強，2009)，而只要記者表現得不是故意的，偶爾的不聽話，主管還是願意忍受的(吳佩玲，2005)。

舉例來說，每位主管喜歡的新聞取向不同，而主管都有代班人制度，有些新聞遭到 A 主管封殺時，在 B 主管輪班當家時再提報，也許就獲得重見天日的機會；或利用管理者的競合關係，當記者被要求報導某則商業性濃厚的新聞，或追蹤某則不合新聞倫理的後續報導時，記者會借著單位主管競爭心理，故意把內情透露給另一名主管，假借另一名主管之口在編採會議上提出反對意見，封殺該則新聞(陳順孝，2003；林韋任，2003；吳佩玲，2005；蔡莞瑩，2007)。

另外，獎懲辦法缺乏一致標準也幫襯了記者採取迂迴回應的可能性，由於台灣媒體組織充滿高度人治色彩，仰賴主管階層依過去經驗與個案特性評估下屬，而媒體工作者通常具有文人性格，除了口頭告誡，少以「罰」作為讓人順從的依

據(張文強，2009)，因此只要記者不要太「超過」，主管通常不會給予太嚴厲的懲罰。

(二)空間空隙：監看距離之外

身處新聞現場的新聞記者，工作地點多在採訪現場或部會機關，通常以手機或網路回報工作內容，因此產生了空間空隙，在主管高層的監看距離之外享有較多形式的自由。例如主管會設法利用手機延伸監看記者的範圍與密度，但在記者創性性的忘了帶手機、因為參加記者會把手機調成靜音狀態、正在做專訪不方便接電話等理由之下，記者還是會找到相當空隙以迴避監看空置，掌握依自己意志處理新聞的機會(張文強，2009)。

在監看距離之外，也讓記者更有機會在組織的模糊地帶採取 Borden(2000)提出的隱性的抵抗策略(underground resistance exemplar)與傷害性不大的破壞行為(sabotage)，用隱性的、技巧性的破壞行動抵抗組織要求。如置入性行銷沒有說清楚要放入什麼元素時，刻意淡化商標或多著墨於相關產品減低贊助商色彩。

另外，科層組織中的管理者、主管階級也可能因離開採訪路線已久，必須仰賴記者提供資訊進行新聞價值與重要性的研判，記者是報社長官在外採訪情境的耳目，透過空間與時間的距離，也讓高塔上的權力被削弱，記者得以爭取自己作決定或主導觀點的空間(張文強，2009；吳佩玲，2005)。

二、專業智能作為一種掙脫基礎

Curran(1990)從組織觀點來看記者的自主權，提出相對自主權(relative autonomy)與特許自主權(licensed autonomy)的概念。所謂相對自主權，是指記者所擁有的自主權，是基於他在組織中的權力、地位，所以他可以聯合路線上的同業，決定那則新聞要發、那則新聞不發，以擺脫報社組織的干預。

而特許自主權，是指專家記者、明星記者對新聞判斷有其獨立性，加上在新

聞組織的年資久、累積不少採訪經驗與路線人脈，呈現一種「專業壟斷」，樹立一種「王牌(trump card)模式」，也因為明星記者新聞處理的純熟而完備，主管往往會給予較大的空間自由發揮，也會尊重他專業的判斷，像是挖掘到領先的獨家新聞，也會得到更多支持。

而 French 與 Raven(1959)很早以前提出的專家權力(expert power)，便以一種知識角度解釋，隨著個人經驗累積的特定採寫編輯技巧，或與眾多消息來源有關的路線知識，因為只有這些秘笈式的知識才能幫忙個人累積不可替換性，然後轉換成記者個人資源。Foucault 也說「權力生產知識」，意即新聞記者在報社中與權力周旋的同時，也累積了自身在採訪寫作和情境智能上的專業知識。如明星記者與專家記者所累積的人脈、專業知識與聲望，就是個人不可剝奪、難以轉移的資源。組織中的上層管理若要進行商業化的新聞操作，必須仰賴記者的知識或資源，因此也甘願釋出部分權力，讓他們擁有所謂的特許自主權，有了這些知識轉化而來的資源與組織所貢獻的權力，更容易讓記者突破組織的限制(蔡莞瑩，2007)。

記者所累積的專業知識與社會資本彼此可交互使用，也可同時並存：以下，分別討論新聞記者如何運用其專業與資本：

(一)專業知識：採寫智能與議題掌握度

陳順孝(2003)指出，台灣記者的寫作策略有直筆、疏通、模糊、暗碼、隱身及轉進六種應對的報導方式，此六種記實避禍的策略時常交互為用，而記者運用策略的要訣在於以採訪智能援引新聞組織內外的友好勢力為己助，提高自己抗衡的籌碼，再以寫作智能保護自己與消息來源，並在稱謂和修辭上給足面子，換取委婉、安全報導新聞事實的裡子。採訪與寫作知識上的應用，或是對報導議題的熟悉度，多少能替新聞工作者保留抵抗組織或消息來源的空間。吳佩玲(2005)也提及，記者若熟識文字應用技巧，適時在新聞中轉折與鋪陳，可規避可能招致的

麻煩，又不至於得罪消息來源，主管相對也會放行，讓新聞刊登在報紙上。

(二)社會資本：情境與社會智能

以知識作為抵抗基礎並不難理解，但在處於封建本質的台灣媒體，人際關係或由此轉化的社會資本，經常是另一項因應組織控制的基礎資源(張文強，2009)。記者平日工作所拓展的人際網絡，能讓記者找到結盟對象，而記者影響力不會是只限於組織內，還可以隨著個人的「交際鏈」擴展至組織的外部，爭取個人的存活空間。

而不僅連同在外的社會資本施行抗拒策略，對內，社會資本的運用一樣重要，楊中芳(2001)便指出，「關係」在華人組織扮演的重要角色；張文強(2009)亦提及組織內「紅人」、「自己人」得以在封建性格的台灣媒體內部，爭取到更多自主空間。

吳佩玲(2005)研究則顯示，新聞記者在規避組織權力的同時，也因身處於產業環境中，更能看到報社權力在媒體環境中的局限性。報社組織的結構與政策，有部分得因應外在的因素進行調整與形塑，它雖然可能阻礙記者的工作自主，但也讓記者在這個動態權力關係中，找到可以牽制組織權力的力量。例如對組織具有威脅性的消息來源、廣告主、新聞同業，這些對媒體生態、組織與路線情境的掌握，皆可成為新聞工作者可運用的資源。

(三)小結：在迂迴之外，一種積極的正規超越

對於採用平民抵抗策略，張文強(2009)認為面對陰柔、變化的控制型態，新聞記者必須保持回應方式的靈活性與動態性，以創意不斷尋找回應控制的新出路。他同時認為，新聞記者更需要將專業放在心中，以免平民抵抗策略被化約成一般的偷懶策略，或是遭主管以形式自由的小惠，換取記者的根本順從。

張文強(2009)也提及，使用陰柔、迂迴抵抗策略的記者，其目的在於過程本

身，而非它們所能帶來的結果，平民抗拒策略的使用是一種對於組織控制的「不承認」，是記者在充分了解無力改變整體結構之後，以不會傷害自己為前提的一種維護主體性的展現或象徵。迂迴抵抗的記者之所以抵抗，往往只是想要藉此抒解心理層次的不自主感受，而非設法在妥協基礎上，交換實質主體性空間(張文強，2009)。也就是說，陰柔抵抗是缺乏積極的實踐力道，而之中的主體性仍然消極。

因此，本文關注的並非停留在個人抵抗的層次，路線中的記者發揮其專業上的智能，並適度地藉由組織漏洞偷渡自己的理念和想法，以隱微、迂迴的方式與組織互動，爭取自主空間固然是維護主體性的一種方式，但仍然消極，因此本文試圖在迂迴之外，尋求一種正規的積極超越。猶如陳順孝(2003)提到，過去研究記者因應組織控制的策略，較為側重記者運用一己之力的策略而非集結資源的謀略，他並建議應多關注記者如何集結資源、突破控制的動態行為；此外，根據吳佩玲(2005)的結論，掌握知識、資源的多寡，往往決定了記者反抗的結果。資源的存在，並不意味著必然有反抗的機會，反抗機會既非客觀，也非主觀，而是存在記者與情境的互動當中，記者必須主動培育自己在情境中「看得到」資源及其因應的能力，這便是新聞記者的主動性與知識著力的地方。

換言之，唯有記者懂得掌握和運用權力的「機緣」，以及懂得在場域中累積資本，並利用資本採取各項策略，才能決定記者在新聞場域內所能佔據的位置以及與他人/組織的競合關係。也就是說，當新聞工作者在新聞場域中累積的資本越高，越懂得如何集結抵抗組織的資源，便能採用更為多元的抵抗策略，也較易採取更光明、正規的抗拒策略，爭取自己的專業自主。而《中國時報》調查採訪室的五名記者是如何一步步累積資本，並且運用機緣和資源發展出一種積極的抵抗策略，就是文中接下來欲探尋的焦點所在。

第三章 研究方法

基於本文的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本文將採用生命史研究途徑，探討《中國時報》調查採訪室內五名記者進入新聞場域的時空背景、個人生命與採訪經驗如何形塑其新聞專業意理，而奠基於自身專業意理以及採訪過程中累積的資本，這五名記者如何在與組織互動、拉鋸間展現新聞實作。因此本章第一節將先說明生命史研究途徑的定義、優點與限制；第二節介紹研究方法，第三節則交代資料的蒐集。

第一節 研究取徑：生命史(**life history**)

一、生命史研究的定義

「*life history*」可譯為「生命史」或「生活史」，生命史強調的是生命的延續性及延續性特質，較為偏重公領域之社會層面，生活史則相對重視個體私領域的生存面向(江文瑜，1996；鍾秀鳳，2003)。由於本文關注的不僅在於研究對象個人的生命歷程，同時也關注研究對象所處的社會脈絡，以及社會與個人行動的交織所產生的關聯，涵蓋面向由個人私領域(個人)跨越至更全面的公領域(社會)層次，故採用「生命史」譯名。

生命史研究，與口述歷史、自傳等研究方法類似，均屬於質性研究方法中傳記研究法(*biographical method*)的一種(Denzin,1989)。其中，生命史關注的焦點在研究對象的生命經驗，希望透過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互動，共同建構並呈現出這些生命經驗所具有的意義與內涵，因此生命史是被人誘發的，以書寫或者口述形式呈現出個人生命的整體或部分的回溯性資料，而不單是生命史主角的自我陳述(曾春榮，2004；李秀俐，2004)。也就是說，生命史研究兼容著研究對象的生命

故事與研究者的整理觀點，是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共同面對生命歷程的研究(熊同鑫，2001)。

Denzin(1989)認為生命史是透過訪談與對話來為生命作記錄，其包含三個主要部分：個人的生命故事、所面臨的社會與文化情境、及這些經驗與情境的順序性。因此生命史研究重視的，不只是何者為事實，關注焦點也不限於某一段或整體生命歷程，而是依研究目的而定，重視研究對象個人生命歷程中各段經驗之關聯性，以及研究對象在個人經驗中，如何重新建構自我與詮釋生活事件(Denzin，1989；王麗雲，2000；曾春榮，2004；李秀俐，2004；蔡士敏，2008；管婺媛，2008)。

二、生命史研究的意義

生命史研究由二十世紀初開始發展，1970年代社會科學受到象徵互動論與現象學的影響，轉而關注人類主體性(subjectivity)，生命史研究便因其敘述性、脈絡性與歷史性方面的價值而重新被注意(Kupper&Kuper，1996；轉引自王麗雲，2000)。就因為生命史研究的特性，使得生命史研究裡的研究對象被視為積極的說明者，透過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對話式的敘述，深入地探究其主觀世界及生命經驗，並分析潛藏在生命背後的深層結構，進而建構出他們主觀生命裡的真實世界(Gubrium & Holstein,1997；轉引自李秀俐，2004)。

而生命史研究最富意義之處，在於其不只從個人主觀經驗出發，也兼顧到人是生活在特定的時空、社會、群體之中的事實。其主張個人主觀意識是在歷史及社會脈絡的影響下形成，個人的能動性與創造性鑲嵌在特定時空下的社會機制和結構中，彼此互動而塑造出獨特的生命經驗(王麗雲，2000；熊同鑫，2001；蔡士敏，2008；管婺媛，2008)。因此藉由將研究對象的口述生命故事置於時空、社會環境等的脈絡之下，研究者不但能了解到對研究對象而言，社會世界之中的

角色及規則是如何產生意義，並且可以在他們的生命經驗及想法觀點之中看到社會的變遷--生命史的研究呈現出了一種歷史的連續性(Goodson & Sikes,2001；Hatch & Wisniewski,1995；轉引自蔡士敏，2008)。

故生命史研究可說是一種對主體性及自我覺醒的重視。透過研究對象所訴說的生命歷程、經驗等，研究者得以描繪出一幅既模糊又具體的圖像，在其中所展現的不僅僅是研究對象如何與整個社會文化結構發生互動、衝突、妥協等，更多的是原本為人所忽略的聲音(康萃婷，2002)。所以，生命史研究特別適合運用在沒有發言權與自主詮釋權的弱勢族群上，它具有知識的解放功能，讓研究對象從這些結構性因素的解構過程裡，重新認識自己，從而積極改變自己的命運(王麗雲，2000)。

林立珩(1999)便以生命史研究方法，探討究家庭、婚姻、女工個人的選擇與宏觀的經濟結構如何交織在一起影響關廠女工的勞動，以及其勞動意識的覺醒與行動。林立珩藉由訪談讓受訪者成為行動的主體，由工廠女工們發聲說出自己的生命故事，將女工們的生命歷程結構化(life-course structuration)，發掘女性生命中的變化與轉折點，從這些轉折點上發生的事件去瞭解個人對家庭、社會經濟結構、以及歷史轉變的回應，和她們所運用的不同策略和決定。

基於生命史研究對個人生命經驗、對整體、對歷史、對脈絡、對個人適應策略的重視，並試圖了解個人對於外在環境與外部變遷的應付策略(王麗雲，2000)，本文便選擇從記者的個人生命史出發，將記者的生命歷程結構化，並從記者所處的時代背景、政經環境、媒體發展來探討，企圖補足過去新聞傳播研究缺乏理解記者(個人)的不足，探討行動者在大環境下的實踐意義，並找出發展未來的可能性。

三、生命史研究的限制

生命史研究其所屬的質性研究關心的焦點是「研究對象所知覺的社會事實之建構過程」、「人在不同的、特有的文化社會脈絡下的經驗與解釋」，因此一般量化研究的評判標準並不能完全適用之(康萃婷，2002)。

但由於生命史主要是研究人的生命經歷，倚靠當事人的記憶與敘述，那麼就可能會出現真實與否、可靠與否的疑慮。當事人可能因年代久遠而忘記事實或是印象模糊，無法說出事實全貌。而所有的回憶都是一種重新建構的歷程，代表個人對過去經驗的一系列看法，真實性也受到語言的限制，說話者與研究者之間、說話者與文本之間、文本與聽眾之間，種種的環節都可能產生斷裂的現象(王麗雲，2000；黃月純，2001；蔡士敏，2008)。

此外，生命史的內省性與回溯資料的效度不高。因為生命史研究只能獲得部分的生命經驗資料，造成資料片面性的問題，而且研究取樣數量少；不同人對同一事件又有不同解釋角度。因而生命史研究無法排除對立的因果解釋面臨推論性的限制、因果關係建立的困難。

然而，生命史研究的精神正是強調個體的特殊性，研究旨趣並不在做因果關係的解釋或廣泛的推論，而是在呈現與解釋與個人有關資料的能力、研究對象所知覺的社會事實之建構過程、人在不同的特有文化社會脈絡下的經驗與解釋。另一方面，可以透過集體傳記的研究歸納出共同點，能稍微增加生命史研究的可推論性(王麗雲，2000；陳素鳳，2004；康萃婷，2002)。

為了盡可能彌補以上的限制，可採用集體傳記的方式增強推論性，或是充分地準備與閱讀相關資料，並取得受訪者的信賴，因為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互動關係是整個研究過程能否順利的關鍵。更重要的是，要在不讓受訪者感受到隱私被侵犯的研究倫理前提下，提高生命故事書寫的真實性(王麗雲，2000；熊同鑫，2001)。

第二節 研究方法：敘事(narrative)分析

近十五年，敘事(narrative)以及生命故事(life story)的概念逐漸運用在心理學、心理治療、教育、社會學及歷史學等學科。相較於實證論典範，敘事研究假定在人的現實中，並不存在單一的、絕對的真實，對於文本也沒有唯一正確的解讀或詮釋，因此敘事分析包含了多元主義(pluralism)、相對主義(relativism)以及主體性的內涵(Lieblich, Tuval-Mashiach & Zilber,2008)。

由於本文採用生命史的研究途徑與研究對象互動，以研究對象的敘說與詮釋為主軸，因此選擇以敘事研究(narrative research)分析所蒐集的資料，試圖分析記者在新聞場域所養成出的專意義理與逐漸累積的資本，如何影響他/她們與組織的互動和新聞實作。以下便分別說明敘事分析的定義，以及敘事資料分析的流程。

一、敘事分析的定義與內涵

韋氏字典 Webster's(1966)將敘事定義為「表述(discourse)，或表述之實例，再現一連串脈絡連貫的發生事件」；Crossley(2000)則認為敘事是一種用來組織劇情(episodes)、行動、和對行動之說法的方式；而 Lieblich, Tuval-Mashiach & Zilber(2008)定義敘事研究為「任何使用或分析敘事素材的研究」，敘事的資料是以故事(訪談或文獻探討中所採擷的生命故事)或其他方式(人類學者以敘事形式寫下其觀察所得的實地札記，或個人信件)蒐集而得。也因此，敘事研究是以故事的形式來展示呈現一個人的生命歷程，試圖了解人們如何理解自身生命、賦予意義與關照自我，以理解脈絡中的人類複雜生命(呂美慧，2008；張凰婷，2007)，常被用來作為瞭解個人身分認定(personal identity)、生活風格(lifestyle)、文化(culture)以及敘說者歷史世界(history world of the narrator)。

Lieblich, Tuval-Mashiach & Zilber(2008)指出，敘事的特色就在於其異常豐富

的資料。訪談的整體結構或組織可能有助於提供研究者一個初步的訪談次序或方向，然而敘事資料仍然可從數以萬計的向度來分析，例如內容、結構、敘說風格、情感特性，以及敘說者的動機、態度和信念，或是其認知層次等。另外，訪談資料還會受到訪談者與受訪者間的互動及其他情境脈絡因素所影響。

而敘事研究的另一特色，關乎「假設」(hypothesis)在此研究中的位置。敘事研究中通常沒有預先的假設，研究的明確方向是從閱讀所蒐集到的文本中浮現出來，而假設也可能隨之而出。而且，敘事研究是詮釋性的，對於故事的詮釋是相當個人的、偏頗的與動態的。

在常見的敘事研究中，研究者不需要將研究結果的複製作為評價的基準，因此讀者需要更加仰賴研究者個人的智慧、技巧與真誠。但這並未意味研究者擁有覺對自由的推測和直覺，而是有賴於敘事資料進行反覆不斷的檢視，將直覺歷程轉化成綜合性的瞭解。



二、敘事資料的蒐集與分析

Lieblich, Tuval-Mashiach & Zilber(2008)指出，處理敘事資料須要對(至少)三種聲音進行對話性聆聽：敘說者的聲音，如錄音帶或文本所示；**理論架構**，提供詮釋的概念和方法；以及**對閱讀與詮釋的行動進行反思**，指從資料導出結論的決定過程進行自我覺察。Riessman 則提出研究對象生命歷程的再現的五個階段(轉引自胡幼慧，1996，頁 161)：

(一)、關注經驗 (attending to experience)：

第一步是強調受訪者對原始經驗的回憶及重新組織，透過關注與思考，將一些現象意義化，讓經驗再現出來。

(二)、訴說經驗 (telling about experience)：

接下來是關注於受訪者如何表達與組織這些經驗，敘說的故事如何發展與轉

折，以及敘說當下的情境。

(三)、轉錄經驗 (transcribing experience) :

此層次強調研究者不但參與對話，也藉由錄音、轉錄，以文字記下，節錄成研究資料。故研究者必須決定何者要記錄、排除，要如何透過文字呈現給讀者。因此此階段為研究者的「詮釋」實踐。

(四)、分析經驗 (analyzing experience) :

分析經驗是有步驟的。研究者如何把分散的片段資料整合成一個整體，要留下或割捨哪些內容，都在這個階段中決定。而研究者的價值觀、政治立場與採取的理論視角也無可避免地滲入其中。

(五)、閱讀經驗 (reading experience) :

分析完成後，最後一步是讀者的參與。同樣的文本，不同的讀者可能會有相異的解讀。研究者也必須思考讀者的參與和他們解讀出來的經驗。

本文的資料分析依據的即是 Riessman 的生命經驗再現的五個步驟。首先，採半結構式深度訪談，即以預先設計訪談大綱做訪談，再經由訪談的資料文本做逐一的修改與反思，達到「詮釋循環」(hermeneutic circle)。訪談過程中，研究者將焦點放在研究對象對原始經驗的回憶及重新組織，研究對象如何透過關注與思考，將一些現象意義化，讓經驗再現出來；研究者並同時注意研究對象在敘說時如何表達與組織這些經驗，以及敘說當下的情境。

敘事蒐集資料後，再將訪談文本轉譯成逐字稿，並反覆閱讀之，逐字稿須配合訪談時的情景，必要時加上受訪者當下的表情動作，同時仔細檢查是否有遺漏之處，再下次訪談前再提出、補足。而又因為敘說故事是很主觀的詮釋過程，被選擇說出的故事具有在當時時間脈絡下的特殊性與選擇性，因此必須同時關照當時的歷史脈絡與客觀政經條件，即與二手資料的相互對照，以增加後續資料詮釋上的正確性。

當敘事資料飽和後，研究者再依照敘事分析類型與組織模式界定資料。

Lieblich, Tuval-Mashiach & Zilber(2008)依據兩種獨立向度將敘事資料分為四種模式(但非總是能明確劃分)，兩種獨立向度分別為：

(一)整體(holistic)vs.類別(categorical)：指涉分析的單元

(二)內容(content)vs.形式(form)：故事內容與形式的區分

而當兩種向度交錯，則反映出四種敘事模式：

整體-內容	整體-形式
類別-內容	類別-形式

(資料來源：Lieblich, Tuval-Mashiach & Zilber, 2008,16)

(一)整體—內容：

將受訪者的生命故事或敘事材料視為一個整體，來閱讀與分析整體敘事所要傳達的主要旨趣或重要意涵。以一個人完整的生命故事所呈現的內容為焦點。類似個案研究。

(二)整體—形式：

藉由省視整個生命故事的劇情或結構，來發現其最為清晰的表達方式，研究者要在故事的整體進展中，找到其高峰或轉捩點。

(三)類別—內容：

近似「內容分析」，研究主題的類別已被明確定義，文本中分離的段落則被抽離出來、分類，再聚集到這些類別/群聚之中。例如：敘說者在故事中曾提及的關於其生命中曾發生的某一特定政治事件之故事片段，這些和此一政治事件相關聯的故事片段，即可被拿來分析。.

(四)類別—形式：

聚焦於每個獨立敘事單元的敘事風格或語言學特徵。例如敘說者使用了哪些隱喻，或者敘說者主動或被動敘說的頻率。

由於本文採取的是生命史研究途徑，著重於在主流媒體內的記者之經驗敘說，敘說內容由受訪者的個案故事中組成，故採用第一種「整體—內容」分析模式，在接續的第四章裡，將以故事性的序列做鋪陳，描述研究對象進入新聞場域後的工作與採訪經歷，使其敘說之經驗具有整體脈絡與連貫性意義。

第三節 研究範圍的界定

一、聚焦於記者職涯路徑

雖然生命史泛稱為個人人生整體上的一連串變化，但同時，如先前所述，在研究層面上，生命歷程可以聚焦在某一階段的狀態分析、特定領域之內的經驗歷程，例如教育生涯、職業生涯的人際關係。一組特定的階段和狀態定義，容許將所有可能的生命歷程作周全的分類，而一個生命歷程可界定為個人所經歷過的某一特定順序的狀態(Runyan.W, 2002,133；轉引自管婺媛，2008)。

本文探討主流媒體記者如何據其專業意理養成與資本累積，實踐其新聞理念。因此，本研究採取生命歷程分類中的職業路徑(career path)概念，一方面探討記者在新聞場域中如何形塑專業意理與累積個人資本，意指個人特質、信念與經歷，另一方面亦涵蓋外在場域的影響，如社會、政治、經濟等，以及他們在這些環境中所採取的應對策略。

是故，本文選擇生命史研究途徑，並著重於職涯路徑的探討，欲了解在受訪者在記者生涯中經歷的生命歷程與因果脈絡，以及其如何實踐其新聞專業理想，同時理解他們面臨的限制與找尋的可能出路。

二、研究對象

本文關注的是在主流媒體內，除了迂迴抵抗外，同時發展出一種正規抵抗路線的記者。之所以選定《中國時報》調查採訪室的五名記者為研究對象，是因為調查採訪室是在中時震盪時期所誕生的產物，裡面的五名記者憑藉各自的優勢而被徵召於此，設法在與組織的妥協基礎上，以一種集體、正規的路線在組織中爭取主體實踐與能見度，展現出不同於大多數新聞記者面對組織時，選擇採取隱微、消極的抵抗策略。

這五名記者在進入調查採訪室之前，在各自的新聞路線上已累積相當的資歷與專業表現，並在新聞場域中各自坐擁不同的位置，有著程度不一的新聞自主權與抵抗空間，而這樣的資本某種程度也支持了他們，比別人更具有正規抵抗的條件。誠如本文第一章所言，新聞工作的專業自主並非先天存有的，是需要記者後天努力爭取而來，因此透過這五名記者的記者職涯歷程，可進一步探知拓展專業自主空間的可能性。

另外，由於調查採訪室過去在《中國時報》曾多次成立、解散，本文希望能藉由二手資料的蒐集，試圖理解調查採訪室過去在中時的起始淵源與演變，欲了解過往在中時獨有的組織文化下調查採訪室的意義，以及了解在中時面臨裁員時期，調查採訪室再度成立的宗旨與定位。

表1：受訪者名單—調查採訪室成員

受訪者姓名	學歷	媒體經歷	年資	主跑路線
何榮幸(男)	台大社會系	《自由時報》市政組； 《中國時報》政治組、副總編輯兼採訪中心副主任、調查採訪室主任	20	市政、政治

黃哲斌(男)	輔大大傳系、 政大新聞所	《影響》電影雜誌總編輯；《中國時報》地方記者、社會組記者、政治版編輯；台北之音新聞部主任；《中時電子報》副總編輯	20	社會、網路
謝錦芳(女)	政大英文系、 輔大大傳所	《中國時報》市政組、財經組、經濟組	20	財經
郭石城(男)	世新三專編輯 採訪科	《台灣新生報》；《中國時報》	22	農業產經、社會司法、地方新聞
高有智(男)	台大動物系、 台大新聞所	《台灣教會公報》；《中國時報》教科文組、政治組	10	政治、農業、原住民

三、 訪談大綱設計

本文的訪談大綱，是以受訪者踏入新聞場域後的經歷為主軸，並依據第一章提出的三組主要研究問題：「一、《中國時報》調查採訪室的五名記者，進入新聞場域的背景分別為何？專業意理形塑過程？二、這些記者在各自的條件限制下，如何累積、掌握資本，並發展出自己與組織的一套互動策略？三、進入調查採訪室之後，如何繼續實踐新聞專業與意理？如何以集體為單位與組織互動？」以這三組研究問題為基礎，據此設計訪談問題。同時針對受訪者的不同經歷，製作不同的題綱。另一方面，也會根據受訪者的回答，修改或增加問題內容，再進行接續的訪談工作。

表 2：訪談大綱

研究問題一：進入新聞場域的背景、專業意理的形塑過程	
記者歷程	成為記者的經過，媒體單位與採訪路線的選擇
	認為新聞應該發揮什麼影響力，新聞工作對自身的意義為何
	進入媒體後，在新聞工作中如何實現自己心中的專業意理
	是否考慮過跳槽或轉業？若有，是哪些因素萌生離開念頭？
場域背景	描述進入新聞界前後的社會風氣和時代氛圍
	是否感受到新聞生態的轉變，若有，轉變為何
研究問題二：這些記者在各自的條件限制下，如何累積、掌握資本，並發展出自己與組織的一套互動策略？	
資本累積	如何在日常工作中得到自我肯定？
	媒體工作生涯裡，最大的成就感和挫折感是什麼？
	新聞工作經歷累積了自己哪些歷練和專業？
抵抗策略	在新聞工作上，與組織有所衝突的情況通常是什麼
	當與組織或主管指令發生衝突時，如何應對？
	是否感受到新聞資歷越深或較受組織賞識的記者，擁有較大的新聞自主權？
研究問題三：進入調查採訪室之後，如何繼續實踐新聞專業意理？如何以集體為單位與組織互動？	
以調查採訪室為單位	進入調查採訪室的過程
	在製作專題的過程中，是否曾經與報社有過衝突？在哪一環節最容易產生衝突？面對意見相左時，如何化解？
	比較進入調查採訪室前後的工作型態與專業自主權

	在爭取版面與經費上，調查採訪室如何與報社、其他組別互動
	認為這次的調查採訪室和過去的調查採訪室有無差異之處？



第四章 研究詮釋：記者圖像

本章的研究詮釋觀點，以前面章節所述的研究問題為敘說核心：一、《中國時報》調查採訪室的五名記者，進入新聞場域的背景分別為何？專業意理形塑過程？二、這些記者在各自的條件限制下，如何累積、掌握資本，並發展出自己與組織的一套互動策略？三、進入調查採訪室之後，如何繼續實踐新聞專業與意理？如何以集體為單位與組織互動？

調查採訪室的五名記者，除了高有智在兩千年後才進入新聞圈，其餘四位的新聞資歷都將近二十年，踏入新聞場域的背景都在解嚴後的九零年代初期，正值社會運動及媒體發展風起雲湧的階段，因此這四名記者同時見證了報業的欣榮與衰退、新聞自由的解放與失序。

本研究著眼於研究對象的職涯史，當個人生命經歷扣連著新聞場域的變遷，外在結構（如政治力、商業力）的隱微權力掌控、新聞媒體的生態變化，皆深深影響著這五名記者的職涯歷程與信念養成，同時也左右了他們在新聞界的走向。以下，將以上述三組研究問題為敘事軸線，描繪出中國時報調查採訪室五位記者的在新聞圈的專業意理、資本累積，以及職業生涯。

第一節 何榮幸的職涯圖像

既然已經選擇進入主流媒體這塊新聞戰場，如何在主流媒體的專業規範與遊戲規則中，一點一滴試圖「偷渡」某些與主流立場不同的想法，在符合專業要求下傳遞某些非主流觀點，遂成為我在主流媒體奮鬥的目標之一。

(何榮幸，2006，頁 318)

何榮幸，1966 年生，生於埔里，長於台北。1985 年進入台灣大學社會系。何榮幸的大學時期正逢八零年代台灣社會運動狂飆、各家言論眾聲喧嘩的年代，扣連著大時代的脈動，校園學生運動大鳴大放、並積極走出校園參與社會改革。其社會理想雛形可以說是在反抗權威、主張民主改革的時代氛圍與校園環境中孕育而成的。

活躍於校園的何榮幸，在學期間擔任《台大法言》等多份刊物總編輯，在校園刊物上發表時事評論，關心校園民主議題，大四那年，他創立了《傳真社》，兼任社長及總編輯，更被選為台大學生代表大會的首任議長。台大學生爭取多年的學生會會長普選案，就是在何榮幸學生議會議長任內落槌通過的；第二屆學生會長的競選，何榮幸更為候選人范雲撰寫爭取校園言論自由的競選文宣。學生時期的何榮幸即嶄露了文膽才能。

1989 年，台大社會系畢業後，何榮幸隨即入伍，在軍中服役的他雖與 1990 年三月的野百合學運錯身而過，但早在野百合運動發生之前，校園內頻繁串連的人際網絡，讓沒能在廣場上一同靜坐與高喊訴求的何榮幸，仍屬於「學運氣氛感染者」⁸的一員，而無論直接或間接，這種自由開放的思想風潮與實踐行動都在何榮幸往後的生命歷程中留下軌跡。

⁸ 引自何榮幸(2001)《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台北：時報出版)，書中將學運世代由核心到外圍分為四層：學運領袖、學運份子、學運群眾、學運氣氛感染者。

【何榮幸的職涯歷程】

高中到大學時代編輯刊物的經驗，讓何榮幸早早確立了「靠文字吃飯」的職志，而社會學的宏觀訓練以及參與校園改革的經歷，更啟蒙了何榮幸的社會關懷意識，希望自己能藉由文字的力量改變社會。因此，何榮幸在 1991 年退伍後就進入了新聞圈，在《自由時報》踏上了他的記者之路。

然而，才報到第一天，就徹底顛覆了他對記者的想像。

當校園風雲人物變成菜鳥記者

九零年代初期的台灣新聞界，報禁剛解除，報業生態面臨解構重組，各式各樣的報刊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在市場上立足已久的舊報大幅增加張數，報業呈現一片榮景。何榮幸進入《自由時報》那年，《自由時報》剛從中部地域型報紙轉型為全國性規模報紙，報社總部位址也剛遷至台北市南京東路新大樓，在北部地區還是無名的小報紙。

與《聯合報》、《中國時報》兩大報不同，商業起家的《自由時報》老闆林榮三跳脫了過往文人辦報的傳統思維，不僅將報社企業化管理，也懂得運用商業邏輯操作拓展報紙銷售量⁹。受到組織風氣的影響，《自由時報》與新聞業不修邊幅

⁹ 《自由時報》前身為 1946 年 12 月 12 日創刊的《臺東導報》，由於經營情況不佳，1948 年在臺東縣國大代表陳振宗等地方人士支持下，申請改為《臺東新報》，陳振宗出任發行人，正式發行日刊報紙。由於虧損太大，1950 年 10 月 11 日宣佈停刊，直到 1952 年 7 月 12 日，經中國國民黨臺東縣黨部主任委員吳若萍出面主持，才得以復刊。但因銷售範圍僅限於花蓮與臺東兩縣，缺乏廣告收入，經營困難，1961 年元旦宣告停刊。停刊後迅速轉手，買主易名為《遠東日報》重新發刊。1978 年初經營權再轉移，改名為《自強日報》，此次轉手發行地也從臺東遷往彰化。1980 年 4 月，《自強日報》以新台幣四千萬元轉賣給林榮三的聯邦集團，1981 年 1 月 1 日改名《自由日報》，正式成為中部地區之地方報紙。1986 年 9 月，該報獲准遷至臺北縣新莊市發行，隔年 9 月再度易名為《自由時報》，並開始積極往全國性報紙之規模發展。1989 年報社總部自新莊遷至臺北市南京東路。1999 年，《自由時報》開始免費向臺北市各高中、高職供應大量完整版的報紙，同時以鉅額贈禮吸引長期訂戶，因而拉高了知名度與訂閱率，幾身為僅次聯合、中時的第三大報。(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7%94%B1%E6%99%82%E5%A0%B1>)

的形象有所出入，工作氛圍近似於汲汲營營的商業組織。於是，何榮幸便在一個錯置的印象中踏上了他的記者歷程：

1991年6月15號到《自由時報》的第一天，我原本認為要像在好萊塢電影裡面看到的場景，記者屌兒啷噹、抽根菸，資料堆積如山，可是我看到的卻是一棟全新的玻璃帷幕大樓，一進去之後辦公室都是現代化家具，非常乾淨，桌上也沒堆什麼東西，跟我想像中的報社非常不一樣。我在一個現代化的大樓裡當記者，在這裡工作的人是穿西裝打領帶的上班族，而不是自由率性、橫衝直撞追求正義公理的一個記者。

當時報業市場上由《中國時報》、《聯合報》兩大報競逐龍頭地位，《自由時報》相對而言屬於新興的小型媒體，派報與鋪貨系統尚未建置完全，一般小型雜貨店甚至買不到《自由時報》，許多人連報刊名字都會記錯。身為《自由時報》記者的何榮幸就曾因為《自由時報》的知名度太小，受到採訪對象的忽視。

對照學生時代叱咤校園的地位，甫踏入新聞圈的何榮幸遭受到小媒體／菜鳥記者的冷眼對待，相對剝奪感比一般職場新鮮人來得更大，從前校園中的行動邏輯轉換到新聞場域上不見得可行，在新聞現場沒有人認識「台大學生議會議長何榮幸」，何榮幸瞬間從 somebody 變成 nobody，名聲與能力必須從頭累積。

我剛進社會有一段時間調適不良啊，我遞出名片時我的採訪對象都不鳥我，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時候立法院副院長饒穎奇，我前後不知道跟他遞過 N 次名片，但是他每次都是一拿，喔喔喔，我每次都說我是自由時報的記者跑立法院，請多聯絡，他每次都是喔喔喔，可是我親眼看到他跟中國時報、聯合報的記者多熱絡……

採訪對象的大小眼，讓初出茅廬的何榮幸適應不良，甚至有一段時間不大願意遞出名片自我介紹。曾經有新聞前輩建議何榮幸寫幾則批判的報導來贏得採訪對象的禮遇，但何榮幸始終堅持謹守本分，不濫用記者職權，而是藉由轉換自己的心態，積極面對，用行動證明自己的能力。這樣的處境也讓何榮幸直接面臨了「想當一個甚麼樣的記者」的入行命題。

我要當那種連續修理他十次只因為我是菜鳥記者我希望他來重視我，我要用那樣子用社會公器來遂行私人的目的嗎？還是我只能乖乖來，一步一步藉由他有一天看到我的報導跟分析，他覺得他很欣賞，因此他來特別重視我這個記者。

這一段在小媒體蹲過的小記者經驗，意外左右了何榮幸在記者價值與信念。正因為切身感受過大媒體／小媒體、大記者／小記者的差異，讓何榮幸在挫折與掙扎中開始思索自己究竟想要當一名甚麼樣的記者，以及自己想要怎麼運用記者所具備的特權(指記者的影響力)。

對何榮幸而言，與其假借記者職權，刻意批判、修理採訪對象來引起注意與重視，他寧願選擇花時間茁壯自己心中的理念，建立新聞專業以折服眾人，「**操之在急的不在技術，而是可以堅持一輩子的念頭**」，何榮幸理解到唯有時間累積出記者專業與資本，以及透過新聞專業的「被看見」、「被肯定」，不斷地證明自己，才能作為一名自己理想中的記者。

也許每一個剛入行的菜鳥記者都遭遇過不平等的待遇，這是從資淺到資深的必經磨練，但每個人在這段過程中所作出的回應和選擇可能全然不同，每一個人做選擇的背後所依附就是自己心中對於記者的職業想像與新聞專業意理。對何榮幸而言，「我從來就覺得除了告知、娛樂，這些基本功能之外喔，媒體的一個重要功能是監督政府。然後，嗯，伸張正義。」能夠伸張正義，鍥而不捨地追蹤調

查，藉以揭發不公不義，正是這些對媒體職責和記者角色的理想圖像指引著何榮幸在記者職涯中的每一個分叉口做出選擇。

參與自立事件、創立記協

跟大多九零年代初進入新聞場域的記者不同的是，何榮幸在台大求學時期，積極參與校園學生運動，編輯刊物的緣故接觸了如《人間》、《當代》等具批判意識的雜誌，因而埋下對社會改革與媒體改革的想法。所以在跑新聞兩三年後，何榮幸逐漸不滿足「只作為一名記者」，遂與幾位擁有共同理念的記者同業組成讀書會，研讀當代新聞論述或討論時事，希冀推動媒體改革。但就在讀書會運作沒多久後，發生了自立事件¹⁰。

當時為了聲援《自立晚報》，新聞界發起一連串活動響應《自立晚報》新聞工作者的訴求，並且走上街頭遊行呼籲新聞專業自主。在搶救《自立晚報》的過程中，包含何榮幸在內的九〇一決策小組後來又依循著新聞界前輩司馬文武的建議，趁勢組成一個由新聞記者自主發起的新聞專業組織，就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台灣新聞記者協會」(以下簡稱記協)¹¹成立，由何榮幸則出任第一屆記協會長。

彼時的何榮幸，跑新聞之外的其餘時間幾乎奉獻給記協，東奔西跑推廣編輯室公約與新聞工作者自主權，並固定在記協雜誌《目擊者》上撰寫媒體改革評論或專題報導，或發起活動伸援新聞自主遭限縮的同業。然而，投身媒體改革運動後的何榮幸，雖然滿足了「不甘於只是一名記者」的心願，卻也從報老闆與新聞同業身上感受到壓力。

《自由時報》老闆林榮三好幾次在有主管跟記者的場合，用直接或暗示的方式說：「榮幸啊，當記者就好好跑新聞，記者工會跟記者協會

¹⁰ 1994年自立報系經營權轉移，引發「自立事件」。自立工會和部分記者發起連串抗爭，爭取員工勞動權益和保障編輯獨立自主，將整起抗爭提升至新聞自主運動。

¹¹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Assocaiton of Taiwan Journalists)，簡稱台灣記協、記協、ATJ，是由台灣新聞工作者、新聞相關科系學生自由入會的民間組織，於1995年3月29日正式成立，成立宗旨為「爭取新聞自由、提升專業水準、保障新聞工作者獨立自主、落實新聞媒體為社會公器之責」。

理事長那種事情交給老記者吧。那種都是跑了十幾年的老記者去做。

年輕記者就好好跑新聞。

除了在報社內被老闆告誡不要搞太多跟資方作對的「外務」，何榮幸更多的壓力源是來自於新聞同業的看法。在資方面前，何榮幸還能以好好跑新聞、做好份內工作來應對報社的特別關注，但面對同業的質疑，何榮幸一度心灰意冷，認為自己替自己招來一份吃力不討好的苦差事。

當時推動「新聞倫理公約」，呼籲記者不要拿紅包，這對於我們來講應該是再簡單不過，也是最基本的認知，可是台灣新聞界長期存在這樣的現象，尤其是中南部，我們為了發起這個運動訂了新聞倫理公約，到中南部辦座談會，那時候我清楚感受到中南部有些記者覺得台北記者不但自命清高，而且還破壞他們的福利。

面對同業的不諒解與批評，何榮幸起初情緒憤慨，覺得要是以前那個充滿正義感的自己絕對會站起來拍桌大罵「**什麼我們自命清高，是你們太爛！**」，但當何榮幸認知到自己作為記協會長的身份，最大的責任是組織理念的推廣和落實，「**越來越覺得把事情做成功比較重要**」，為了達成最終目的，何榮幸理解到當自己越是以一種抽象的論述或道德去與人辯論，越是容易引起他人的排斥和抗拒，與其將自己標舉到某種高度審視他人、與人對立，還不如同理每個人不同的立場，以充分的相互理解為前提。

最終，何榮幸學習改變姿態與異議者對話，學著先搭建起溝通橋樑，學著站到他人立場去理解他人的難處與想法，學著適度地妥協，以退為進，在現實與理想中求取平衡。

2000 年轉進《中國時報》

就這樣在不斷跑新聞、搞記協，反覆追尋著平衡的日子裡，何榮幸在新聞圈闖出了名號，他不單只是因為「做運動」出名，在「跑新聞」上也備受肯定，一路從《自由時報》市政組記者、政治組記者晉升為市政組組長。此時九零年代中期的媒體大環境，隨著經濟不景氣加上電子媒體興起，報紙發行量與廣告量都急速下跌，報業步入漫長的寒冬(王天濱，2002；白師瑜，2005)，台灣媒體市場的形構與邏輯也因而繼解嚴後再次轉變，改以閱報率／收視率機制建構出一套新的媒體經營學。不過，雖然整體報業衰退，異軍突起的《自由時報》卻也透過贈送免費報給各級機關學校，高額贈品吸引長期訂戶等商業行銷手法，在近十年之間成功擠身為全國第三大報，影響力扶搖直上。

廣告市場總體萎縮後，各家報紙必須尋求特定政治立場的讀者來穩定發行量，於是主要大報開始將藍綠區隔與市場區隔緊緊捆在一塊，電視台也因收視率至上原則及惡性市場競爭之故，養成了零碎化、躁進、去政治化的新聞實務模式。即便脫離了解嚴時代的權威管制，台灣媒體產業卻進入了另一段被經濟力掌控的黑暗期，無論平面亦或電子媒體皆成了被政經勢力豢養的禁臠，而一向利益取向的《自由時報》自然也無法置身事外。

儘管何榮幸在《自由時報》越來越受器重，還獲得寫專欄「台北新空氣」的機會，評論台北市政府的施政，但專業自主空間緊縮所造成的不舒服感，終於在 2000 年總統大選前夕到達極限：

有一天，突然高層轉達一個訊息說，老闆的太太看了有一天我寫的專欄，非常不高興，說怎麼可以批評連戰？批評國民黨是黑金政權？當時《自由時報》在 2000 年總統大選的立場很清楚，是支持連戰的。高層就建議這個專欄要不要停掉，或者是說如果要繼續寫，一個人寫

會不會太辛苦，要不要讓其他同事加入？碰到這種事情，大概就知道是該走的時候了。

離開《自由時報》後，何榮幸轉往《中國時報》。

之所以選擇《中國時報》，除了何榮幸長期對《中國時報》的自由主義辦報風格較為認同，「雖然《中國時報》會被認為很騎牆派、老狐狸，在那個時間常常有人認為一會兒藍、一會兒綠、一會兒統、一會兒獨，那到底是甚麼樣的報紙，可是我反而喜歡這樣子，有多元色彩，自由派風格的報紙。」又恰巧碰上當時《中國時報》的政治組主任夏珍跟副主任張瑞昌的遊說挖角，2000 年政黨輪替之際，何榮幸便來到了《中國時報》政治組。

余紀忠越級提拔，自由書寫空間

當時《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仍在世，報社內部向來有個不成文的規定，老先生余紀忠會點名新報到的記者中較為賞識的記者進辦公室聊聊。何榮幸剛到中時報到時，就曾被余紀忠「叫上去」過。



我算是余紀忠過世前幾年，有被他照顧到的人。讓我更意外的是他居然有看《目擊者》雜誌，當他跟我說他有看目擊者的時候，我對他真的是欽服，有老闆願意看《目擊者》真是太感人了。……沒想到過了幾年之後，他直接點名要我寫小社論，如果不是他點名的話，我可能在《中國時報》排個十年都還輪不到。

傳統兩大報的組織文化皆具備濃厚的人治色彩，相對於《聯合報》的家父長制的管理，《中國時報》的組織風格偏向鬆散、隨性，報老闆余紀忠不吝給予記者自主發揮空間，經常越級提拔記者。何榮幸因為受到余紀忠的賞識，進中時兩年後便越級加入中時筆陣，撰寫小社論。

轉進《中國時報》後，何榮幸持續關懷媒體改革，2000 年他加入「無線電視民主化聯盟」¹²，擔任執行委員，並且持續在報章雜誌上評論媒體公共化的重要性，在書寫題材與內容上擁有充份的決定權。在這期間，何榮幸未受過中時高層的任何約束，享有《中國時報》特有的自主模糊空間，何榮幸甚至在「追尋媒體公共化願景」系列評論獲得第三十一屆曾虛白報紙評論獎時的感言還提到「我雖然以媒體公共化系列評論得獎，但直到現在，我仍然不知道《中國時報》老闆對於公共化的真正態度，我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中時老闆與高層從未影響這一系列評論的方向。」由此可證，中時多元的報社文化以及老社長的賞識讓何榮幸的書寫空間更為開闊自在，只要高層沒有出聲反對，何榮幸就一直把自己對於媒體改革、社會議題等個人理念「偷渡」成為中時小社論的觀點，在沒有任何人喊停之前，一篇又一篇地寫下去。

但這樣多元自由的報社文化不表示《中國時報》未受到政治立場或商業利益的牽制，何榮幸也不避諱地坦承，在設定小社論題目時難免會自我設限，報社較為敏感的兩岸關係、統獨等政治議題，何榮幸會刻意迴避不碰，或是在交稿後因內容觸及報社立場而臨時抽換題目。這時何榮幸就會應用他在記協時期練就的平衡技能，在該退守之處適時的退一步，在可前進之處則進攻到底。

如果是小社論，我會覺得報社有立場，因為它是代表報社的立場，報社有資格跟報社可以去決定哪些東西應該願意成為它報社的立場，所以那部分通常我就摸摸鼻子，我不會有太多的去抗議或抗爭。那有掛我何榮幸的名字，白紙黑字我就要對我自己負責，那不是報社的立場，所以那個部份我就會儘量去爭取。

¹² 無線電視民主化聯盟，簡稱無盟，由徐佳士、李瞻、潘家慶、鄭瑞城、成露茜、陳世敏、賀德芬、林孝信等八位名譽召集人及一百多位傳播學者共同發起，於 2000 年成立，聯盟宗旨為推動「反對徹底私有化、台視和華視公共化、中視和民視專業化、無線電視民治主化」等四大訴求。2003 年，無盟改名為媒體改造學社(The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簡稱「媒改社」，以改造台灣媒體結構、提升全民媒體素養、保障傳播從業人員工作權，以及健全本土傳播生態為宗旨

轉往《中國時報》之後，何榮幸的重心也明顯轉往個人新聞專業。對何榮幸來說，踏入新聞圈近十年，「不斷在報社外衝衝衝，總是會覺得少了些什麼。所以我回到新聞工作、新聞本業上面一些更可以被報社肯定，被同業普遍肯定的一些留下來的東西。」。因此兩千年後，一方面是隨著何榮幸職位的升遷，工作量漸增，一方面也是何榮幸想要花更多的心力陪伴家人，再來則是過去十年猶如薛西弗斯推動著媒體改革這塊巨石，除了不時有狗吠火車的無力感，媒體大環境的快速變動更讓何榮幸深感挫折，因此他選擇專注經營新聞專業，從社會實踐公共參與回到個人新聞專業，有計畫性地轉移陣地，以《中國時報》和個人部落格為主要發表平台，試圖透過文字傳播理念，並記錄發揮新聞專業的成果。

另外，何榮幸逐漸退出記協的核心職務，改而參與以傳播學者為主要組成份子的媒體改造學社，以新聞實務工作者的角色提供更務實的想法，與學界思維相互激盪，共同擬訂傳播相關政策。

三大新聞獎的專業肯定

2006 年，何榮幸接任《中國時報》政治組副主任兼國會小組召集人。在一次帶領實習記者與客委會主委羅文嘉的談話中，偶爾談及台灣諸多閒置的公共建設，羅文嘉感嘆在大部分縣市長「只重硬體不重軟體」的迷思下，客家文物館淪為「蚊子館」，在一來一往的言談過程，何榮幸興起了體檢公共建設閒置浪費的動機，接著他開始說服其他國會小組同事與報社高層，得到他們的支持與共識，大家犧牲國會記者的暑期休假進行採訪，形成一個調查報導工作團隊，才有了「體檢公共建設—台灣公共建設閒置浪費的診斷與對策」的深度專題的誕生。

體檢公共建設系列報導刊出後，除了廣受讀者的回響與肯定，也引發朝野關注公共建設閒置的問題，深度報導發揮了媒體功用，監督政府施政，更在媒體界產生共鳴效果(consonance effect)¹³，引起其他媒體跟進報導。

¹³ Noelle-Neumann 等研究 1968 年倫敦的反越戰示威，發現有意見領袖媒介的存在：英國的建制

有了第一次深度報導的成功經驗後，何榮幸與國會小組的記者群在路線工作之餘，陸續策劃了「休耕啟示錄—農地休耕政策的破敗與出路」、「全台飄飢慶—文化大拜拜的迷思與出路」專題報導，而前兩則報導分別獲得吳舜文新聞獎和卓越新聞獎；何榮幸在小社論撰寫的「追尋媒體公共化」系列報導也獲得了曾虛白新聞獎。

我認為深度採訪、調查報導的價值絕不下於常態新聞。過去台灣媒體常將專題報導視為週末假日「填版面」之用，或是平常缺稿時的「救火隊」，但媒體版面平常已經充斥太多政府機關及有權有勢者的聲音了。

(何榮幸, 2006, 頁 51)

何榮幸之所以能獲獎，除了所報導的議題具有公共性，行文流暢也是原因之一。學生時代就擅長寫分析的何榮幸，當上記者後，在社會現象、政治動態與媒體改革議題上，何榮幸抓緊機會在報章上以特稿、專欄發表評論，試圖以文字影響輿論。在記者歷程中，何榮幸除了將觀察力磨得越來越敏銳，在報導中也一次又一次累積出寫得一手好故事的能力。

新聞工作不斷累積我如何說故事，把故事說的精彩、說的深刻，這個部份對我來講是很重要的歷練跟累積。我覺得說故事是一個很重要的專業，怎麼把故事說給讀者聽，讓讀者看了覺得願意去看，而且看完之後覺得有所收穫，我覺得這很重要。

媒介如 *Times*, *The Guardian* 等最先報導相關新聞後，其他報紙才跟進報導，且意見領袖的內容為其他報紙所採納，形成一股連鎖反應，這種議題流動方式被稱為「共鳴效果」(consonance effect)。共鳴的產生原因有二：其一是新聞記者之間也有意見領袖；新聞同業間的共享新聞價值亦為成因之一。(引自許傳陽, 1992)

不同於其他性質的文字工作者，主流媒體的新聞記者面對的讀者是一般大眾，因此將詰屈聱牙的文字化作流暢易懂的文章，將艱澀繁瑣的政策化為親近簡明的報導，文字精彩、深刻、易讀性，應是作為訊息傳遞媒介的新聞工作需具備的能力，如此才能有效傳達報導內容。

接連獲得三大新聞獎項，除了讓何榮幸的新聞專業獲得肯定，更讓當了十多年政治記者、逐漸感到彈性疲乏的何榮幸，再次重新思索了主流媒體內的記者所能發揮的力量，以及深度專題報導的意義，如同何榮幸自己在卓越新聞獎新聞採訪報導獎的頒獎禮典中所言：「任何一項深度專題報導，都是新聞工作者自我改造以及再教育的過程。」（何榮幸，2006，頁158）。

08年，化報社危機為個人轉機

2008年六月，《中國時報》大動作裁員，地方新聞中心裁撤，各路線縮編整合，何榮幸時任政治組主任，同時作為一名負責裁員的主管與關注勞動權益的工會成員，衝突的身分讓何榮幸左右為難，何榮幸此時以個人名義書寫聲援中時工會的文章「有工作權才有記者尊嚴——籲請中時同事加入中時工會」，並公開簽署針對中時資方的「三要」連署書¹⁴，藉此表達個人立場。與此同時，何榮幸期望自己十七年的政治記者生涯有所突破，亟欲尋求改變。

七月，這個被何榮幸謔稱為「廢墟開出一朵花」的調查採訪室正式成立。在變動之際，報社反而成立了名為「調查採訪室」的深度專題報導的新單位，乍看之下，似乎是意圖轉型為精英報所採取的逆向操作，但其實調查報導單位在中時已行之有年，只是運作不穩，前前後後成立又廢除多次，雖然何榮幸曾多次在報社內呼籲恢復調查室，當時報社基於人事與運作考量並未採納。但就在報社試圖重新定位閱聽眾市場，力挽狂瀾，總編輯王健壯與政經中心主任夏珍便重拾了以深度報導提升報紙內容品質的想法，主動徵調何榮幸為調查採訪室主任，並授權

¹⁴ 何榮幸文章詳見 <http://blog.chinatimes.com/turtle/archive/2008/06/30/293638.html>

「三要」訴求：要保障勞工權益、要落實產業民主、要成為社會公器

由他蒐羅組員。

對於一個屢屢獲得獎項肯定、被認定為報社「接班梯隊」的人來說，何榮幸離開了前程似錦的主管位置，轉往一切模糊未明的新單位，這樣的冒險讓身邊的人感到不解，但何榮幸之所以下此決定，是因為「我一直是希望能夠以多做一些有意義的調查報導做為當記者比較久的價值跟意義，有沒有進入那個接班梯隊對我來講不是優先考慮的事情」，於是，他選擇到調查採訪室，做他認為有意義的事情。

然而，調查採訪室並非在一開始就得到所有人認同，在媒體產業編制紛紛萎縮的潮流下，反其道而行的調查採訪室被看作「一個不被祝福的團隊」。

當所有的中時各單位都在裁員，只有它新增，所以很多人在等著看它到底能夠做出甚麼，加上它過去有太多次經驗被認為是失敗的經驗，就是成立了沒有多久就倒、成立了沒有多久就倒，然後又常常出現各種問題被認為是跟線上記者會踩線，或者是說寫的東西太冷門、或太學術，沒有人要看，然後長期都只是在很後面的版面，種種的因素所以不被看好。

接下調查採訪室主任後，何榮幸緊接著是尋找成員，「我當時一個優先的方向是我要找跟我不一樣的人哪，我不要找跟我同質性很高的」。何榮幸排除自己的政治線專業，尋找其他路線好手，他第一個找的是對原住民、農業、社團議題有所經營的高有智；後來何榮幸又陸續往財經組、社會組、網路電子報方面的「挖角」，四處打聽，依憑著這幾位記者在路線領域上累積出的聲望找到他們。新的調查採訪室於是隨著何榮幸盤旋腦海多年來的想像逐步成型。

四人之中，高有智是何榮幸之前一起合作深度專題報導的政治組夥伴，因此已培養出高度默契。郭石城在桃園擔任地方特派員，何榮幸打電話詢問郭石城加

入調查採訪室前，兩人互不相識，僅透過彼此的報導知道彼此的存在，當何榮幸在電話中說明來意時，郭石城只問了一句「可以寫自己想寫的東西嗎？」便點頭答應了。謝錦芳則是在財經組擔任主管，因為作風嚴謹踏實，財經專業知識厚實，何榮幸因此找上她。

最後一個報到的黃哲斌，到職的過程則較波折。何榮幸原本在中時部落格等網路社群中與黃哲斌互動頻繁，當他詢問黃哲斌是否願意由《中時電子報》轉往調查採訪室發展時，礙於黃哲斌職責在身，無法即刻轉換單位，這項人事調動甚至經過《中國時報》和《中時電子報》雙方高層同意，後來黃哲斌在十月調往調查採訪室，由何榮幸、高有智、郭石城、謝錦芳、黃哲斌五人組成了號稱「史上最強陣容」的調查採訪室才總算全員到齊。

這五位記者，除了高有智年資尚淺外，其餘四位都是跑新聞近二十年的資深記者，在自己的專業路線上都已經營出一番天地，擔任到主管職位，在報社遭逢裁員、經營權轉移之時，他們都還願意待在《中國時報》，並且重回新聞線上從事深度專題報導，雖然五個人各自的理由殊異，卻都有個共同的想望：「在惡劣大環境中做為一名記者，還想再盡力做些甚麼」。

主流媒體內的非主流

對何榮幸來說，如果能同時兼顧社會實踐以及運用媒體記者的身分改變社會，是兩全其美的方案，雖然在過程中可能為了向現實靠近而稍有妥協，但至少佔據了一個被看更多人看見的發言位置，也因為這個理由，在報導中夾帶理念的可能性尚未消失前，何榮幸絕不輕易放棄主流媒體記者的身分。

在非主流媒體你的理想性可以得到更大的伸張，然後更不受組織的束縛，可是相對之下你的影響力就不高，所以我長期選擇主流媒體的戰場是因為我還是覺得主流媒體的影響力很重要，在主流媒體裡面做跟在非主流媒體裡面一樣的事情，但是如果在主流媒體裡面能夠做到，它的

意義跟價值就完全不一樣。

在調查採訪室策劃的〈我的小革命〉專題中，調查室曾經介紹過獨立媒體、小眾媒體或自由新聞工作者，如參與三鶯部落抗爭的苦勞網特約記者江一豪、立報記者兼部落格寫手胡慕情、社區周報山城周刊以及莫拉克風災新聞網等，這些其實都是調查室有意識地策劃，刻意藉由這些非主流媒體或媒體人所做的事情反省主流媒體的長期失職。「在主流媒體上面自己去對主流媒體在報導公共政策上表達強烈的不滿，所以我們報導這樣異議團體的故事」，何榮幸認為，主流媒體在閱報率上確實擁有較廣的影響力，也能帶動其他不同屬性的媒體跟進採訪報導，觸及更多的閱聽眾。調查室所做的報導就是希望能透過這種方式將想要傳遞的價值觀廣泛傳散出去。

在新聞專業與社會實踐中求取平衡，其後在主流媒體內致力深度報

導，一步步走到了中時調查採訪室的戰鬥位置。在這層意義上，「我的小革命」專版何嘗不是過去二十年我跟所有夥伴為實現理想而努力不懈的某種隱喻。

（何榮幸，2011，頁8）

在調查採訪室成立之前，何榮幸偶爾尋獲一些志同道合的夥伴，一同在報社內爭取專業自主空間，但大多時期都是在自己堅信的信念之路上隅隅獨行，調查採訪室成立之後，融合了集體挑戰的戰鬥力。相較於以往中時成立過的調查室，此次單位的企圖心更旺盛，雖然成員數是有史以來最少的，卻是經營最多版面的一次，每周兩塊固定專版，不僅只在星期六日出刊，星期一到五平常例行性的新聞也會跟其他的新聞一起競爭版面，三不五時就去搶占前面動態新聞的版面，調查採訪室所作的專題甚至集結出書，成果比之前的調查室還要豐碩。調查採訪室

的存在，對何榮幸個人而言，就有如最後一座堡壘需要去捍衛、去守護，並以此為基地，協同集體力量突圍進攻。

不美化記者職業，不放棄證明自己

回首二十年的記者生涯，何榮幸從一開始的充滿理想性格、橫衝直壯的菜鳥記者，一步步走到今日的踏實卻不失熱情。修正了年輕時代的夢幻革命憧憬，學會先認清周圍環境與可善用的資源，以可行的途徑到達目的地。

報社立場與個人信念的衝突，有些時候是「是非題」，有些時候是「選擇題」，有些時候則是「多元複選題」，新聞工作者應該衡量自己可以接受的衝突範圍，並且設定無法妥協的終極底線。在還沒有碰到底線之前，應該盡最大努力堅守戰場，一點一滴試探及爭取專業自主空間。」

(何榮幸, 2006, 頁 329)

他也曾想過要離開媒體，但最後還是留下來了，自許為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與理想主義者的何榮幸，在每一次職涯分岔口時，都做出了一個對得起自己信念的抉擇，「每個時代的命題、課題跟挑戰永遠都不一樣，那你只要在這個時代面對你所碰到的挑戰跟課題，盡量用你這個時代能夠有的記者的條件跟資源去做好，其實也就是在這個時代能夠做的事了」，因此何榮幸善用自己身邊可取用的資源，即使在與現實與理想的狹縫中前進，他體認到自己一點一滴的改變，但同時他仍堅守住自己的最後底線，隨時抓緊機會在主流媒體內搞「叛逆」。

而在行動之前，他也永遠都為自己準備好絕佳狀態，因為記者路上的歷練讓他相信「時代不是你能改變的，在工作一開始也不可能馬上就能施展理想，因為你必須先『證明』自己」。

第二節 高有智的職涯圖像

我盡量寫我認為好看的、有意義的報導，這是我自己實踐的面向。

我要做別人不想做的報導，或用不同角度書寫，其中包含對其他議題的聲援，例如公視的預算問題，我參與連署、遊行、寫文章、講幾句話，或者加入組織，例如記協，透過一些夥伴，大家共同努力。

(高有智訪談稿，2008)

高有智，1975 年出生，高雄人。考取台大新聞研究所之前念的是台大動物系，他是調查採訪室五人裡頭最資淺的一個，也是唯一具備理科背景的一個。

因為信仰的關係，大學時期高有智參加了長青團契，因緣際會接觸了原住民部落，意識到社會結構的不平等才是致使弱勢族群處境艱難的主因，心裡便燃起想為他們做些甚麼的念頭。於是，高有智開始利用課後之餘到各地原住民部落擔任課輔人員，協同夥伴走上街頭伸援社會運動，還曾組織學生到台南七股反對設立濱南工業區¹⁵，這樣的街頭經驗也影響了高有智在日後轉換跑道，從生命科學領域走到新聞傳播媒體。

【高有智的職涯圖像】

善於連結多方資源，創造多贏局面

頻繁的校外活動，接觸到與自己生命經歷完全不同的人事物後，高有智漸漸對於實驗室的真空文化感到質疑，再加上民間草根活力的牽引，高有智心裡

¹⁵ 濱南工業區是臺南縣於 1990 年代的一個工業區開發計畫，由東帝士與燁隆兩個財團所提出，準備在臺南縣七股潟湖與沿海地區填海造陸，開發七輕石化煉油廠、大煉鋼廠與工業港。最後在環保意識抬頭下中止計畫，並於 2009 年成立台江國家公園保育濕地生態。

那份價值感更鮮明浮現，相對於待在實驗室內進行程序嚴謹的科學研究，高有智更喜歡在鄉間、在街頭與各式各樣的人們聊天，親身貼近他們的生命情懷。因此他在大三決定轉換跑道，從前景看好的生命科學領域換到人文社會領域。

高有智最初屬意到推動社會運動的民間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擔任組織工作者，但與家人幾經商量後，為了確保將來工作的收入穩定，高有智便想到了「記者」一職，得到家人同意後，高有智開始到外系修習社會科學等相關課程，為轉換領域做足準備。

順利考進台大新聞所後，因為目標明確，高有智有意識地修課、實習，「很多人就覺得他念新聞系然後就一定要考個研究所，可是因為我經歷了變化，我經歷了改變，所以我知道我為什麼要念新聞理論或者是要當記者」。基於對原住民部落的關懷，高有智早早決定好研究領域，並在課餘時間擔任消費者報導雜誌社特約記者，增加自己的實務經驗。

正是因為理組訓練下的縝密邏輯，讓高有智對事情的計算考量更為理性、更講求步驟，或是明確的志業目標讓高有智比其他同學擁有高度自覺，高有智在研究所時期就很懂得抓緊周邊資源。除了修課方向、及早「訂下」指導教授，高有智也因為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在台灣教會公報當特約記者，利用教會系統深入各個原住民部落做採訪，以記者兼研究生的雙重身分進入田野，同時解決了尋找受訪者與車馬費的問題。

我覺得這一套的方法論也影響我當記者，時間真的都很短，那你怎麼樣用最快速的方法把議題都吸收，而且是能夠吸收最深入，那你總是要有一個方法去節省時間，而且不要重複去浪費。

這就是高有智的獨特之處，他懂得如何紮實地抓緊資源作為自己目標的後盾。

用熱情與策略讓冷門新聞躍上版面

2001 年，台灣媒體正經歷了一波大震盪。《中國時報》大動作裁撤中南部編輯中心，再加上歷史悠久、本土意識強烈的《自立晚報》停刊，媒體大環境進入冰原時期。在媒體人力緊縮的景況下，高有智先是進入《教會公報》擔任記者，2002 年才考進《中國時報》。一進《中國時報》，高有智就自願分發到教科文組跑社團線，這樣路線選擇除了符應他個人的社會關懷意識，他也自嘲「反正那條線也沒人要跟我搶」。

我一路就是希望我能夠取得那個位置做那件事情，我的價值告訴我那個才是我 care 的、我關心的，所以我就跟報社講我要跑社團線。我比較幸運的是我一開始就跑我喜歡的線，雖然他不是報社熱門的線，大家覺得說新進記者最優秀的就是要到政治線，對，可是坦白講我現在重新想一想我都不這麼認為。

就像高有智說的，別人眼中的優秀記者應該要到政治線，他跑社團線卻甘之如飴，因為那正是他當記者所追求的：**替弱勢發聲**。

然而，跑新聞除了懷有熱情，也需要找對方法、用對策略。高有智每天勤跑新聞，勤發在報社眼中所謂無足輕重的稿件，即使寫稿的當下已經預知稿件無法見報的命運，但在高度新聞熱誠的支撐下，以及一股不服輸的氣勢，高有智不放棄任何一個書寫的機會，隨時處在最佳狀態，等待時機讓報導躍上版面。

在熱情與困境中儲蓄了新聞處理能力，高有智於是發展出一套冷門新聞突襲版面的策略。長官眼中不起眼的小新聞，到了高有智手裡便被賦予了生命力與價值，同樣的一則新聞，別的記者依照制式的寫作模式與價值取捨撰寫成報導，高有智卻能從不同的新聞中抓取共通點，搭配熱門議題，增加報導的重要性，讓報社覺得非登不可。

比如說 A 團體開了甚麼，B 團體開了甚麼，你中間怎麼去做一個連結，它是不是一個社會普遍的現象，或者是欸發現老人這邊在缺錢小孩這邊也在缺錢，甚麼團體也在缺錢，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原因，是不是有甚麼磁吸效應，還是最近遇到甚麼大問題，其實你把它綜合來寫報社會覺得這個稿子重量更大，因為他覺得這個東西其實是橫跨了很多社福界的共同需求。

身處冷門路線，讓高有智練就了對新聞窮追猛寫的本領，抓緊任何機會讓自己認為有意義的新聞曝光，在議題與版面所需時讓報導即時上場；理科背景的思維則讓高有智具備著獨到的整合組織能力，與見樹又見林的分析洞見，除了能把好幾碟新聞小菜融合，燉煮成一桌滿漢全席專題，高有智同時也發揮了「社會學的想像力」，將個人的生活處境與社會的歷史脈絡放在一起，在新聞報導中理解個人和社會歷史複雜交織的關係，深化新聞觀點。

那我為什麼會想到這個，一部分是熱情，再來就是環境磨的，啊我覺得我就是被丟到很不爽(笑)，然後被丟到不爽那我還是想要做一些甚麼事情……我越來越了解甚麼叫做蓄勢待發，你要做好準備，你才能隨時搭配這樣的議題能夠去上稿，這個就是策略。

到政治線了解上層結構

在社團線跑了兩年後，報社總編輯欽點高有智到更有能見度的政治線國會組，高有智起初認為自己在原本路線待得很開心，於是意興闌珊地兩度回絕長官的調度。後來自己轉換了思考角度後，高有智認為既然花兩年時間去了解民間團體的倡議方式和運動目標，也應該換個觀察位置，就近監督公部門，才能更全面

地理解社會上的弱勢族群如何在國家機器的利益考量與交換中被消音與忽視。

我在社團這個最底層也夠了，我想要去了解整個國會運作，怎麼在讓這些聲音為甚麼到國會就不見了，政治現實是甚麼，然後所謂的公民運動、民間力量為甚麼沒有辦法影響到整個國家決策。

到了政治線國會組後，高有智和何榮幸成為同事。2005 年，在何榮幸的號召下，國會組的全體記者投入了深度專題報導的書寫計畫，幾篇深度專題報導皆有獲得新聞獎項的肯定，隨後高有智更發揮了之前的路線專業，探討台灣農業議題，與何榮幸兩人聯手製作「休耕啟示錄——農地休耕政策的破敗與出路」專題，獲得第四屆卓越新聞獎新聞採訪報導獎。

原本只是想到國家政府部門探個究竟的高有智，在政治線待了四年，就近看到政治新聞的侷限，身處國會組，面對立法院內政治人物的惡鬥，卻又不得不寫的新聞產製邏輯，讓高有智時常有身不由己的束縛感，更曾經因為報社政治立場而篩選見報稿件的媒體文化，讓高有智跟編輯台產生嚴重衝突，甚至興起了「老子不待了」的念頭。

不甘於被體制馴化

高有智(2010)在《教會公報》發表的一篇文章裡曾提到媒體不只是商品，也不該是報老闆意志舞台，悲哀的是，這兩者都是當前台灣明顯的弊端，造成媒體公信力的衰落，也是改革媒體亂象的源頭。雖然媒體產業在高有智入行時就已逐漸走下坡，但 2008 年中國時報 618 裁員災變，無疑是將報業危機一夕之間炸上檯面，為了政治立場與商業營收而賠上了新聞業最驕傲的公平、正義、客觀、真實等新聞價值，身處其中的高有智，因此動了求去的念頭。

高有智感嘆入行八年，媒體惡化速度驚人，雖然表面上擺脫了政治力的空置，商業力卻咄咄逼人，掐緊了媒體經營者的喉嚨，也進一步控制著新聞工作者

的專業自主空間。

過去的敵人可能你很清楚是報社外部的政治大怪獸，現在是連你的敵人是……你的主管就認為你該這樣做，或者是你更上面的人一半交下來就是大家都沒有辦法抵抗，然後那是一個更大的困境，到最後只能決定你還要不要留在這個位置，你要留你只能做，就只能這樣而已，那已經沒有一個轉折了。

商業邏輯所帶來的不可承受之重，除了業配新聞迫使記者交出專業自主，組織以財力緊縮為由降低工作者的勞動條件，更幾近將記者們逼上絕路，在連飯碗都難保的困境下，新聞專業也節節敗退，

不論是苛扣出差費用，簡化人力，加重工作負擔，或者大量引用低薪資新人取代資深記者等手法，背後都是凸顯成本考量的新聞媒體運作過程。換言之，「賠錢的新聞」越來越不受重視……

（高有智，2010）

而經營權易主旺旺集團後，勞動條件雖未惡化，甚至因報社虧損減小，記者們年終獎金是這幾年的新高，但相對之下以商業集團方針管理的高層更重視員工績效，以往《中國時報》文人辦報的標榜正逐漸淡化，轉而奉集團利益為圭臬，報社越來越重視成本控管與營收效益，因而在採訪費用的補助上越來越嚴苛審核，同時「他會期待有更多版面能夠把它當作商品，去達到營收跟支出能夠打平，甚至能夠賺錢」，將媒體視為牟利商品的作風更加鮮明。

對於不如歸去的謂嘆，樂觀的高有智卻抱持正面解讀，他認為之所以想離開，代表自己不甘在大環境中載浮載沉。因此，當何榮幸力邀他加入調查採訪室，

高有智選擇到那裡，再努力看看。

轉化資源，務實撐出自主空間

《中國時報》多年來維持的組織文化，相較於其他報社，中時編輯部一直有濃厚的自由主義色彩，讓新聞工作者與報社主管相互尊重報社的體制倫理與異議，正因為中國時報相對教包容、允許異議記者的存在，因而《中國時報》長期育養出一群各具風格及筆路的新聞記者。也因為如此，即使看似有千百個離開的理由，高有智仍舊選擇留在中國時報，「某種程度而言，我覺得自己得到救贖，如此的空間在別的地方很難存在。這個團隊裡面，同事和報社都習慣我常寫弱勢的東西，彼此有默契。」

有了之前與何榮幸一同做深度報導的經驗，高有智在中時裁員改組之際被徵召到調查採訪室。對於調查採訪室在中國時報的角色，高有智認為在現今的媒體景況下本來就沒有完美的地方，但至少能夠寫出自己想寫的報導，或者挖掘有意義的題材，就有留下來的必要。

而一如往常，高有智注重策略的應用，適度地運用策略、善用資源，將看似平淡無奇的事情包裝出美好意義，甚至更進一步扭轉其內涵，導向好的路徑，這正是調查採訪室在變動之中存活下來的訣竅。比如裁撤地方中心後，面對地方新聞的不足，高有智在調查採訪室就著手開發社區營造的相關報導。

他給你一個資本你怎麼轉化到一個你喜歡的方向去做，這才有意義。這個中間是有一些你要跟報社去說服的過程，然後你也要跟他講為甚麼這樣的新聞是比較會有人想看，或者是在這個新聞媒體裡面是比較有意義的報導。

或是，以調查採訪室近期執行的大型專題（民國九九，台灣久久）為例，專題發想的開始，調查室為了規避置入性行銷，與報社高層意見相左，後來經過雙

方協調，才調整到調查室成員們都認可的專題走向。高有智也認為調查採訪室能爭取設立固定專版，讓調查採訪室在跟其他組別做新聞競爭的時候，更能凸顯調查室作品的重要性跟價值，也更有機會利用這塊專版進行發燒議題的深度探討。高有智認為就些都是工作者協力抵抗、突圍的具體過程。

意識記者特殊身分，就是追尋專業的開始

從高有智而言，實踐理念的第一步是「**在工作上，我能做什麼？**」，這是高有智心中的媒體改革。

有些故事平常沒人理會，我覺得「如果我不去寫，那還有沒有人會寫？」。有時候耗上幾個時日與受訪者好好對談，報導見報後，發現受訪者感動不已，我便從中感受到我是記者，而我寫的故事有人閱讀，我可以幫助一些人，我活生生地存在。

從決心換跑道當一名記者，到研究所時期開始跑新聞，到進入主流報業，高有智的新聞專業意理沒有太大改變，想要做一名倡導型的記者，關懷弱勢，揭露弊端，而他也藉由報導一點一滴累積出報導的公信力，對於自己手中握有的那把權杖，高有智不輕易高舉卻也不隨意放下，認真看待無冕王的角色：當我是記者的時候我是有權力去採訪任何一個不認識的人，不是因為我是高有智，而是因為我是記者，我是中國時報媒體的記者，代表了我千千萬萬的讀者來問你這個問題。當你敏感到這個角色，就是專業的開始。

第三節 郭石城的職涯圖像

只要不斷有獨家新聞，不斷享受那個樂趣，熱誠就不會消失，沈溺於那種樂趣、上癮。遇到沮喪的事情就轉換心態，忘了就算了，笑笑就好了。

(郭石城訪談稿，2009)

郭石城，1963 年出生，高雄中學畢業後，因為對成舍我勇於挑戰威權時代的風骨有所憧憬，進入他所創辦的世新新聞專科學校¹⁶，就讀編輯採訪科。從初出茅廬到老資深，將近二十年的記者生涯，郭石城始終秉持著胸中那股新聞狂熱，衝鋒陷陣跑第一個。

與調查採訪室其他四位成員的際遇不同，郭石城從進中國時報後就一直在地方跑新聞，長期以來一直遠離報社核心單位。當 618 中國時報裁撤地方中心的時候，郭石城格外感受到報社的人事震盪，在留下和走人之間的掙扎、無力。

【郭石城的職涯歷程】

採訪入門：膽大心細

報禁解除隔年，1989 年，郭石城的第一份工作在《台灣新生報》¹⁷，主跑農

¹⁶ 成舍我（1898 年 8 月 28 日—1991 年 4 月 1 日），中國著名報人、教育家，在中國新聞史上享有很高聲望與影響。湖南湘鄉籍人，出生於南京。從 1913 年他為安慶《民岩報》撰稿，到 1988 年在台北創辦《台灣立報》，1955 年在台北創辦世界新聞職業學校，1997 年改制為世新大學。直至 1991 年去世，從事新聞業近 77 年，一生參與創辦媒體、刊物近 20 家，直接創辦 12 家。

¹⁷ 《台灣新生報》，簡稱《新生報》，是在台灣發行的一份全國性報紙，其前身是台灣日治時期由台灣總督府控制的《台灣新報》，1945 年戰後，《台灣新報》被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派遣謝然之接收，改制並更名為《台灣新生報》，隸屬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1999 年，《台灣新生報》因「精省」改隸於行政院新聞局，成為國營媒體；2001 年奉令宣布民營化，轉型為全球第一家以海峽兩岸經貿及交通訊息為報導主軸的「兩岸經貿專業媒體」，從此不再由政府控制。

業經濟。因為解嚴，民間社會力量處於躍躍欲試的階段，時不時發起各式街頭運動，要求政府推動社會改革。剛進台灣新生報不久的郭石城，擁有新鮮人的生猛活力，時常到各路線代班，吸收各類新知識，也因為郭石城積極的態度，再加上長的人高馬大，因此當時只要有大規模的街頭運動，郭石城就會被採訪主任調往最前線現場支援採訪。

回憶印象較深刻的街頭採訪經驗，郭石城憶起當時黨外人士黃信介的搭救之恩。那時候還是只有 call 機的年代，在外採訪的記者必須就地找公用電話回報現場最新動態，一次立法院前的群眾抗議行動，剛打完電話向報社報告狀況的郭石城被誤認為搜羅抗議情報的情治人員，因此被一票群眾包圍，郭石城當下立即出示記者證表明身分，卻有人認為省營報紙的立場偏頗，抓著郭石城不放，所幸當時以黃信介為首的遊行隊伍正好經過，郭石城便機智地高聲向黃信介表明記者身份，透過黃信介的搭救，郭石城才免於遭殃。

還有一次，農民為了抗議台灣加入當時的國際貿易組織關稅貿易總協定(GATT)¹⁸，集結到國貿局前丟農產品示威。當時的國貿局局長是現任副總統蕭萬長，當他親自出面跟農民溝通時，群眾一擁而上往蕭萬長臉上丟雞蛋，當場蕭萬長滿臉蛋汁，看得一旁的幕僚、記者和群眾瞠目結舌，結果蕭萬長的反應出乎眾人意料之外，不但沒有動怒還微笑以對，也因而消解了抗議農民的怒氣。郭石城回到報社立刻寫了一篇特稿以「微笑老蕭」評論蕭萬長的待人接物之道，後來微笑老蕭甚至成為蕭萬長的代名詞。

能在混亂的現場能保持敏銳的觀察力，是街頭詳實報導的必要條件。而郭石城也因為恭逢街頭社會運動的極盛時期，勤跑街頭因而練就了在街頭打採訪游擊戰的一身本領。

保持戰鬥姿態，轉往中國時報

¹⁸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簡稱 GATT），以降低關稅與促進貿易自由化而成立的多邊國際協定，為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 WTO)的前身。GATT 的原則是自由（GATT 第 11 條：將貿易限制措施轉為關稅，以及降低關稅稅率）、無差別（最惠國待遇、本國民待遇）、多元化，必須在這三項原則下進行自由貿易往來。

當時的台灣新生報隸屬台灣省政府新聞處，創刊目標主要是為了宣揚政府法令與政策，媒體屬性相對保守，報導立場雖較為受限，卻是媒體圈內的金飯碗，但即使福利優渥，仍留不住具有野心的年輕記者。

台灣新生報在新聞界有個代號叫做台灣新生記者訓練報，就專門在培養記者的啦，培養差不多就一定都落跑的，如果你是有本事的人。

《台灣新生報》裡就曾有位資深前輩預言郭石城在三年內一定跳槽其他媒體，結果未滿三年，郭石城跑起新聞來已經得心應手，終於按耐不住滿腔的新聞熱血，轉而報考《聯合報》、《中國時報》等大媒體。

我要跑之前我們那個採訪主任特別來跟我講，你只要留下來不跑我馬上就把你「納編」，所謂納編的意思就是變成正式的公務員，享有所有公務員的福利，那個誘惑算滿大的耶，我如果那時候答應他我搞不好一輩子就沈淪了，就沒有衝勁你知道嗎，那有甚麼意義！

最後郭石城選擇到《中國時報》的理由很簡單，就是創辦人余紀忠的直言不諱的報辦風格。解嚴前後，《中國時報》是台灣唯一勇於報導黨外新聞的媒體，因此多次與政府關係緊張，集團旗下的《美洲中國時報》因「江南案」等事件停刊，大篇幅刊載美麗島事件軍法大審，更幾乎身兼國民黨中常委身分的余紀忠與掌權的蔣經國政府決裂；民主進步黨於 1986 年成立時，《中國時報》也是唯一於頭版刊載消息的平面媒體，如此自由主義色彩與媒體第四權的新聞理想吸引了郭石城。

1991 年到中國時報後，郭石城立刻被派往苗栗擔任地方記者。

天時地利人和，地方記者一戰成名

到苗栗就任不久，郭石城就遇到一件慘烈的交通事故—苗栗造橋火車相撞事件。因為更換軌道的號誌故障、自動煞車系統失靈以及駕駛的疏失，一輛自強號列車高速撞上莒光號列車，造成三十人死亡、一百一十二人受傷。

當時網路尚未普及，北部以外的地方中心輸送稿件是利用火車，因此地方記者與火車站務人員通常彼此熟識，造橋火車相撞的第一時間點，通知郭石城到現場採訪的就是路竹火車站的站長，郭石城是當時僅次於救難人員之後趕到現場的人。

因為我最早到啊，我從竹南騎摩托車到造橋，除了幫救難人員一起處理那些屍體屍塊還一邊拍照，因為太投入救災，搞的自己還有點興奮，當記者就是有這種病態，有點興奮哇碰到這種大場面。

也因為郭石城第一時間到達災難現場，拍下不少獨家照片，再加上熱心幫忙救災，深入了解災禍情形，隔天報導寫出來鞭辟入裡，這次的事件讓郭石城在《中國時報》打響了名號。

對郭石城而言，作為一名社會線記者，大場面和事件是一場考驗，能夠測驗記者的應變能力，及突顯出平時的人脈經營。郭石城之所以能在第一時間趕到造橋火車站，成為第一位到達現場的新聞記者，端賴消息來源（火車站站長）的通報，而在此之前郭石城在各種場合累積了近三年的採訪經驗，也幫助他在面臨大型災禍現場能以處變不驚的態度進行第一手記錄。

四字箴言：「天道酬勤」

郭石城認為自己之所以能不斷挖掘出引領新聞話題的報導，來自於他心中的

信仰：「天道酬勤」。

《台灣新生報》時期，郭石城與一名《中國時報》的資深記者針對同則新聞持有不同意見，因此在報紙上打起了筆仗，當時仍是小記者的郭石城雖然對自己的立論有十足的把握，卻因為對方有著大報記者的背景，講話便較有份量而佔上風，這事件讓郭石城很不服氣，這也讓郭石城體認到，當自己還只是一名小報記者，唯有勤勞地挖掘新聞，掌握精確的消息來源，才能在新聞同業中勝出。

大報記者他(指中國時報記者)就可以進去撒野發飆，啊我是小記者，我那時候就打定你花一花鐘跑新聞我就花三分鐘，因為我是小報記者嘛，所以我一定比你多三分鐘我才能跟你抗衡啊。

每一個記者都經歷過資淺到資深的磨練，也理解到唯有以勤勞與專業、名聲的累積，才能在新聞圈脫穎而出，「我到中國時報之後一樣，你花一分鐘的時間我還是花三分鐘，我沒有變」。難能可貴的是郭石城即使已經到了大報，已經成為資深的記者，仍然秉持著天道酬勤的信念，每天花比別人更多的時間在跑新聞上，絲毫不怠惰，因此時常跑出獨家新聞。

獨家上癮症

那時候跑社會新聞啊，在地方誰不知道我，大家都馬知影（台語）。

在苗栗跑了三年地方新聞，因為成績亮眼，郭石城被調回台北縣跑司法新聞。即使已脫離菜鳥身分，郭石城的新聞熱誠仍未隨著工作的例行化而削減，在同業眼中是一名新聞狂熱份子，有著源源不絕地活力與動力，因為跑新聞的行事作風鮮明，喜歡獨立作戰，郭石城於是自稱自己幾乎沒有什麼新聞界的朋友。

「我跑新聞很獨，有時候被同業圍勦，故意讓我獨漏。事後回想這是很甜美的回

憶，因為這表示他們覺得我這個對手難纏。」工作上雖然不與同業合作，私下卻可以交陪、喝酒，因此當郭石城屢屢靠自己的力量獲得獨家報導，讓同業對於郭石城的存在戰戰兢兢，又愛又恨。

後來有一段時期，郭石城甚至沉迷於被新聞同業追趕的領先感。

就是你都知道明天一大早各大電視台一定都會來問我，因為電視台都 follow 平面嘛，那我那時候最常做的事情就是一早起床，早點起來吧因為電視台固定九點以前開始就會一台一台打過來，我通常一天要接三到五台打過來問，就有那種快感。

在台北縣跑社會新聞，適逢白曉燕綁票案，當時檢警與媒體幾乎全天候盯哨，深怕遺漏任何最新消息。當時三名綁匪仍在逃亡，某天綁匪主動寫了一封信到地檢署，信送到主任檢察官手中時郭石城剛好在檢察官身邊，由於正處風聲鶴唳時期，每天都會接獲許多假消息，於是一開始檢察官不以為然，郭石城便將信揀去一旁看，結果信看到一半就知道事態嚴重了，

我們自己跑社會新聞出身的，那種內容除非你是當事人，你去背媒體資料都不可能背那麼清楚，我看到一半我就傻眼了你知道嘛，然後他（指主任檢察官）看到我的表情他就不讓我看了，歹誌大條啊。

郭石城於是抓緊機會寫成一篇報導，成了當天《中時晚報》頭版獨家，《中時晚報》還因而大賣，郭石城讓一票同樣也守在地檢署的同業措手不及，獨家報導刊出當晚，一群同業還傳出郭石城假造新聞的負面傳聞，但稍晚經由刑事局筆跡鑑定後，證實信件由綁匪三人所寫，一群同業只好摸摸鼻子噤聲。

從枝微末節延伸，跑跟別人不一樣的新聞

個性豪爽的郭石城，想法單純直接，他認為「一份報紙就十塊錢，你十塊錢的東西跑出來都跟人家一樣那有什麼意思」，一天下來除了吃喝以外的時間將近當花在工作，更為自己立下一個禮拜至少跑出一則獨家新聞的期許。

我一天除了睡覺除了看看書看看有的沒的之外，其他都是在工作，都是在為新聞賣命，包括我禮拜天休假我也去轄區繞繞看看有沒有什麼特殊的案件，很多都是我利用休假時間順便去看看山水順便去挖出來的東西，那挖出來之後我再去把它開發出來。

因為郭石城腦袋裡幾乎時時刻刻都圍繞在新聞上，一點蛛絲馬跡都不放過，才能挖掘出獨特的事件，將其變成一則震撼人心的新聞。郭石城就曾在跑司法新聞期間，隨意翻閱文件，發現一名司法部門視障協會的成員，教書十多年來未曾讓學校的任何人知道他一隻眼盲，郭石城在與這名老師聊天後，極力勸該名老師以自己視力不佳卻奮力讀書的個人經歷激勵學生，還讓老師當著全班學生的面前拿下一支義眼，帶給學生莫大震撼。這則新聞引起許多迴響，還引來許多電子媒體跟進，而最大的意義莫過於學生們對老師殘而不廢的敬佩，讓師生感情更為緊密。

郭石城之所以可以跑出跟大家不一樣的新聞，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他懂得讀者的心，知道他們對什麼樣的報導感興趣，所以郭石城總能從小地方、小事件延伸，挖掘出細膩的面向。好比上述的老師義眼報導，就是郭石城從一個微不起眼的公文上發現悉，再延伸發展成一則激勵人心的報導。

一般我們在圈內（指新聞圈）大家都看得出來誰比較流利，同樣一篇報導誰寫比較好誰寫比較差，差別在那裡，差別就在你得到新聞線索的管道啊，啊其他內容都差不多啊，這種東西就要靠你平時去累積啊，

你如果比別人多勤快一點你至少能得到比別人更多的線索啊。

郭石城致勝之道就在於勤勞、獲取新聞線索的管道，及見微知著的延伸能力。

地方中心裁撤，心境轉變

從召集人晉升為特派員的隔年，《中國時報》傳出了裁員消息，並且撤除地方中心，縮編改制為都會新聞組。身為地方記者，郭石城尤其感受到報社的風聲鶴唳氛圍，這時候也深刻體驗到勞動者在資方面前的渺小。當郭石城眼睜睜看著麾下的地方記者一一在裁員風波中被犧牲，身為特派員的自己卻無能為力，「這是近廿年記者生涯，第一次在新聞戰場掉淚」，入行多年，硬漢作風的郭石城首次掉下男兒淚，也是第一次深刻感覺到自己胸中那份新聞熱血被大環境所稀釋，以往跑新聞時遭受的挫折與挑戰，都不曾衝擊郭石城的信仰，但媒體環境的惡劣，以及報老闆的「出賣」，讓郭石城開始質疑記者的存在價值。

那一波的大裁員也讓我第一次體認到你有必要真正為這個環境
拼命嘛？你有必要為報老闆這樣拼嘛？這個報老闆值得你這樣賣命
嘛？很多思維就會這樣跑出來了。

一通來自何榮幸的電話邀約

就在心灰意冷之際，何榮幸的一通電話及時為郭石城送上暖意。在這通電話之前，郭石城跟何榮幸素不相識，僅透過彼此的報導知道對方的存在，接到何榮幸的邀約電話，郭石城沒有太多猶豫，僅僅問了一句「可以寫自己想寫的東西嗎？」便點頭答應加入調查採訪室。郭石城也坦言，之前類似調查室的單位曾找過他，但當時郭石城對於自己的線上工作相當滿意，對這樣任務型單位的運作模式有所質疑，因此拒絕邀約。之所以在這次大裁員後加入調查採訪室，除了完全是衝著何榮幸在報社的名聲，一方面心底也抱持著消極想法，認為職位已經不重

要，姑且就將調查採訪室當成最後一戰試試看。

「不景氣·不低頭」專題，是郭石城到調查採訪室後策劃的系列專題報導，郭石城的一篇「微笑鞠躬發 DM 哑房仲業績夯」報導廣受網路迴響，也引起部份電子媒體跟進採訪。郭石城回憶起當時跑這則新聞的經過，他先是在新聞主角王浩附近埋伏觀察了兩個小時，再跟幾個路過的菜籃族攀談後，才走向前向王浩說明來意，採訪過程中以紙筆與王浩溝通。這則新聞出來後，郭石城從讀者的正向回饋中獲得滿足。

即使換了不同調性的單位，郭石城依然不改「小郭本色」，尤其鍾情深植人心的新聞，而他也從這些反饋中獲得當記者的樂趣。

記者的價值與意義：追尋真實

到調查採訪室後的郭石城，由於深度報導與每日新聞的性質不同，相較於郭以往「快、狠、準」的採訪方式，著重慢工出細活的深度專題報導讓郭石城在一開始適應不良。對於調查報導的想像，郭石城則認為應偏向扒糞式的揭弊新聞學，或搭配即時性議題，深度追蹤報導，儘管郭石城高度肯定調查採訪室進行的固定專題，但總覺得少了一股挖掘真相的味道。

當工作環境與心境有所轉變，郭石城胸中的新聞魂仍舊驅策著他，實踐他所認為的記者價值與意義。

新聞記者他的意義在哪裡，就是當你發現一個真實故事背後隱藏的那種人性，然後你透過報導把人性罪真實最光輝的一面把它擴散出去，感染所有人。

只要郭石城還在新聞場上，就會不斷寫出撼動人心的獨家報導。

第四節 謝錦芳的職涯圖像

堅持你自己寫的東西的品質，就是說你做一天就發揮一天的影響力阿，只要你還在做，只要你還在做的話。

(謝錦芳訪談稿，2010)

謝錦芳，大學念的是政治大學外文系，因為參與山地服務社團，想要藉由影像記錄山上孩童的笑容，驅使謝錦芳開始接觸攝影，因而加入攝影社。在攝影社結識了不少來自新聞系的同學，對新聞工作有進一步的理解，同時謝錦芳也迷戀上以影像紀念瞬間的寫實性，「然後我就開始覺得，好像搞新聞工作也不錯」。

【謝錦芳的職涯歷程】

大學畢業後，謝錦芳考取輔大大眾傳播研究所。1991 年進到《中國時報》市政組，一開始跑的是醫藥等民生相關新聞，跑了兩年，因為表現優異，被長官調往台北市議會跑政治新聞。

跑政治新聞太浪費生命

議會的新聞每天都要花我大概花十個小時以上，因為議會開議跟立法院一樣，它是立法院的縮影，就是從早到晚你都耗在那，然後你想寫一些專題你就要自己再去找很多的資料來蒐集，所以兩年過去，我會覺得好像不必要再待了，因為滿浪費生命的。

1995 年，謝錦芳已經跑市議會跑了兩年，對政治新聞的繁複、瑣碎的產製流程感到厭倦，因此思索轉換路線，剛好當時財經組有缺，謝錦芳便主動爭取機會調往財經組。

一方面因為謝錦芳完全沒有財經相關背景，一方面又因為謝錦芳擁有絕佳的外語能力，所以當她調往財經組後，負責國際金融貿易，是屬於財經路線中相對來說門檻較低的領域。這期間謝錦芳有如嬰孩牙牙學語，必須不斷地大量閱讀財經知識才能讓自己進入狀況。不過，財經知識不足沒有影響謝錦芳的新聞表現，謝錦芳靠著絕佳的外語優勢，在吸收國外金融財經新知的速度比其他記者快，也因為外語能力好，謝錦芳獲取不少採訪國際會議和國際經濟學者的機會，更曾經採訪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威廉·夏普(William F. Sharpe)¹⁹、諾貝爾物理獎得主艾菲·洛夫(Zhores I. Alferov)²⁰。

調往財經組一年後，漸入佳境的謝錦芳挑戰更需要專業路線知識的財政部，「那就挑戰很高了，那就自己要去唸很多書，財政學阿什麼，這些基本功，然後通常你開始跑部會，你就牽涉到公共政策的辯論……」。舉凡中央政府預算撥列、國庫財務調度、國營事業、賦稅相關新聞都在謝錦芬負責的範疇之內，為了補強自己的專業知識，謝錦芳彷如重回學生時代，讀財經教科書，參加研討會，有如蹲馬步般地訓練基本功。

記者有一個好處就是你可以去問人阿，然後你可以參加很多研討會，然後研討會有時候你發的新聞稿也只是整理一條，可是你在那邊聽一整天，其實你是在上很多課啊。

¹⁹ 威廉·夏普(William F. Sharpe,1934-)為 CAPM (資本資產定價模型) 的奠基者，其與默頓·米勒和哈里·馬克維茨三人共同獲得 1990 年第十三屆諾貝爾經濟學獎。

²⁰ 艾菲洛夫(Zhores Ivanovich Alferov, 1930-)，曾任俄羅斯國家科學院副院長、2000 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

除了在工作之餘讀書自學，謝錦芳利用自己的記者身份，在各式場合勇於發問，請教財經學者專家，在互動過程中也因而與消息來源建立良好的關係。

學習如何作為一名主管

在財政部跑了四年，謝錦芳因與當時的財政部長邱正雄建立良好的互動，時常拿到第一手獨家新聞，讓謝錦芳跑起財經新聞更顯得心應手。直到 1999 年 12 月，報社實施「三合一」新政策，因為此一重大變革，謝錦芳便在這一波人事調整中被拔擢為《中國時報》財經組副主任。當時，謝錦芳雖然已在財經組跑了五年，但還不算是資深的財經記者。「後來就變成行政主管，我等於只有前面一半時間是在跑線」，也許正是她跑新聞時的要強作風，凡事準備周全，肯下苦功，讓她受到長官賞識，職位爬昇的比其他記者都快。

所謂的「三合一」方案，是將《中國時報》、《中時晚報》、《工商時報》三報的財金記者合併重整為「中時財經新聞採訪部」，以中央廚房的概念，設立統一的供稿中心，再依各報不同需求進行分配供稿，而在三報內仍設有財經主編室負責掌握稿源，從那時候開始，謝錦芳除了跑新聞，也扛起了主管職責，負責審稿、配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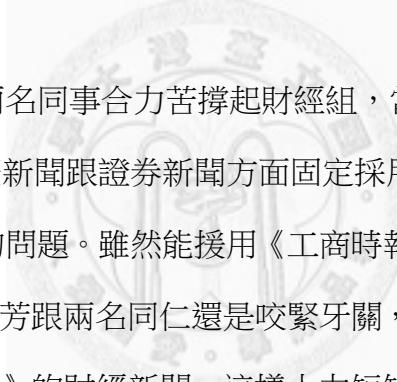
當了兩年財經組副主任後，謝錦芳被調往《工商時報》擔任金融中心主任。雖然同樣是主管職位，但兩報在路線編制、內容細節上有所差別，講求財經專業《工商時報》，目標受眾是產業界人士，因此在專業知識上的要求更高，再加上金融中心底下有多達十三名記者，其中不乏在線上待的比謝錦芳更久的資深前輩，「其實我完全不比資深的記者了解金融新聞，因為我跑的時間根本沒有他們那麼多」，也因為這樣，看似處在權力優位的謝錦芳，背後其實承受著莫大壓力。

做主任就是你每天要開那個編採會議，一天兩次，然後要審他們
(指記者)的稿子，還要幫他們規劃專題。很多專題是你跟同仁一起討

論，我們大概每個禮拜會固定一天小組會議，看看未來會有什麼重要事情會發生，事先規劃。

在《工商時報》帶兵遣將兩年後，2002 年《中國時報》經濟組主任出缺，長官於是將謝錦芳調回《中國時報》，擔任經濟組主任。

那時候經濟組包括我只剩三隻小貓，三個人怎麼撐呢，大部分是用工商時報的稿子，可是為了要展現你《中國時報》財經新聞的獨特性，也不能所有稿子都用工商時報的供稿，你還是要有自己的記者來做。



這段期間謝錦芳跟兩名同事合力苦撐起財經組，當時謝錦芳跟《工商時報》的主管達成協議，在國際新聞跟證券新聞方面固定採用《工商時報》的稿子，稍微解決了組內人力不足的問題。雖然能援用《工商時報》的稿件，但為了突顯兩份報紙的性質不同，謝錦芳跟兩名同仁還是咬緊牙關，在國際新聞跟證券新聞之外，做出屬於《中國時報》的財經新聞。這樣人力短缺的日子維持了將近四年，隨著報社陸續招考新進記者，財經組才又增加到十三名記者群，恢復了財經編輯台三合一前的原有規模，才降低使用《工商時報》稿件的比例。

揭發弊案的 Guts

我想媒體的天職就是你要監督政府，然後如果政府作出一些貪腐阿，或是齷齪阿，或是短視阿，或是明顯違法的事，那你都要有這個勇氣指出來。

謝錦芳擔任財經組主任的時候，台灣金融界爆出二次金改弊案²¹，當時有許多捕風捉影的傳聞，而謝錦芳掌握到足夠的第一手資料，「我們已經有拿到一些報告或資料或會計師的報告，不同的金控都有一些亂七八糟的事情，我們都有揭發出來」。經過求證後，儘管謝錦芳感受到報導人物的施壓，她還是堅持寫出完整報導。

那當然我也知道說那些業者去跟我的上級主管機關打我的報告，所以我也很黑，滿黑的，對，這也是我的下場(笑)。

從謝錦芳的笑容中，能看出她面對權力運作時的淡定。除了一股不畏懼的 guts，最主要是謝錦芳如何看待自己記者身分，她認為自己只是在盡一名記者的天職，做一名記者份內的事，因此被報社列為黑名單，也沒甚麼好大驚小怪的。

從小人物身上看出另一番視界

當 2008 年大裁員，何榮幸找上謝錦芳，力邀她加入調查採訪室。起初謝錦芳內心有所猶豫，「因為 uncertain 你知道嗎，所以那時候大家也不曉得說在這個節骨眼成立一個新的單位到底他能活嗎，沒有人能知道，而且上面也沒有人跟你講什麼嘛，因為大家都自身難保。」謝錦芳心中的不確定感，也道出了調查採訪室成立之初的處境。

後來謝錦芳還是選擇加入，主要原因是謝錦芳考量自己在同一路線待久了，因為熟悉而讓工作步入制式化，謝錦芳認為若是能趁此機會轉換一個完全不同的新單位，對接收新刺激似乎也不錯，「過去我一直都在財經領域嘛，那如果能夠

²¹ 2004 年 10 月 20 日，陳水扁總統經濟顧問小組會後，宣布第二次金改四大目標：明年底前至少 3 家金控市佔率超過 10%、公股金融機構的家數今年底以前由 12 家減 6 家、金控家數明年底前減半成為 7 家、至少一家金控到海外掛牌或引進外資。但截至 2008 年的二次金融改革，卻隨著總統陳水扁任期屆滿後，爆出弊案，包括紅火案、國泰金控併世華銀行案、元大證券併復華金控案、富邦金控併北銀案。

有一個機會突破到財經領域以外的，好像也沒什麼不好。」

到調查採訪室後，卸下了主管要職的謝錦芳，反而有更充裕的時間專心作為一名記者。也因為調查採訪室做新聞的切入角度和觀點別於財經新聞，謝錦芳因此開拓了另一番新視野。

平常你在作新聞的時候，你怎麼可能把人家的祖宗八代通通搬出來寫，除非這個人是掛了，或者是特殊時候，你也不可能寫那麼清楚，而且你平常採訪的時候也不可能跟一個人談兩三個小時，但有一次我和有智就跟採訪對象一談就談了六、七個小時……

這個讓謝錦芳花上六、七個小時的採訪對象，是台灣珠寶品牌「大東山」²²的老闆女兒。在此之前，謝錦芳習慣財經組那一套與商場人士、數字報表打交道的採訪模式，講求效率與精準度，往來的人物不是學者專家就是企業老闆，但調查室的採訪對象都是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什麼郭台銘啊、林百里、王雪紅什麼一大堆嘛，這些大咖你就報導不完了啊，你怎麼會去報導一個澎湖起家的大東山，不可能。」然而，這則「不可能」報導的新聞，卻意外感動了謝錦芳：

他們都是 nobody，但是他們呈現的就是中小企業那種提一個皮箱到紐約闖天下的這種精神，這是我以前在財經組很難接觸到的面向，因為財經的東西你也知道嘛，很常接觸很多數字、股票阿，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獲利阿，變好變不好，不然就是醜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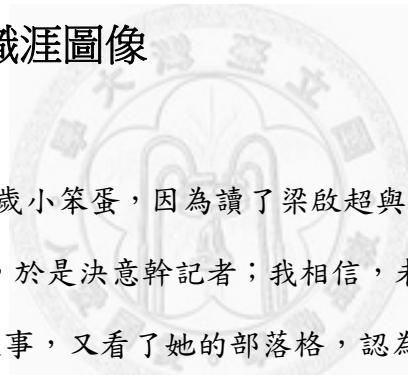
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珠寶公司，發跡於台灣澎湖，因為美國第一夫人配戴其首飾，才受到台灣媒體的關注，比起舉手投足都成話題的知名企業家，這

樣默默發光發熱的「台灣之光」，更讓謝錦芳領受到堅韌的生命力，與真正的台灣實業精神。

作一天新聞人，就發揮一份影響力

多年來謝錦芳沒有太大改變，就像她自己對記者特質的預設：「如果你要在你的工作上發揮一些影響力，那你可能至少要有一點正義感」。即使採訪對象都是政商名流等有頭有臉的人物，在權力面前，謝錦芳也不曾低頭，持續執行她最作為新聞人的天職，針砭時政，發揮影響力。

第五節 黃哲斌的職涯圖像



當我還是十六歲小笨蛋，因為讀了梁啟超與「新民叢報」的故事，又讀了梁啟超文集，於是決意幹記者；我相信，未來會有更多十六歲少年讀了朱淑娟²³的故事，又看了她的部落格，認為記者這一行值得幹，不會讓爹娘丟臉，於是找到各自的方式跳進來。我很期待，那樣的一個時代。

（黃哲斌，2010）

黃哲斌，1964 年出生於台北，自幼就是個抗拒體制的叛逆小子。國中就讀校風嚴格保守的私立格致中學，成天在課堂上與同學偷偷傳閱柏楊、李敖所著等禁書；中正高中時期，仍不忘繼續亂啃志文書局的新潮文庫，尼采、羅素、叔本

²³ 朱淑娟，資深媒體工作者，長期深耕環境議題，原為《聯合報》記者，2009 年離開主流媒體，改以在部落格發聲的獨立新聞工作者，2010 年獲得「曾虛白新聞獎」、「卓越新聞獎」等三項大獎。

華等哲學叢書。

喜愛文學、歷史、哲學的黃哲斌，高中時對中文系或歷史系的嚮往，卻與家中期望違背，為了虛應當醫生的父親，又受梁啟超文集影響，黃哲斌因此認為「能夠寫文章又能經世濟民又能養活自己的，非記者一職莫屬」，於是黃哲斌立下職志當一名記者。重考三次，每次都只填新聞科系志願，第三年終於如願考上了輔大大傳系語言文字組。

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傳系，念到大二，從新聞界的學長姐口中聽聞新聞實務景況後，黃哲斌這才恍然大悟：「馬的梁啟超的時代早就死透了，我真是個誤入歧途的白癡」，便決心不當記者了，改投身於劇場、電影等藝文相關領域，當過蘭陵劇坊演員、MTV 電影企劃，辦過雜誌、送過報紙；一直自認為較適合從事廣告業的黃哲斌，卻始終沒能成為廣告人，卻是在百轉千迴後，仍然彎到了新聞這條歧路上。少年時期那股文人論政的熱血情懷，也悄悄影響了他往後的作為。

【黃哲斌的職涯圖像】



不想當記者，卻誤打誤撞入新聞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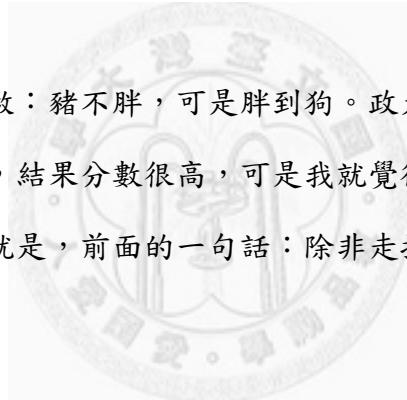
既然認清了新聞產製過程不若原本想像，不是記者個人專業意理的延伸，而是經由組織編輯室文化所揀選、判斷後具有價值的「新聞」，記者也非執春秋之筆，微言大義的時代推動者，於是，本來以記者為志業而堅決念大傳系的黃哲斌決定不當記者了，改而專注其他興趣，在藝文領域積極拓展經驗，大三錄取蘭陵劇坊演員，並跟隨劇團到香港公演，大四則到太陽系 MTV 當電影專題企劃，退伍後甚至幫 MTV 老闆辦起了電影雜誌，擔任總編輯一職。

其實當編輯，是有點逃避不當記者，然後到退伍之後，混了一兩個地方，老天爺不知道為什麼，不想讓我混入廣告界，反而到了電影

雜誌，當了總編輯一陣子。然後因為那時候太陽系 MTV 收掉了，雜誌已經幾乎沒辦法虧錢，支持下去了。我已經盡量去做到 BALANCE，可是有很多東西已經做不到了，那我覺得沒有待下去的必要。

1994 年離開雜誌編輯的位置後，黃哲斌一邊送報紙貼補生活費，一邊準備報考政大新聞研究所，考前剛好看到《中國時報》在招考地方記者，眼看研究所考試在即，黃哲斌就當作一場筆試模擬考去考了《中國時報》。沒想到黃哲斌高中報社榜眼，政大新研所的考試反而落第。礙於經濟壓力，幾經考量，黃哲斌在半推半就的情況下，進入《中國時報》，當起他了大學時期最不想當的新聞記者，而且一待就待了十六年。

台語有句話叫做：豬不胖，可是胖到狗。政大新研所沒考上，可是考上中時記者了，結果分數很高，可是我就覺得 XX 的老天爺又在捉弄我。總之結論就是，前面的一句話：除非走投無路，不然我也不要去當記者。



穿襯衫、打領帶的社會線記者

考取《中國時報》後，黃哲斌自願分發到臺南市跑社會新聞。由於自小在台北成長、求學、當兵，離鄉背井到人生地不熟的臺南跑社會新聞，對黃哲斌來說是一大挑戰，除了閩南語說的不夠溜，也因為學生時代所接觸的皆是劇場、電影等藝文類型活動，因此黃哲斌自稱人生瞬間「從費里尼、柯波拉與大衛柯能堡的世界，跳接到火場、刑事組與命案現場」，一個成天泡在電影院和咖啡館的文藝青年彷彿牙牙學語般從頭學習如何跟不同樣態的另一群人相處，操弄著完全不同的一套語言和生活習性。

比如說包括依警察來講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文化，一直到台北都是一樣，當他們有時候在誣譙你的時候是在表達跟你的一種親近，那你要幹譙他，譙來譙去感情才會好，這個是以前我都沒有接觸過的。

從不諳地方社會線記者生態的菜鳥記者，到嘗盡了紙醉金迷、燈紅酒綠的「社會線式」的工作型態，也看盡了黑白兩道的生存之道，黃哲斌靠著日夜與員警交陪、搏感情，跑出了屬於自己的路線風格，堅持不搞錢、不關說，手中持有自己的一座辨別是非的正義之秤，跑自己認為該跑的新聞，說自己想說的話。相對於其他線上記者，不隨便和人攬和的黃哲斌也付出了更多的時間，以勤快跑新聞換取消息來源的信任與獨家報導。久而久之，消息來源也摸清楚黃哲斌的脾性，欣賞他的人自然樂於相親，而黃哲斌更刻意建立自己的一套規範，成為社會線記者裡面每天會穿襯衫、打領帶的記者，藉以警惕自己不要與消息來源過份親近而踰越了界線：

我其實覺得我想用這種方式來表示說我是認真的……那其實我會希望特別多造成一點點距離，因為其實社會記者很重的就是那種感情啊義氣啊或者搏暖啊(台語)，可是我又不想要這麼的水乳交融，因為太水乳交融之後我看過太多社會記者後來就跟他們一樣……反正就是做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謹守報導者與消息來源的公私界線

在台南待了一年，隔年因為家庭因素，黃哲斌調回台北跑社會組警政新聞線。回台北後黃哲斌仍不改自己仗義執言的一貫風格，看到甚麼不對的事情就

寫，他就曾經因為對台北市警界升遷有所批判而寫了一篇特稿，批評當時的台北市市長陳水扁用人不當，但因話題敏感遲遲未能見報，後來在言論版主編幫忙偷渡下，該篇評論才刊上了時報廣場的我見我思。

黃哲斌也不曾因跟消息來源私交甚篤而怠慢新聞工作，當遇到與消息來源拉扯的兩難時刻，他第一優先考量的還是自己的記者身份，而非私下交情。在專業意理上，黃哲斌認為公私分明最為重要，若因礙於後果選擇不寫或昧於事實則是對不起自己的記者專業。

我那時候跑一個分局的刑事組長，他跟我很要好，私底下很要好，也是會常一起喝酒，有甚麼新聞也是會私底下跟我講，然後有一次他們組裡發生一件事情，很重要，然後我覺得不能不寫，就是他們組裡面的風紀問題，所以我掌握了足夠資料我就寫了，他因為這件事情他很生氣他半年不跟我講話……

大無畏的潔癖性格

大概是出身自新聞傳播科系的緣故，又在進新聞圈前老早就熟知新聞圈的運作狀態，所以即使陰錯陽差還是進了新聞圈，黃哲斌卻始終能夠採取一種抽離的客觀角度看待新聞產製上的結構限制與記者角色上的掙扎，更因為黃哲斌常常覺得當記者是自己走投無路下的選擇，所以也能更無所畏懼地豁出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寫自己想寫的報導，最壞的打算就是大不了走人。

我還滿感謝那時候大一大二那些老師，因為我們那時候有些老師或有一些學長姐回來給我做一些心理建設，就知道說，ok 報社裡面記者大概他會有一定的功能角色，但是他的角色是相當程度是被規約限

制的，那因為我做好了最壞的打算，那時候所以說並沒有太多的驚訝。

帶著沒有太多驚訝的心態，黃哲斌謹守自己訂下的原則，持續做自己認為對的事。直到 1997 年，發生了當年台灣的重大刑案白曉燕案，追白曉燕新聞追了長達半年的黃哲斌，一方面對於新聞競逐而罔顧專業倫理感到沮喪，一方面也覺得社會線上手後再精進的空間有限，於是主動請調編輯台。

但其實當年還有一件案外案，當時的社會組主任欲指派黃哲斌去跑某個號稱肥美的分局，長官希望黃哲斌去接跑，並且抑制記者拿錢的現象。就是因為黃哲斌性格夠「潔癖」，報社長官才特別派他去肅清不良風氣，但當時基於前述兩個原因，黃哲斌已經想從採訪線退下，不想再跑新聞，也想要為自己預留更多的自由時間從事其他事情，於是他沒有接下社會組主任給的這項艱難任務，而是自願退到編輯台，增加新聞編輯上的實作經驗。

理性與創意兼具：左腦編報紙、右腦寫文案

轉調到編輯台後，黃哲斌從助理編輯做起，跟在社會版資深編輯旁邊，跟人學習如何下標與核稿，如何編排一塊版面。大約半年後黃哲斌自己就能獨立編輯一塊版面，近一年後被調去當政治版，負責編政治版跟焦點版。

由於當時編輯的工作時間相對較短，晚上七點半進報社，白天幾乎是個人的自由時間，因此黃哲斌在當編輯的時期，曾經短暫在台北之音廣播電台兼任新聞部主任，也曾經幫朋友寫了不少唱片文案。

我那時候給自己一個形容是你記者怎麼樣寫大概左腦跟右腦只用到一半，因為你新聞處理的幾乎是比較理性的東西，那不太能放一些太創作性或太天馬行空的東西，可是我會覺得我另外一半的大腦是不被滿足的，所以說我那時候我會想要找自己比較自由的時間可以用另外一邊的大腦的東西。

一邊編報紙，一邊寫文案，滿足了黃哲斌想要揮灑創意的慾望，但 1999 年網際網路熱潮卻又意外地將黃哲斌推向了另一個未知的領域：中時電子報。

在網路時代逐漸興起時，當時的中國時報老闆余紀忠體認到網路將會是重要新興媒體，因而下了一道公文要求報社所有的一級主管使用 email 流通訊息，在網路尚未普及的當時，是一項重大變革，對許多不熟悉電腦與網路的報社主管而言，更是一項挑戰。

那個時候中國時報總編輯叫陳國祥，因為是中央編輯台都是一條一條的，他坐的位置是最中間那一個，那我剛好是坐在背對他斜後方那一個，然後他有時候要寫 email 給老先生，碰到甚麼問題不知道怎麼樣夾附檔幹甚麼的，他就會轉過頭，哲斌哲斌幫我看一下(笑)，因為這樣子他就覺得我對電腦、對網路是熟的。

時常帶著筆電到報社解悶，再加上三不五時熱心解決同事們的上網煩惱，黃哲斌不經意地塑造出「網路達人」的形象。當時又適逢第一份網路原生報明日報創刊，就在《中國時報》開始招兵買馬準備邁向電子報大戰的階段，報社要求各部門主管推薦人選到中時電子報，這時候黃哲斌理所當然就被總編輯陳國祥選中，於是，黃哲斌又從傳統報紙轉往網路報紙擔任責任主編，之後就一腳踏入網路的世界。

到電子報擔任責任主編之後，黃哲斌轉換另外一套異於記者與傳統報紙編輯的思考邏輯與溝通語言，學習各種網路程式及網路新媒介，除此之外，自己也親身投入中時電子報網站開設編輯部落格，並廣邀《中國時報》的各路線記者與編輯加入編輯部落格成為網路寫手，讓「主編與記者從固定路線、篇幅字數、題材風格中解放出來，更讓一貫『內向式』的媒體人，開始試著面朝外，接收閱聽人

的意見」，這同時也意味著黃哲斌從傳統編輯到數位編輯之間，在面對內容生產的態度有所轉變，並掌握了網路時代垂直分眾的特性。經歷從傳統報業記者、編輯到數位媒體編輯與部落客的黃哲斌，帶著跨時代的參與與觀察，為文評論各種網路新興現象與趨勢，扮演著有如傳統媒體與新傳播科技間的橋梁，一方面反思傳統媒體的侷限性與出路，一方面肯定新媒體的突破與前景。而他獨到精闢的論述，加上犀利幽默的文風，讓黃哲斌的文章不論在《中國時報》、《中時電子報》占有版面，也在網路平台上被反覆轉載，在傳統報業與部落客社群中捲動著一股影響力。

人生總有非賣品：拒絕升職，拒絕置入性行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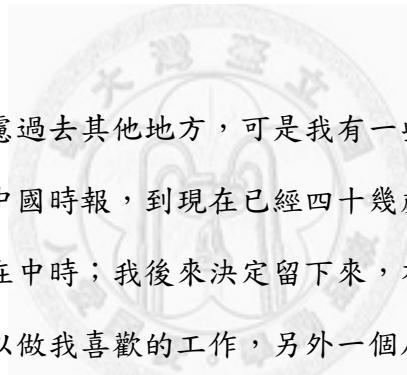
隨著在《中時電子報》的職位越來越高，做為主管的黃哲斌接觸到經營層面的難題，如何在媒體含有的二元特性中求取平衡，一方面要讓網站點閱率與營收提高，一方面要堅持網站內容的品質，同時維持底下同事的專業與工作權，對黃哲斌而言，為了營收而在專業上妥協是不可能的事情，也因為黃哲斌謹守決不在專業面前低頭的原則，在電子報副總編輯或代理總編輯的位置上，他也曾感到掙扎與痛苦。

其實我在當副總編輯的時候就一直在處理這種事情，在當黑臉。也是因為整個媒體環境真的很困難，有時候有很多業務同仁帶錢進來，他希望你做配合，這個時候你是一個管理階層的時候，你會掙扎，站在專業新聞的價值上，我是完全沒辦法接受，不管是置入性行銷，或是希望記者去記者會露個臉，這個我一向都是拒絕的。可是我知道他們在外面找錢找 case 都是非常困難，等於我又逼他們把這些錢推掉，又看到整個媒體的狀況，營運的狀況很艱困。

在中時電子報當了八年的主編，甚至當到副總編輯，2008 年《中國時報》大裁員之際，黃哲斌沒有離開中時集團，而是選擇留下來，最主要的因素是在主管職位待久了，黃哲斌想要重回採訪現場寫報導；大環境的因素則是在中時電子報進行人力整併精簡之前，黃哲斌為了保障電子報同仁的工作權，曾經與管理階層口頭協議不裁員便續留電子報，但後來事與願違，黃哲斌便依照承諾辭去副總編輯職位。

調查採訪室：老賊的最後堡壘

除了理性與人情考量外，黃哲斌仍願意待在前途未明的中時，其實還有一個較為感性的個人理由：



我不是沒有考慮過去其他地方，可是我有一些私人的想法，我二十八、二十九歲進中國時報，到現在已經四十幾歲了，等於是說我工作最黃金的歲月都在中時；我後來決定留下來，有幾個原因：一個是調查室相對來講可以做我喜歡的工作，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我想要留下來看中時會變成什麼樣子，那時候本來是以為可能會幫它送終或說幫它關一盞燈，最悲觀的想法。我就說我都會做最悲觀的打算，可是我覺得這對我自己是一個交代。

剛好碰上調查採訪室主任何榮幸的大力邀約，因此黃哲斌決定重返新聞採訪線上，在調查室成立兩個月後加入了調查採訪室，成為第五名成員，也補齊了調查室在新傳播科技與公民新聞領域的路線知識。黃哲斌加入調查採訪室後，除了繼續進行原本就有的「名人家族故事」固定報導外，五個記者也共同發想、策劃了「我的小革命」專題，大家都有共識想要著重持續探討一些公平正義、環保、公民行動的問題，或是台灣媒體目前比較少呈現的部分。

黃哲斌在小革命集結出書時，曾經在自己的部落格上宣稱書中的報導「都不是『能賣錢的故事』」，與現今主流媒體關注的腥羶色新聞扯不上關係，然而，小革命裡的報導人物卻是「理解台灣民間力量的小窗口，是這時代氣味的小敘事，是擺脫政治亂鬥的小行動」。將調查室視為「最後堡壘」的黃哲斌，某種程度上也達成了兩年前加入調查室的期許：「就是要抱著一個無常的心態、開朗的心情，還有一個開放的態度，去隨時面對明天會可能發生的事情。甚至在能做的時候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調查採訪室的專題報導某種程度也符應了黃哲斌希冀媒體做為公共性平台的想望，報導一些不服膺市場邏輯新聞學的看似微小卻重要的議題，調查採訪室試著在報導中挾帶、包裝一些媒體改革的理念與行動，雖然在整體報業裡頭像是只作用在一塊版面上而已，但黃哲斌抱持的背水一戰的心態，在自己能所為之處盡量做，期盼這些點滴小革命可以匯聚出更大的影響力。

因為媒體大環境是這樣，我們都不是天縱英明，也不是蜘蛛人或超人、不可能去翻轉它；可是如果說每一個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範圍內做一點點，那越多人越多做一點點，那個加起來就會有影響力。

對黃哲斌而言，媒體人生涯十六年來，在調查採訪室是一件難得的經歷，尤其其他四位同事都是都帶著原本的豐富的經驗、知識還有人脈來到這裡，彼此謀合、各自發揮，大家都是在有限的空間裡付出最大的能量。

這大概是我待過新聞圈十幾年來我所共處的單位裡面平均數值最高的一個 team，因為你在媒體裡面很少會碰到就是說所有的你的這個 team 的同儕都是工作十年以上或是二十年以上，然後都有主管經歷大部分啦除了高有智以外都有主管經歷，然後每個人對新聞的 sense 跟熱情衝勁都很強，覺得這是很難碰到的。

但身處越來越惡劣的媒體環境，黃哲斌認為政商影響力仍無從規避，而他對媒體置入性行銷更是忍無可忍，對他來說，新聞媒體的最後道德底線在於「真相」，而置入性行銷是一種變相的販賣真相，讓新聞變成是可販賣、可議價的，模糊了真假的界限，因整體環境所產生的不可抗拒之惡，讓黃哲斌忿忿難平。

我們都要有時候要輪流進去報社核稿，要進報社值班、要核稿要看版面要簽名甚至要掛你的名字責任主編，那我就非常受不了，我就說我核的版面不能有業配新聞要不然我就丟垃圾桶，所以他們也應該很頭痛，後來從此之後我核的版面他們就不敢放業配新聞進來。(問：那你就更應該要留在那邊，然後阻止、至少保留一塊版面)可是我只能做的是當我支援核版面的時候不會有業配新聞，可是我沒有辦法阻止別人的版面不會有業配新聞。

媒體職涯的畢業禮物：自殺炸彈客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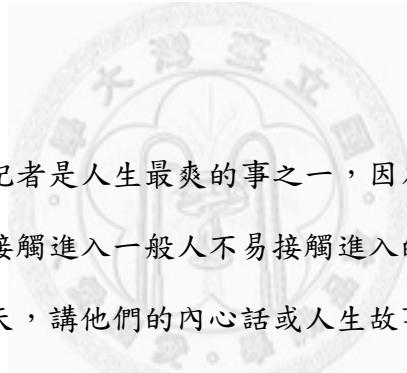
基於對媒體環境的失望與憤怒，在調查採訪室奮鬥了兩年多的黃哲斌，又再度讓自己的人生拐了個大彎，這次他決定要離開媒體。

即使到了中年仍不改叛逆性格的黃哲斌，打算進行一項驚天動魄的書寫計畫，寫出這些年來企業跟政府如何利用置入性行銷所控制媒體，黃哲斌將利用網路平台發表一系列媒體置入性行銷的文章，試圖從非主流反攻主流，他自嘲自己是一名自殺炸彈客，以不要命的決心帶著揭露媒體內幕的書寫計畫在媒體環境中投下一顆震撼彈。

我想試試看就是說完全不靠主流媒體的力量甚至是說跟主流媒體對衝的力量，可能完全靠網路完全靠其他力量的串聯能夠去改變主

流媒體多少。相對來講我還是覺得主流媒體在現在還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試試看有沒有這個可能性讓這件事情翻轉。

一開始誤打誤撞地踏入新聞圈，中途也數度考慮離開媒體，但在《中國時報》相對自由、開明的組織文化中，無論是在記者時期創造出自己的一套跑線風格、編輯時期拓展書寫機會、電子報時期廣納網路公民力量，到調查採訪室時期刻意帶入一些扭轉新聞價值的小眾報導，黃哲斌從未放棄建造出自己的創意發揮空間，而置入性行銷卻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但媒體環境的無可挽救的頹勢，以及黃哲斌本人笑稱的壞脾氣，讓黃哲斌決意要當那個去點燃番仔火的炸彈客，引爆新聞圈。離職前夕，黃哲斌仍不改豪邁性格地為自己的記者生涯下此結論：



對我而言，幹記者是人生最爽的事之一，因為有人付錢買單，讓你到處行走觀看，接觸進入一般人不易接觸進入的場景，還有一些精彩的人願意陪你聊天，講他們的內心話或人生故事。當然遇上鬼扯打屁不甩你的人也很多，但這又提供你跟他們周旋的益智遊戲時間（而且免費），可以預防提早老年痴呆，然後你聊天的結果，可能寫成文字，成為大家關心討論的話題，甚至造成一些還算正面的影響，讓你覺得總算不枉爹娘生下你，不枉自己每天吃糧拉屎吸入氧氣呼出二氧化碳。

即便對於整體惡劣大環境有所不滿而採取絕地大反攻的黃哲斌，回顧自己陰錯陽差踏入新聞圈的際遇，仍然覺得是一段美好的旅程，

畢竟你的確在裡面你可以看到很多別人看不到的事情，即使是像媒體置入性行銷這麼骯髒的事情，如果你不在媒體外面的人根本就看

不到。那不管你在哪個路線妳一定會看到一些獲得到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而且它會培養去你觀察的能力，還有去找問題還有分析問題的能力，甚至他可以培養妳去解決問題的能力。

也許正是多年來的媒體人訓練，以及對媒體仍然懷抱著期待，看起來黃哲斌似乎換了另一種更為基進的抵抗途徑，以離開《中國時報》，書寫媒體置入性行銷秘辛作為一場自我的媒體革命，但離開並不代表放棄，只是更證明了黃哲斌不停找尋著一套解決問題的方式。

第六節 調查採訪室

2008 年成立至今，調查採訪室即將屆滿三年，從一開始的高度不確定感，組員們的摸索與自我定位、穩固單位的價值，與報社高層的協商與爭取，到獲得大大小小的新聞獎項，〈我的小革命〉與〈民國九九，台灣久久〉專題報導集結出書，期間還經歷了人事變動，有人調職，有人離職，也有新血加入。三年來有欣慰的掌聲，也有無可奈何的嘆息。

【調查採訪室歷程】

亂世守護一畝田

2008 年六月，《中國時報》宣稱轉型精英報，企圖在報業市場重新定位，走政治、菁英、都會路線，藉以區別質報、量報之分。當時的發行人周盛淵曾在給中時同仁的一封信裡寫到：

中國時報一直便以優質報紙自我期許並獲得肯定，「菁英報」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再做改良。因此他的讀者對象應該是高社會地位、高教育程度、高所得收入、高度國際觀及高度社會參與的各界意見領袖。但由於我們能是一個綜合性報紙，因此應該涵蓋的將是不分年齡層和地域性的所有讀者。也就是說，未來的中國時報雖是偏重社會菁英，但並不孤芳自賞的脫離現實。

(周盛淵，給中時同仁的一封信，2008)

因為將讀者群鎖定在社會菁英，《中國時報》裁撤了地方中心及近一半的員工，重新編制改版，積極尋求差異化。在此目標下，報社新增調查報導的單位，期許該單位以深度的、調查的專題報導，為報紙內容帶來深度與質感。

時任總編輯的王健壯與政經中心主任夏珍，於是任命時任政治組主任的何榮幸成立新單位—調查採訪室，在組織內的編制直接隸屬於總編輯。於是五名在政治、地方中心、財經、網路電子報深耕的資深記者，在主任何榮幸的號召下，帶著各自的一身好武功，於 2008 年八月集合到調查採訪室(黃哲斌十月到職)，企圖在搖搖欲墜的報社裡，呵護一塊堅實的境地，做出不同於膚色腥小報新聞的優質報導。

成立之初，因為高層未明確指示單位的任務與方向，一切全憑五個人自行想像、摸索，因此調查室陸續做了許多不同的嘗試，一方面為了接合時事，調查採訪室搭配熱門議題趨勢，策畫即時性的深度專題，如旅外棒球選手「台灣鈴木一朗林哲瑄 快腿 3.8 秒」(中國時報，2008.08.10)、民生經濟「貧富差 58 倍創新高窮人抓狂」(中國時報，2008.08.22)、「不景氣 不低頭」系列專題(中國時報，2008.12.20)、國片前景「海角、悶男孩 拍出國片復興年」(中國時報，2008.09.12)、網路新趨勢「按 Enter 我抗議 網路社運來了」(中國時報，2008.11.21)「部落格經濟 滑鼠點出大生意」(中國時報，2008.12.08)，以及揭露性的調查報導如「弱

勢兒包營養午餐 當全家晚餐」(中國時報，2008.08.22)、「搶救防風林 唐吉訶德大戰風車」(中國時報，2008.09.13)、「搶救關懷盃 許原民孩子 1 個未來」(中國時報，2008.11.20)等；另一方面，調查採訪室也著手非即食性的系列專題，在八月底推出「名人家族故事」，每週日固定刊登，期許能「透過許多不為人知的家族故事與動人感受，提供各界觀察他人的生命軌跡、思索自己的生活價值、體會不同家族的相處方式，藉此重新觀照個人與家族的相互影響與生命意義」。

由於何榮幸在尋找組員的過程中，就先行設定要網羅不同專精領域的各路好手，因此分屬政治、社福團體、司法警政、財經、網路社群路線的五名記者，一到調查採訪室報到，分工自然形成，當小組開會討論，五人依照原本所熟悉或關注的議題提案，經由五人討論報導觀點與執行方式，達成共識後，再分配每個人的職務，好比仰賴謝錦芳的財經專業與路線人脈，諸如民生經濟或者產業動態等相關報導，大多是交由謝錦芳主導，其他人則扮演支援角色。遇到其他四人擅長的領域，也是按照上述的模式分工。在每一次的編輯會議裡，調查採訪室主任何榮幸代表全體五位組員，與報社其他新聞競逐版面，過程中調查採訪室漸漸找到了站穩腳步的立基點，建立起這個新單位在報社內的價值，原屬於不同路線的五個人，也在每一次開會與合作下，越來越熟悉彼此的工作態度與習性。

改朝換代後的寒蟬效應

歷經了裁員、轉型，2008 年年底，《中國時報》最終仍然回天乏術，二代老闆余建新只好將中時集團轉賣給食品業起家的旺旺集團。由余紀忠一手建立的余家王朝正式結束。當時，調查採訪室成立半年，逐漸建立出單位的步調與風格，卻隨即遭逢報社的變賣易主。

旺旺集團的「深口袋」暫時排遣了中時員工的徬徨感，給了勞動者們一份暫時的安穩，新東家所實施的節流與成本管控政策，也讓《中國時報》營收逐漸由虧轉盈，報社員工薪水調漲。然而，新老闆蔡衍明上任不久即提出的四大經營理

念：「旺台灣」、「旺中國」、「化解兩岸誤解」，以及「讓全世界華人都快樂」(蔡衍明，給中時員工的一封信，2008)，曾引發是否造成中時媒體角色矛盾的質疑。

再加上蔡衍明剛接手中時集團，便為了產權爭議槓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NCC)，大動作寄發存證信函給七名曾公開發言、投書或撰寫相關報導批評中時的學者和記者，引發國內近一百五十名傳播學者串連聯署，呼籲旺旺中時勿侵害言論自由與新聞專業。在此事件爆發後的《中國時報》和《工商時報》，共同登出了一篇由高層主筆的社論「媒體人應有的氣度與承擔—蔡衍明與中時媒體人的共識」(中國時報，2009.06.19)，文中提出四大理由說服蔡衍明不需提告，間接教育了食品業出身的新老闆，同時也展現了中時編輯部敢於諫言的風骨。事件最終在蔡衍明放低身段道歉落幕。

在改朝換代的變革中，多了務實的管理制度，止住了集團財務上的虧損，但老闆的鮮明立場與處事風格，致使時報集團內部形成一項隱性審查機制，即使編輯部極力維護專業自主，卻仍時有不敵老闆意志的束縛感。

據楊秀娟(2010)以旺旺入主後的中時為探討個案的博士論文，提及 2009 年《工商時報》推出的中國專題，以「中國大陸保八將很辛苦」(2009.06.26)為頭版標題，蔡衍明便對此表達不滿；又因為《中國時報》報導了民調顯示馬政府施政滿意度下滑，記者在報導中批評馬政府無能(中國時報，2009.05.14)，引起蔡衍明不悅，這次的事件再延續到年底，大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計畫訪台，中時大陸線記者寫出一篇「A 咖對 C 咖」(中國時報，2009.12.26)暗指台中兩方關係的報導，再次被踩底線的蔡衍明終於爆發，當時的總編輯夏珍隨即遭撤換，該篇報導也火速勒令撤出《中時電子報》，防堵網路散布流傳。這波人事異動讓中時集團由上到下，莫不感受到老闆貫徹意志的強勢主導力，內部因此引發了寒蟬效應，造成了記者與編輯台的自我審查，避免報導內容與老闆立場相牴觸。

隸屬於《中國時報》的調查採訪室，在組織的層層規訓機制下，自然無法獨善其身，當碰觸到諸如政治、兩岸關係等敏感議題，便會格外小心處理，或者乾

脆先行迴避。

從「我的」小革命做起

正因無法獨善其身，卻有著繼續待在主流媒體的決心，即便如郭石城對調查報導的想像奠基於傳統揭弊式的報導，進到調查採訪室後躍躍欲試，五名成員也陸續執行了幾則小型深度調查報導，但調查採訪室成員們評估到單位尚沒有資本從事政治經濟面向的揭弊式調查報導，在先求確立調查採訪室價值的前提下，因此避開了衝撞組織的激烈革命，改而透過深度報導進行一項體制內的寧靜改革，著眼關懷公民社會的實踐行動。〈我的小革命〉專題便是在五位記者這樣的意念之中，發想成形。

它(指我的小革命專題)會變成是一種比較相對間接，以及一種比較有包裝過的方式去讓看的人感受到我們的企圖，而不是很直接就在這邊講說主流媒體有多爛，我們應該要怎麼做。所以它跟一些過去反叛的力量比較起來，不見得會有那種很直接震撼的效果。

(何榮幸訪談稿)

於是從 2009 年元月份開始，〈我的小革命〉每周末固定刊出。小革命專題所要書寫的是民主改革的巨大熱情降溫後，社會運動式微，取而代之的台灣「公民微力量」，在多元價值爭奪的後現代社會底下，公民如何進行草根基層的社會改造，甚或發出主流媒體之外的獨立之聲，藉此反思主流媒體的盲點與侷限：

我用不同的方式在主流媒體裡面自己去挑戰主流媒體的角色，那當然我沒有辦法直接去說中國時報很爛、中國時報失職，我不會用這種直接的策略，但是你如果用這種間接的策略在主流媒體上面，因為

主流媒體上面確實是有閱報率比較廣的影響力，以及一些不同屬性的媒體看了以後會跟著想報導去採訪也是有，我透過這種方式把我要傳遞的價值觀去把他傳遞出去，那藉著主流媒體的影響力去傳遞我對主流媒體質疑的訊息，這其實是調查採訪室有意識在做的一個路線，持續在做。

(何榮幸訪談稿)

在這份系列專題中，調查採訪室報導了「公民記者」(江一豪離開蘋果日報擔任苦勞網不支薪特約記者)、「社區媒體」(吳國城返鄉創辦山城週刊，一辦就是三十年)、「另類媒體」(網路「幹得好新聞」藉搞笑嘲諷時事傳達嚴肅反思)、「草根媒體」(胡慕情、朱淑娟在部落格發揮比主流媒體更強大的監督環境議題功能)、「街頭刊物」(李取中創辦 TBI 台灣版，讓遊民可以賺取一半收入)、「災區媒體」(馮小非、張正揚、陳順孝遠距合作為八八災民發聲)，藉由這些在非主流媒體的作為，檢討肩負教育大眾責任與影響力的主流媒體只著眼於政治口水與名人八卦，忽略了大眾真正的需求與社會價值，而將媒體責任雙手交出去由另類媒體來執行。

調查採訪室不但有意識地藉此檢視與反思主流媒體的盲點與失職，更將革命的詮釋權，從政治口號和抗爭手段中解放出來，回到每一位就在你我身邊的公民身上，強調從自身做起，不用立志做大官，也不用立志做大事，而是立志於小事，藉由小小的生活改變，產生改革的力量，讓讀者從日常實踐脈絡中了解革命的意涵。

一系列專題經營了兩年，展現了就如何榮幸(2011)在小革命第三本書中的序言所說：「這些小革命無疑更能拉近理想與現實的距離，已一片一片拼出台灣公民社會的輪廓圖像，這才是任何大改革、大論述背後最堅實的民間力量。」，小革命中的每一位報導主角，皆共同傳遞了「在艱困環境中以具體行動追尋理想」

的台灣價值，而這無疑也是調查採訪室記者們的中心德目。

確立調查採訪室的存在價值

有了先前深度採訪單位作為前車之鑑，再加上單位成立初期報社的動盪，因而調查採訪室成員們皆有高度的危機意識，期望得以做出品質與市場兼具的深度報導，延長調查採訪室的壽命，並平息報社內部對這個新增單位的質疑。

以往深度報導容易與其他路線記者有踩線、排擠版面的情形，因此作為調查採訪室主任的何榮幸，在編採會議上，展現單位的企圖與自信，時常以「品質保證」、「內容差異化」為由說服總編輯與其他路線主管，強力爭取版面與採訪經費，

我對我們做的這些深度報導跟專題很有信心，我覺得它的動態新聞性以及它的重要性完全不亞於一般的新聞，而且我常常覺得如果我們一般的新聞跟其他媒體沒甚麼差別，你還不如刊登我們的深度報導，跟人家才會有區隔。

(何榮幸訪談稿)

而在調查採訪室五名記者的集思廣益之下，也討論出以保有每周固定版面為首要目標：

你要看到他(指深度專題)的重要性跟價值，所以設定這樣的專欄是有這樣的好處，至少每個禮拜固定有，當然有的時候會不見了，那這個就是在新聞角力競爭過程，那你連這個都沒有的話，就更容易不見了。然後有一部分也至少不會讓我們被人家閒言閒語說不知道你們在做甚麼，至少你看我的小革命、名人家族故事、台灣久久嘛，自然講的出來，這是策略。

每周固定刊出的專題，不但提升了調查採訪室報導的能見度，也因為調查採訪室持續推出的系列報導與五位成員展現出的企圖心，讓調查採訪室擺脫了夭折的魔咒，不但順利存活下來，甚至將報導集結成書出版，影響更擴及政治人物。

2009年年底，〈我的小革命〉專版已推行將近一年，並集結出《我的小革命》一書，據報導²⁴指出，總統馬英九看了《我的小革命》一書後，對書中主角們勇於實踐的勇氣感到敬佩，因而先後造訪書中採訪人物所經營的生態綠咖啡、集集庇護農場，並動用國務機要費，對書中二十四個團體或個人捐款二十萬元；2010年總統元旦文告²⁵中，馬英九甚至引述「我的小革命」精神，強調該年為催生改革行動年。

這件事還引發了後續效應，在馬英九捐款的團體裡，其中苦勞網、山城週刊和黑白切婉拒了總統的捐款，苦勞網與三鶯部落自救會更發表聲明「馬總統，我們要的不是錢」²⁶，希冀總統的善心不要流於單一議題或團體，而是真正意識到能唯有政治權力願意反省，翻轉既有的壓迫結構，才可能獲致公平正義。

意外得到政治人物的回響與反饋，以及公民社會的討論、對話，完全出乎調查採訪室五人對這份系列專題的預期，但藉由大眾的關注與討論，證明了這個新成立單位的努力與成果，以及擴散於社會的影響力，也因而無形中更加強化了調查採訪室在《中國時報》的價值與地位。

當記者遇上業配

有了〈我的小革命〉的成功範例之後，2010 年，為了迎接中華民國建國百年，《中國時報》推出 365 天不間斷的大型專題〈民國九九，台灣久久〉，由調查

²⁴ 「馬讀《我的小革命》 感動買咖啡」(中國時報，2009.12.25)「《我的小革命》催生改革行動年」(中國時報，2010.01.02)；「挺《我的小革命》團體馬各捐 20 萬」(中國時報，2010.01.10)。

²⁵ 馬英九 2010 年元旦文告詳見 <http://www.uocn.org/bbs/viewthread.php?tid=33215>

²⁶ 聲明詳見 <http://blog.chinatimes.com/laborpower/archive/2010/01/25/467249.html>

採訪室主導策畫、執行，幾乎動員了報社的全體記者參與，十二個月份總共有十二個主題，報導台灣建國百年來的歷史演進與庶民生活面貌，包括建築、飲食、戲劇、政治等面向。

這項大型專題報導最後榮獲了第 24 屆吳舜文新聞獎的文化專題報導獎，但新聞獎光榮與報導品質保證的背後，其實經歷過一段不為人知的衝突與爭取，「我們也曾經因為置入性行銷跟編輯部門還有業務部門有過很劇烈的、語言上的溝通（笑）」。在專題發想初期，為了杜絕置入性行銷的入侵，調查採訪室與編輯台、業務部門曾閉門溝通過，

我們是跟○○（此處以匿名處理）合作，廣告部希望說○○能夠付置入性行銷的費用，也就是說是彼此互惠的合作，因為他們知名度也還不夠高，那他們也有預算，通常跟媒體合作也知道說其實可以用這樣的方式，那就是我們到時候大量刊登它們提供的照片，然後請他們刊一些置入性行銷的廣告。剛開始廣告組的期望是這樣。

（何榮幸訪談稿）

之所以產生衝突，主要是廣告業務部門跟調查採訪室的雙方考量的牴觸，廣告業務部門站在組織利益設想，而調查採訪室為維護新聞專業自主，拒絕接受任何置入性行銷，以維持專題報導的獨立性。原本調查採訪室已經跟報社表明要以公開贊助的無償合作關係進行專題報導，但後來廣告業務部門仍單方面承接了○○的置入廣告，讓調查採訪室的這份大型專題染上商業牟利色彩，

○○還是要完成上網公開招標的程序，那我們廣告部就去接標，六十五萬也接了，那我知道那件事情坦白說也是滿生氣的，總編輯夾在中間相當左右為難，因為這樣子我們曾經大吵過一架。

(何榮幸訪談稿)

激烈爭執過後，最後採取的解套方案就是調查採訪室跟廣告業務部各走各的路。「民國九九，台灣久久」專題從頭到尾不接受任何置入性行銷，而是改以無金錢往來的合作關係，並且在報導版面上標註「無償合作單位」；廣告業務報門則和○○「有償合作」，獨立製作十二塊廣告版面。

這個專題從頭到尾我不要收○○的一毛錢，我可以接受我們後來呈現的方式，就是「公開贊助」，在頭版頭會出現贊助廠商，一開始是摩根富林明，後來有幾家像中華開發，有註明廠商提供贊助經費，就這樣。那個不可能是置入的內容，那個是企業形象的露出，可是我們廣告部要的是○○的那種置入。

(何榮幸訪談稿)

最後能有這樣讓報社跟調查室成員都能接受的結果，過程中有拉扯、有退讓，也有相互體諒，當然極力的爭取與表態是不可或缺的：

因為他(指何榮幸)有跟我們全部討論過，萬一這個一整年的專題到處都是業配的話，那做起來會很痛苦，那我們的決議就是如果總編輯不能承諾的話，整組就退出這個專題，他就當面跟著總編輯還有業務部門的主管表達我們這樣的想法。

(黃哲斌訪談稿)

這次衝突事件也證明了報社立場與記者專業自主的關係呈現動態互動，並非固定的權力宰制，而組織內五個人共同討論出一致的立場，傳達集體的聲音，比

個人的意見來的容易上達天聽，也較容易受重視。雖然極力表達意見不代表一定會成功，但至少必須要先有爭取自空間的動作，才有推進的可能性。

不敵大環境，黃哲斌離職

成立近三年以來，調查採訪室執行的大大小小專題獲得了許多正面迴響，從獨立媒體、環境保護、土地開發、社區營造、網路公民、獨立音樂創作，乃至貼近草根底層的性工作、移工/民、工殤者，而後又在建國百年之際，推出了台灣各生活面向的專題，調查採訪室以報導貼近台灣庶民生活，讓讀者看見台灣社會的生命力。在進行報導的同時，對新聞記者本身也是一種培力(empower)的過程，如何榮幸和高有智某部份解決了記者認同的焦慮，謝錦芳轉換了過往的工作型態，接觸到不同的人物與議題。

對調查採訪室而言，雖然可以藉由報導議題的轉向，迴避政治上的敏感，但在商業力的掌控下，「新聞廣告化」有如揮之不去的鬼魅，只要廣告主有置入的需求與手法，媒體就只有被置入的命運，身處如此環境，調查採訪室成員們可說是舉步維艱。

過往出現在報紙版面上所謂的「工商新聞」、「編業合作」或「廣編稿」，大多會在新聞版面上特別註記，或只出現在消費、生活、旅遊等軟性新聞版面；2000年後，隨著媒體營運困難，各家媒體開始以整版的「座談會」形式，賣給政府部會宣導政策，或賣給民間機構宣傳產業訊息，以「專輯」、「專題」的字眼變形現身，出現新聞第一落要聞，挑戰新聞與廣告的界線。

早在 2005 年，林照真就曾在《天下雜誌》一篇報導中闡述台灣各家媒體在惡性競爭之下，新聞淪為秤斤論兩的謀利商品，過去傳統新聞學強調的新聞專業、記者信條、媒體獨立等新聞意理紛紛遭廉價拋售；劉蕙苓(2005)也指出置入性行銷違反了新聞事業所追求的獨立自主、公共利益、對大眾負責等三個核心倫理價值，不但傷害新聞專業，更侵犯了新聞記者的職業尊嚴與工作自主權。部分

媒體記者開始被報社賦予「拉業績」的任務，報社以抽佣、獎金、升遷、考績等不同方式迫使記者就範的行徑時有所聞，記者身兼廣告業務幾乎成為公開卻不能說的秘密，許多記者在認知不和諧下離開媒體。

天下雜誌發行人殷允芃獲頒 2010 年卓越新聞獎首屆終身成就獎時，發表演論質疑政府帶頭置入行銷；2010 年囊括卓越新聞獎與曾虛白新聞獎三項大獎的獨立新聞工作者朱淑娟，在部落格發表的得獎感言中，對主流媒體置入性行銷的景況也有所感慨。而據財團法人新聞公害防治基金會的初步統計，2010 年全年主要報紙置入性行銷報導總計高達 378 則（註明「專輯」或座談會者尚未計算在內），已超過前年全年 165 則的兩倍，顯示出媒體產業置入性行銷的猖獗，且來勢洶洶，在連生存都成問題的處境下，為了組織營利，新聞工作者們幾乎無可規避廣告置入。

就在 2010 年 12 月，黃哲斌在部落格上以《乘著噴射機，我離開中國時報》一文作為離職宣言²⁷：



說來矛盾，兩年前，我調回報社擔任調查採訪室記者，期間沾了一群優秀同事的光，陸續參與「我的小革命」、「民國九九，台灣久久」、「名人家族故事」、「不景氣不低頭」等系列報導，兩任總編輯給予極大的尊重與空間，一方面，這差事是值得責命的、這報社是值得責命的。

另一方面，我越來越難獨善其身、越來越難假裝沒看到，其他版面被「業配新聞」吞噬侵蝕的肥大事實，新聞變成論字計價的商品，價值低落的芭樂公關稿一篇篇送到編輯桌上，「這是業配，一個字都不能刪」。

（黃哲斌，2010）

黃哲斌之所以離開《中國時報》，起因於近年來媒體置入性行銷(Placement

²⁷ 系列文詳見黃哲斌部落格：【圖解】第一次買新聞就上手 <http://blog.chinatimes.com/dander>

marketing)²⁸大舉入侵。當所有媒體為了衝發行量，拉廣告，聳動、嗜血的新聞上頭條已不稀奇，將新聞編採以整合行銷的方式兜售才是王道。有感於媒體生態的改變，黃哲斌於是選擇用最激烈的手段—離職—作為個人表態，藉以離職宣言公開批判媒體置入性行銷，並在個人部落格《【圖解】第一次買新聞就上手》連續撰文揭露置入行銷如何影響新聞自由，政府與企業如何藉由預算控制媒體內容，其一連串的行動不旦捲動了新聞傳播學界、媒體改革團體的響應，更迫使政府公開回應，著手進行限制政府置入性行銷的修法²⁹。

黃哲斌的離職，並非單一的偶發事件，而是突顯了置入性行銷已成為當前壓垮台灣媒體公信力與記者專業的最後一根稻草。為了組織的營利與生存，向廣告主靠攏似乎成了當代媒體的必要之惡，也成了當代記者的「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許多記者被迫面臨「to be, or not to be」的兩難。黃哲斌的離開或許不是個案，而是彰顯了媒體工作者的普遍困境，他的行動也不代表他擁有過人的勇氣，繼續留在產業內的記者也並非對現況麻木或滿意，只是每一個記者在崗位上作出了各自的選擇，發展出自己的一套叢林生存法則罷了。而黃哲斌則選擇了以他自己的方式，對當前台灣報業發出「一種溫柔的抗議，一種委婉的提醒」。

黃哲斌自認為這兩年多來在調查採訪室撰寫「我的小革命」專版的經驗，是促使他最後在媒體產業揭竿起義的重要動力，「因為每一個小革命的主角，都讓

²⁸ 根據美國行銷學會（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對於廣告的定義，「置入性」具有四個條件：

1. 付費購買媒體版面或時間。
2. 訊息必須透過媒體擴散來展示與推銷。
3. 推銷標的物可為具體商品、服務或抽象的概念（idea）。
4. 明示廣告主（sponsor）。

²⁹ 2010年12月26日，全台四十六個傳播系所、一百三十一位學者連署反對「政府置入及業配新聞」；隔天27日，總統兼執政黨主席馬英九在府院黨高層五人小組會議中，表示政府不得進行含有政治目的的置入性行銷，但仍有進行政令宣導需要者「應標明為廣告」，並從政府自律著手，研究相關法規配套。2011年元月3日，國民黨立委黃義交、民進黨總召柯建銘分別提案，希望「預算法」修正案禁止政治置入行銷，杜絕政府部門買新聞。元月十二日，立院本會期最後一天，「預算法」修正案列為優先法案，朝野無異議通過：

「未來政府各機關暨公營事業、政府捐助50%以上之法人及政府轉投資事業，基於中立、維護新聞自由及人民權益，編製及執行政策宣傳預算時，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為之，也不可以進行含有政治性目的的置入性行銷。各機關執行政策宣導廣告，應載明機關名稱，並明確標示其為廣告。」

人相信：『勇敢去做，絕不孤單』」，黃哲斌爆炸性的離職行為，便是黃哲斌置身於惡劣環境下，對置入性行銷的最後反擊。從黃哲斌擔任《中時電子報》副總編輯，一路看著置入性行銷的魔掌伸入編輯台，

當時目睹業配新聞「和平崛起」，廣告主試圖介入新聞產製流程、試圖讓記者與編輯成為企業公關部門的附庸。然而，編輯部至少還肩負守土之責，換句話說，「吵完一架大多還挺得住」……

（黃哲斌，2010）

到黃哲斌轉任《中國時報》調查採訪室主任記者，才幾年的光景，魔掌越來越深入。即使調查採訪室力抗置入性行銷，在（民國九九，台灣久久）專題中防守成功，但同時需要進報社負責審核其他版面的黃哲斌，常有陷入組織利益與新聞專業的矛盾掙扎，對於零星式、個別式的抵禦特別有所感觸，

它是一個大的惡劣環境裡面去做一些小的好事情，我覺得這是不夠的，就像我跟榮幸比喻這就有點像說我們是一支職棒隊裡面的球員，我們上去認真地打一支二壘安打或甚至打一支全壘打，可是教練跟球團是授意全隊人或是其他球員是要打放水球的、打假球，那你一兩個人去認真打球變成是沒有意義的，你沒有辦法改變這整個環境。

（黃哲斌訪談稿）

此事件彰顯出調查採訪室的作為放到快速惡劣的外在環境下，仍顯得力氣微小，不足以翻轉組織乃至於媒體場域。

儘管調查採訪室極力抵抗被置入廣告，但也無從改變整體產業的風氣與組織政策，調查採訪室成員們所能做的，就是保持調查採訪室所負責版面的「純淨

性」，杜絕廣告業務的干擾。

那是(指其他版面)我在這個報紙裡面我負責不到、我管不到的領域，因為廣告版面是廣告部承接。以我自己來講，我越碰到那樣的現象就越鼓舞我有一種意志說我越要多做這種版面，哪怕只是說平衡也好，就是我知道我的報紙有一些版面被買走，要去替一個很有爭議的公共政策做宣傳的時候，其實我就覺得我應該更有意識地去做一些至少去讓讀者可以平衡、聽到不一樣聲音的版面。我能夠做的是這些。

(何榮幸訪談稿)

但就像黃哲斌所說，光這麼做，還是不夠。儘管調查採訪室以報導傳遞顛覆主流價值的理念，展現出革命也能從每個人身上的多元差異與日常作為中施行，但若要改變整體結構，勢必不能僅止於公民議題的倡議，最終仍須要面對政治性的、結構性的改革。

這是黃哲斌之所以跳出來的主因，此外，黃哲斌在接受其他媒體³⁰採訪時也提到，兩年來在《中國時報》撰寫〈我的小革命〉專版的經驗，是促使他投入此一反對運動的重要動力。無形中，黃哲斌被自己筆下的報導人物所鼓舞，只是他選擇另一條不同於小革命的路徑，來改造自己，改造媒體環境。

留在主流媒體的活口

對於黃哲斌離職事件所引發的後續改革，《中國時報》內部對此雖有諸多討論，有人讚賞，有人質疑，但大體而言，並未致使調查採訪室承受高層壓力，老闆蔡衍明甚至示意組織挽留黃哲斌，並與黃哲斌私下懇談，交換意見；而調查採訪室在此事件中，始終保持低調，僅在出版《我的小革命：顛覆主流》(2011)書

³⁰ 報導詳見 http://okapi.books.com.tw/index.php/p3/p3_detail/sn/449

中的序言，與黃哲斌的行動遙相呼應。這無疑是路線選擇上的歧異，體制內的不同行動邏輯。

當初調查採訪室五個人都是抱持著「姑且最後一戰」的心態，以「無常」的心情面對環境的瞬息萬變，然而，處在主流媒體之中，難免有所限縮，在組織營利與老闆立場的干預、商業力與政治力的雙面夾殺下，主流媒體記者並無法隨心所欲，這是待在主流媒體的侷限性，這也是留在主流媒體的記者必要承受的限制，與應具有的堅韌。

就像何榮幸數度提及的，「在主流媒體你就是得做這樣的妥協。否則我今天就不是在主流媒體了，我就是在立報或破報了啊，就我愛寫甚麼就寫甚麼。」或像謝錦芳在訪談中說到，「當然自主性是比較高的，但所謂的自主性也是有範圍的嘛(笑)」；或像黃哲斌那般，帶著自殺炸彈客的壯烈犧牲，期許藉此牽動社會的反躬自省，作為啟動大革命的小齒輪。

但無論革命行為的激烈或寧靜，只是在共同目標下採行不同戰鬥策略與位置，體制內與體制外的改革等同重要，黃哲斌「番仔火加汽油」式的大革命與其餘四人堅守「柴薪」式的小革命，一樣都能撩起革命之火，這兩種路線也都是行動者在充分認知到自身的侷限性的前提下，試圖讓行為達成最大效益與影響力。不管是留在主流媒體，還是離開媒體，能做到的，就是拉起一道底線，在這道底線內做出最大的努力，凝聚能量，匍匐前進。

很多都不像我們當初所設想的那樣，但這是必然的，媒體環境就是這樣。現在反而是會比較用一個大的角度，我覺得你很難寫好一個劇本，然後叫大家配合你演戲。在媒體裡生存，即便是做到總編輯，他都沒有辦法寫好一套完整的劇本，然後大家都能夠在裡面扮演那個角色。所以你只能掌握一個劇本的精神，有多少空間就實踐多少的可能性。

(高有智訪談稿)

誠如高有智所說，在當今的媒體生存，沒辦法預知所有事情的變化，即使來到了自主權較高的調查採訪室，大家並未因此對媒體環境及組織的綿密掌控感到樂觀，五位記者明白在主流媒體內的突圍是在一定的範疇內，外在的結構不是那麼輕易翻轉。

五名記者都不諱言，從調查室成立至今也經歷過一些與當初預設不同的變數，但在新聞界打滾多年的他們，始終以務實心態面對。這五名記者就如同自己筆下〈我的小革命〉裡的報導人物一般，不只提供理念想法，而是付諸行動身體力行，即使在主流媒體中被視為叛逆的怪咖，或是過度浪漫的唐吉訶德，但不管成功與否，他們仍懷抱單純熱情，持續在行動之中。

調查採訪室的現況與未來

2010 年五月，郭石城因轉任教科文組主任，離開調查採訪室，隨後補加入由政治組調過來的楊舒媚；2010 年十二月，（民國九九，台灣久久）大型專題告一段落後，黃哲斌離開《中國時報》，隻身投入反置入性行銷公民運動，由主跑藝文線的記者黃奕瀅加入調查採訪室，維持五人小組編制。

2011 年三月，持續刊登了兩年多（我的小革命）畫下句點，由新的成員組合共同策畫、製作全新固定專版（消失與重生），報導各領域正在消失中的文化現象或重要事物，挖掘該現象或事物如何在轉型後重生。

雖然成果豐碩的小革命專版落幕了，但對調查採訪室及其成員而言，在主流媒體內的小革命將永不停歇。而在小革命的過程中，帶動記者自身與公眾們在社會結構下得以轉型、重生，更是他們長遠的方向。

第五章 研究分析

第四章以生命故事的方式，讓五名調查採訪室記者分別述說自己的記者職涯歷程：從如何踏入新聞場域，如何從不諳行規的菜鳥記者到累積出專業的資深記者，最後來到調查採訪室，以集體合作的方式繼續實踐新聞專業。為了避免書寫過者中研究者的主觀介入，因此本文以受訪對象的談話內容為詮釋基礎，再以研究者與受訪者談話中共同建構出的認知角度鋪陳出記者個人的職涯史，除了受訪者依據記憶回溯自己的職涯歷程，本文同時輔以當時的社會政經條件與媒體環境，藉以對照個人生命發展的社會情境。

調查採訪室的五名記者懷有的記者想像、專業意理不同，進入新聞界的時間不同，不同的職涯發展鋪造了這五個人不同的資本累積路徑，最後匯流到了調查採訪室。本文試圖從五名記者生涯中觀察、歸納出他們的異質性與同質性，又根據本文的研究旨趣，在於記者如何累積資本，展現秀異，進而獲得專業自主權，因此研究者在與受訪者建構他們的生命圖像的時候，將焦點放在記者憑藉自己心中的新聞意理，在每一次採訪經驗中如何實踐專業自主，進而累積資歷。

由於本文主要是以 Bourdieu 的場域理論為架構，探討行動者如何在有限制的生產場域中發展生存路線與策略，根據 Bourdieu 的場域理論，各個行動者所擁有的資本組何與總量，與行動者在場域內所佔據的位置，有著相互影響、相互決定的辯證關係。簡言之，在場域中行動者可透過結構生成的生存心態與累積的資本，維持或改善自身在場域內的位置，公式如下(邱天助，2002)：

〔(生存心態)(資本)〕 + 場域 = 實際行為

〔(habitus)(capital)〕 + champ = pratique

本章接下來將依據場域理論為架構，爬梳這五名記者踏入新聞場域前後的政經氛圍與社會變動，並整理出五名記者的職涯圖像，從中歸納出他們各自的生存心態與資本型式，與踏入新聞場域後的「戰鬥模式」。

第一節 行動場域

一、時代氛圍 (政治情勢、文化因素)

調查採訪室中，高有智以外的四人年齡相仿，在西元 1960-1966 年間出生，因而擁有共同的世代成長經驗。

何榮幸、郭石城、謝錦芳、黃哲斌成長於政治壓制、經濟起飛的戒嚴年代，身處於政治言說為禁忌的時空，文化成為掙脫極權控制的另類出口，如黃哲斌的經驗，透過閱讀西方思潮書籍或宣揚政治意識的地下刊物，建構出自己的一套的世界觀。而 1977 年主流大報《中國時報》、《聯合報》副刊發生的鄉土文學論戰，諸如此類的文化爭霸或多或少左右了那一代人的政治意識型態與國族想像。

四人的大學或專科時期，適逢 1980 年代以降政治權力鬆動的關鍵期，蓬勃、騷動的社會力量，亟欲衝破極權政治防線，來自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的各式改革聲浪一波一波湧現。在受訪者的自我回溯中，雖然僅有何榮幸一人提及受到當時社會脈動的牽引，但對在此時代氛圍下成長的五年級同學們而言，都無從規避地受到或多或少的影響，可能因求學環境的不同(如何榮幸正好在學生運動領頭的台灣大學求學)，或個人關懷的具現方式不同 (如黃哲斌透過藝文展演方式，而非親上火線抗爭；謝錦芳參與服務性社團，以影像紀錄弱勢者生命)，就如同 Bourdieu 所言，不同人在相同的時代下各自選定行動位置，一來跟生存心態有關，一來也跟手邊擁有的資本有關。

二、新聞場域的變動

1988 年報禁開放之前，台灣政府對報業採取「限證」、「限張」、「限印」管制，全台領有政府發放執照之民營、黨營、軍營報紙總數共有 31 家(陳國祥、祝萍：1987)，報禁解除後，報紙數量急速倍增，報社紛紛編制改組，招募延攬人才，並增添更新硬體印刷設備。到 1990 年底，登記的報紙家數已達 300 家。調查室裡，何榮幸、郭石城、謝錦芳、黃哲斌四人都是在 90 年代初透過報社招考或投遞履歷的方式，在媒體謀得一職。

報禁解除後，表面上破除了壟斷性的結構，但握有派報通路的聯合報系與中國時報系的市場占有率合計仍高達 70%(中華民國新聞年鑑，1991)，而廣告營收方面，聯合與中時名列一、二名，顯示出報禁開放後，兩大報並未受到動搖，反而繼續獨占鰲頭，以大報團的競爭優勢創造更多商機。這使得辦報成為一場資本家才有資格加入的賭局，當時唯一能跟兩大報抗衡的報老闆財力背景雄厚的《自由時報》，日後更逐漸演變成三強鼎立的時代。

1993 年，立法院三讀通過有線電視法，台灣電波頻道全面開放，有線電視合法化，廣告商將購買目標轉移到電視台，報業廣告量因而從 1999 年開始連續四年負成長(動腦雜誌 327 期，2003)，報紙優勢不再，從此失寵。電視台瓜分了廣告收益再加上網路媒體興起，報紙閱讀率一路下滑，蓬勃一時的報紙在這樣的環境劇變下，紛紛面臨生存危機。

為求生存，各種旁生的經營手段相繼出爐，如《中國時報》成立網路事業部之後，又介入中天電視台的經營權，企圖經由跨業結盟擴大市場版圖；《聯合報》除了成立聯合新聞網之外，也利用過去的知識資源，設立聯合知識庫販售營利，並推動 E 化工作，改善報社體質與工作型態(王天濱，2002)。而除了新聞本業，兩大報也積極利用人力、設備等資源，多角化經營，以增加業外收入，舉辦大型藝術展覽是最常運用的吸金大法(徐蘊康，2001)。此外，各報也開始以整版新聞刊登各級政府部門的座談與政策說明，在新聞與廣告之間的模糊邊界遊走牟利。

到了 2003 年，香港壹傳媒集團繼以《壹週刊》成功跨海登台後，又創辦了《蘋果日報》，據謝慧鈴(2003)《蘋果日報》來台發行紀實一文指出，蘋果出刊前後引起社會各方對於媒體新聞道德的論戰，蘋果專挖名人隱私、膚色腥的黃色新聞(yellow journalism)、小報定位，引發臺灣報界質報、量報孰優孰劣的爭辯。然而，《蘋果日報》影響台灣報業的不僅僅是膚色腥及八卦化的新聞內容，而是「商人辦報」的市場導向新聞學：《蘋果日報》將報紙視為純然的商品，讀者就是消費者，其標榜「讀者要什麼，我們就賣什麼」，並要求麾下的新聞工作者根據讀者需求與市場變化而變化，顯示出其以一種資訊消費主義的市場法則統領新聞運作，使完全市場導向的新聞事業興起並成為強勢典範(余旭、黃煜，1997)。

在市場之前，昔日標榜文人辦報的《中國時報》和《聯合報》面臨媒體角色重新定位的矛盾處境，當初如《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以書生救國救民自許，只問對社會有沒有貢獻，不計較符合不符合成本效益的文人辦報理念，如今市場新聞學之下，編輯部也只好放下身段，被迫朝向編輯、廣告、發行三足鼎立的方向調整(李筱雯，2004)。

三、次場域：《中國時報》的組織文化

余家的《中國時報》，與其他媒體相比，一向是充滿人治色彩的彈性組織，特別是創辦人余紀忠仍在世的時期，余紀忠尤其欣賞有創意、有批判性、有主見的人，而這套用人哲學深刻影響了中時的組織文化。楊渡(中國時報，2003.04.10)紀念余紀忠的一篇文章裡提到：

1990 年野百合學運時，《中國時報》記者自己花錢，買了《中國時報》的版面作廣告，支持學生運動。來自黨政高層的電話問他：『你們《中國時報》是不是支持學生？』他把年輕記者找來問，聽他們用一種理直氣壯的神情說：『是自己去買廣告，不必與報社有關聯。』他只是笑一笑，沒有說甚麼。他充分地寬容了年輕與叛逆。

從上述例子可看出余紀忠對報社內記者的包容，他的態度鼓勵了中時記者的「敢」，楊渡說因為余紀忠自己就是「一位有幾分浪漫、幾分叛逆、幾分批判精神的典型自由主義份子」。而《新新聞週刊》總編輯楊照，也曾在余紀忠逝世時寫文章緬懷他：

中國時報任用人才的故事，流傳甚廣。第一重點是余先生永遠在第一線上找人才，同時也找挖掘人才、挖角人才的方法。那麼大一家報社，日日要出報，後面又有威權時代的新聞檢查要應付，余先生卻將最多的時間留給「人」。……第二重點是，這麼多余先生自己找來、留下來的人，個性卻五花八門，莫衷一是。在用人上，余先生不相信標準答案，也不隨便從俗，遠離科學，靠近藝術。

余紀忠跨越組織規章擢升人才的作風，彈性的獎勵方式，養成《中國時報》記者們各求表現的個人主義。大多在中時待過的資深記者們都知道被老先生「叫上去」的意義等同加持了光環：

老先生找你上去越多次就表示，你在報社裡面那個無形的地位就會越來越高。你被叫上去，常常老先生就說，你今天這篇特稿寫得不錯，抽屜拿出一張 10 萬塊的支票，就這樣子。

（黃哲斌訪談稿，2008）

黃哲斌也在訪談過程提到中時與聯合不一樣的組織文化，

在聯合報的記者就像是在耕田，他們是農業部落，所以每一個人就

是一方田，中間會有幾坪公田，可是每一個人就耕自己那方田，偶爾去耕一耕公田，可是誰都不可以去耕別人的田。那中國時報編輯部是游獵社會，反正大家一起騎馬，衝出去就開始拔弓射箭……

這比喻足以顯見中時記者剽悍的個人主義與英雄主義風格，與聯合報家父長式的集體主義有很大的不同。這樣人治的組織文化，即便到了風光不再的「後余家時代」仍然存在，只是隨著報社經營狀況不善，無法再大方給予傑出記者高額獎勵金，但編輯與記者之間，仍維持互相尊重、充分溝通的平等關係。像高有智在訪談過程中也提及：

我覺得某些時候應該要給中國時報一些掌聲，因為他允許我們這樣的記者存在，不然早就被 fire 掉了(笑)。如果一個會在外面批評報紙的記者當然是愛之深責之切的記者，也是一部分在實踐批判精神的一個記者，我覺得是因為這樣的文化允許，某種程度是這樣的文化還鼓勵、支持這樣的記者，那我覺得這樣的文化就應該要被支持，就應該要被肯定。

(高有智訪談稿，2010)

黃順星(2008)也認為，對《中國時報》的記者來說，記者不是不能介入現實，但首先必須謹守新聞專業的分際，亦即無論個人觀點如何，但在新聞處理上仍必須維持中立，不違背事實，其充滿人治色彩的組織文化，使身處其中的記者感受到的不是冰冷獨斷的採訪守則，而是個人情感與理念的交融。

由此可知，《中國時報》的組織文化，深刻影響到組織內部工作者的作為，即便後來易主，在管理層次上變得相對嚴謹，在生產政治上更加險峻，但長達近六十年來淬鍊而成的組織文化與習氣，在時報人的身上仍可感受的到。這也是為

什麼在旺旺當家時期，仍時不時出現擦槍走火的報導，那是記者新聞價值與老闆領導權力的相互競逐過程。

不過，楊秀娟(2010)對新《中國時報》的研究裡也特別提到，蔡衍明對於新聞的干預除了不得罪政府的「負面表列」管理外，在其他新聞內容並無太多指導，因此採訪和編輯在其他議題上仍保有很大的自主空間，簡言之，只要不與老闆的政治目標相違背，都還有商量的餘地。

第二節 行動者的生存心態與資本

根據 Bourdieu 場域理論，場域內的行動者會根據他們所處的位置空間採取實踐策略。例如，在場域中佔有優勢地位的人會用某些策略來鞏固他們在場域中的位置，進而把對他們最有利的資本價值與分配的等級化原則，強加於其他行動者身上。而在場域中的被支配者，有的汲汲營營爭取具有較高價值的資本，以改善他們在場域中的位置；有的則漠視這些資本與場域的規則，遊走場域的邊緣；有的則積極研擬策略，善用現有的資本去顛覆支配者所定義的等級化原則，改變場域結構(古淑薰，2004)。

以本研究為例，當記者在既有的生產結構下，採取累積記者專業的策略，發揮其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之後，帶來的影響又將成為結構中的新條件，再次讓主體作用出不一樣的生存策略。五名調查採訪室記者，在踏入新聞場域前，因為各自生命經歷的不同，構成不同的生存心態，具體展現成新聞專業意理；踏入新聞場域後，又根據他們所處的位置採取不同實踐策略。若說何榮幸、高有智是屬於積極研擬策略的行動者，那麼郭石城與黃哲斌則偏向漠視場域規則，遊走場域邊緣的人，而謝錦芳是中規中矩、善盡本份。因此在加入調查採訪室後，在集體行動下的五人仍各自發揮了原本自身在新聞場域所累積的資本，也在調查採訪室中各自遇到不同的碰撞與激盪，從而有所轉化，再發展出不一樣的生存心態與策略。

一、何榮幸部分

(一)專業意理的形成與實踐

依據何榮幸的自我敘說，高中編輯校刊的經驗讓何榮幸奠定了將來「寫字維生」的志向，只是當時尚未確定是當記者或者編輯。大學進入台大社會系後，受到社會系批判觀點與校園風氣的啟蒙，何榮幸除了持續編撰校園刊物，也積極參與校園民主化運動，關注社會改革的激進面向。此時期影響何榮幸至深，有著崇高的社會理想與信念，並養成明確的社會改革意識，往後的「鼓吹者」的記者認同也是在此時期埋下種子的。

何榮幸在 1985 年進入台大就讀，那年台大校園發生了李文忠絕食事件，台大及各大專院校的大學生先後投入鹿港的反杜邦運動，全台從南到北開始發生組織性的校園抗爭，主要抗爭對象是校園的控制體系，主張校園民主，要求教官、政黨退出校園、保障校園言論自由及學術自由，這些議題牽引著何榮幸，領著他踏上了他的革命之路。此時期的何榮幸發揮他高中專長，在校園刊物上發表文章，用批判的概念丈量校園與社會上討論的議題，進行「紙上造反」，大學四年何榮幸就這樣穿梭於各類議題之間，反覆操練著叛逆的姿態。

校園之外的世界同樣風起雲湧，台灣社會運動開啟了接下來的黃金十年，創立了台灣歷史上首度的民主開放盛世，環保、婦女、勞工各領域蓬勃發展，民間充滿著生猛的改革力量。1985 年到 1986 年間，《人間》、《文星》、《南方》、《新新聞》等獨立批判性雜誌相繼創刊，西方激進思想藉由這些刊物烙印在年輕學子的腦海中，直到 1988 年報禁解除後，一些具有知識份子議論政治社會性質的新興報紙更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如《自立早報》、《首都早報》等。

解嚴前後時期的新聞媒體，多少展現了一種知識份子經世濟民的集體情懷，也因而吸引了九零年代離開校園的部分學運份子投入新聞界，這些懷抱著叔世精神踏入新聞產業的年輕記者，大抵都希冀自己能藉以春秋之筆，針砭時事、改變社會，何榮幸便是其中一員。曾有人將經歷此變動時代的人通稱為「學運世代」，

才剛掙脫威權時期的壓抑苦悶，學運世代的人們共同認知到自己是進步時代的推動者，因此存在著一種對社會的使命感，普遍擁有浪漫的革命情懷，兼具理想主義色彩，就如同古巴革命領袖切·格瓦拉的自述一樣：

如果說我們是浪漫主義者，是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份子，我們想的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那麼，我們將一千零一次地回答說，是的，我們就是這樣的人。

何榮幸就曾經自比為無可救藥的浪漫主義者與理想主義份子，他帶著學生時期建立起的社會改革意識踏入新聞業，對何榮幸來說，這不僅僅是把一份餬口的工作，而是可以推廣和實踐理想的革命志業，但同時何榮幸也注意到自己身兼「參與者」與「報導者」的衝突角色，即便作為一名「政策鼓吹型」的新聞記者，在新聞報導寫作上仍必須謹守客觀中立的專業道德。

(二)資本累積的路徑：

1.練筆、練筆、再練筆

初生之犢不畏虎的何榮幸，入行短短三年，就為了伸援同業發起連署請願書，並籌辦九〇一記者為新聞自主而走遊行，爾後更為了建立新聞工作者的專業自主意識，成立了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擔任第一屆記協會長，在報章雜誌上評論媒體問題，鼓吹媒體改革，靠著從校園內寫到校園外的一隻健筆展露鋒芒。

根據何榮幸自述，其評論功力是仿效新聞前輩司馬文武而來，何榮幸大學時期就有閱讀《八十年代》與《新新聞》等雜誌的習慣，到了《自由時報》當記者後更天天拜讀司馬文武的短評，學習那套化繁為簡、一針見血的「司馬文武式評論」。不放棄任何一個練筆的機會，除了以記協會長的名義在各大媒體投書媒體觀察評論，何榮幸更化名在網路上設置個人新聞台「記者偏見之斷垣殘篇」，不時發表個人意見或生活隨筆，在書寫制式化的新聞報導之餘，以較為感性的筆觸

抒發己見，或在網路上與人切磋交流。

擅長寫新聞評論，讓何榮幸擔任《自由時報》市政組組長後，負責撰寫「台北新空氣」的市政短評，到《中國時報》一年半後，就因為先前在報章雜誌累積的評論功力，受到老闆余紀忠肯定，特例擢升入中時筆陣，固定撰寫小社論。往後何榮幸在《中國時報》時常發表小社論、我見我思或新聞特稿，以他特有的平實卻精闢的筆觸發表見解，傳遞影響力。

2.找出理想與現實的交集

在還是新聞菜鳥與推動記協理念的期間，則是何榮幸突圍姿態的蛻變期。他不讓自己成為一個滿腔熱血的盲動者，而是深深把握住切·格瓦拉的另一句名言「讓我們面對現實，讓我們忠於理想」的精神，在創辦記協、推動記者自主運動的媒體改革行動裡頭，尋求成功達陣的最佳戰略。即便往後的記者職涯當中，何榮幸經常遭逢服從經營者意志與堅持記者自主的兩難困境，他依然採用務實的做法，建構出自己的一套尋求答案的方法論與態度。

對我來說，努力尋找理想跟現實的交集，並不代表放棄理想或不夠堅持；正好相反，尋找交集是為了讓理想有更多實現的可能性，避免一味高唱裡想而放棄應有的實踐與努力。

（何榮幸，2006，頁 52）

隨著新聞報業的整體環境頽敗，以及高度分殊化的產製流程導致新聞記者的勞工意識淡薄，資歷越來越深、職位也越爬越高的何榮幸，面臨報社經營的商業考量與記者專業自主的劇烈拉扯，何榮幸的處境更加艱難。調查採訪室的成立，或許正好給了何榮幸一個新的戰略方針，利用這塊新戰地，掀起一場主流媒體的自我改造戰局，誠如何榮幸自己所言，這是一項在主流媒體內「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反思實踐，目標則是創造更多實現理想的可能性。

二、高有智部分

(一) 專業意理的形成與實踐

根據高有智自述，在原住民部落擔任課業輔導老師時期，與大自然和原住民孩童的親近，發掘了自己內心深層那份對自然主義的崇尚，近身貼近原住民部落後，高有智看見處於社會弱勢的原住民面對資本主義剝削時的無力反擊，也看到台灣普遍存在的族群偏見與階級壓迫問題，因而召喚出他「想要為這群人做點甚麼」的念頭，這樣的信念讓他從動物系畢業後，轉念新聞研究所，再當上記者。

高有智是調查採訪室五人之中最年輕的，若以世代為劃分的尺度，他是調查採訪室裡唯一的「六年級生」，所面臨的是九零年代的社會運動的轉型期，逐漸由民主改革的政治議題轉向環境保護等民生議題。

1980 年，台電提出興建核四廠計劃，並於 1983 年完成貢寮鄉的土地徵收。此後，隨著核四預算案的解凍與審查，「核四廠興建與否」成為國內備受矚目的公共議題，並在 1992-1994 年間達到第一波高峰；除了大型的街頭抗議遊行，環保團體積極到各地、校園舉辦反核說明會、講習核電知識等活動，推動反核的啟蒙教育，大專院校學生更響應成立了「反核學生工作隊」，舉行「反核野火燎原」、「核四公民投票」等活動。

高有智在 1993 年北上就讀台大動物系，正好面臨了一波又一波的環保爭議。彼時的台大校園，經歷了八零年代末期台灣社會民主解放，以及學生追求自主的抗爭階段，已顯得自由開放，學生自治系統建置完成，各式社團蓬勃創立，高有智在這樣的環境中接觸了基督教團契社團，利用課餘到原住民部落充當課業輔導老師，誠如高有智自己的述說，透過接觸大自然，讓他拾獲內心的那份價值感：對環境的尊重與關注。因此大學時代，高有智不但參加了反興建核四遊行等相關活動，加入反核運動的行列之中，高有智也曾組織學生到台南七股反對濱南工業區開發案，抗議國家為了經濟發展而破壞在地生態環境與住民健康。

在一次又一次走出校園，參與社會運動的經驗裡，高有智逐漸意識到自己心

裡嚮往的是穿梭於街頭巷弄間的常民生活，而非科學實驗室內的嚴謹環境，在他轉換領域，入新聞界之前，他就清楚明白自己就是要站在弱勢的那一端，做一名「介入式」的倡議記者，而高有智在記者路上也始終堅持初衷，進到媒體後，持續關心弱勢與環境議題，在自己的位置上實踐他的關懷。

(二)資本累積路徑

1.蓄勢待發的沉潛耐力

2001年，網路原生報《明日報》、《自立晚報》相繼宣布停刊，《民眾日報》、《中國時報》報系則進行人事精簡，同年六月更爆發中時無預警裁撤中南編，引發勞資糾紛，傳統報業的經營困境浮上檯面。高有智就是在這一年踏入新聞圈，在《台灣教會公報》開始他的第一份正職記者工作。據高有智述說，那年媒體景氣低迷，媒體幾乎都在瘦身裁員，沒有釋出記者職缺，所以他先到《台灣教會公報》，隔年才順利考進《中國時報》。

如願進入主流媒體後，高有智自願分發到冷門的社團線，正因為是自己重視的路線與議題，高有智用盡方法提高報導的見報率。在等待主流媒體職缺的期間，乃至為不被重視的社福議題爭取版面的過程中，高有智更深刻體會到媒體大環境的動盪，也更能理解新聞產製流程的侷限性，因而高有智習得了一套生存法則，唯有隨時將自己準備好，蓄勢待發，才能在瞬息萬變的新聞界裡存活下去。

2.連結資源的方法論

根據高有智提及自己在新聞研究所時期的修課策略，和一邊擔任教會公報特約記者一邊進行學位論文的雙贏手法，可以得知，高有智學生時代便擁有統和手邊資源、善加連結利用的能力，而這能力也為他日後的記者職涯帶來加乘效應。

在高有智在教科文組負責跑社團線的兩年間，高有智除了做好一名記者該做的本份—認真經營路線—之外，也「研發」出各種攻佔版面的策略。當在新聞價值裡無足輕重的冷門新聞來到高有智手上，他能以不一樣的視角，捕捉出社團新聞中的精隨之處，再從看似不同領域的社福問題，做縱深的巨觀結合，提高新聞

的層次與重要性，得到報社編輯台的認同，繼而讓報導見報。

如高有智自己解釋，這樣的能力是研究所時期養成的，想以最節省成本最有效率的方式達成目標，就要懂得連結多方資源，開拓多贏局面；進入《中國時報》後，不論在先前的教科文組、政治組，或者後來的調查採訪室，高有智都徹底運用這項方法論，將報社長官眼中的新聞小菜調味成色香味俱全的獨家佳餚。

三、郭石城部分

(一)專業意理的形成與實踐

新聞科班出身的郭石城，在那個仍視新聞媒體為第四權的年代，憑藉對記者能仗義執筆的憧憬，毅然選擇就讀世新新聞編採科。1989 年，報禁解除隔年，郭石城進入省府報紙《台灣新生報》，雖然郭石城的第一份記者工作是在相對保守的官營報紙，但郭石城在新聞現場總是衝鋒陷陣，跑起新聞作風積極大膽。

在與郭石城的互動間可感受到他的俠義性格，不論是跑地方記者或是司法線記者，郭石城認為記者就該具備一言以興邦的影響力，揭露社會弊病，致力追尋真相，而從郭石城捨棄《台灣新生報》給予優渥待遇，堅持轉往《中國時報》發展來看，郭石城一直以保持熱誠、追求卓越來滿足自己心中的那股「新聞魂」。郭石城的自我詮釋裡頭，也不時流露出自己所遵從的傳統新聞學典範：客觀性(objectivity)、中立性(neutrality)、挖掘真實。

郭石城的新聞專業意理的展現在於他過往在新聞報導的選材上，以及對調查採訪室的想像：「調查某一個事件，也許你一整年做下來只有一個新聞事件造成震撼那就夠了，就是我最喜歡的那種味道」，郭石城認為新聞記者應該致力於揭露權力者的面具，代替大眾監督公部門弊端，但同時也不能喪失新聞該保有的人情趣味性。

(二)資本累積路徑

1.獨樹一格的獨家新聞

賴富山(2002)研究指出，地方記者間存有一種「唯我獨尊型」的記者，這樣的記者大多是主流媒體記者，不怕獨漏新聞，所以不和同業交換新聞，也不參與記者所組成的聯誼會，與同業往來純粹是禮貌性的人際互動，跑新聞單打獨鬥，在乎和消息來源的關係經營，認真苦幹挖新聞，因而寫出來的報導也極具鑑別度。郭石城正是此種獨行俠記者中的翹楚，以獨來獨往為樂，挖掘別人所不能挖掘的獨家新聞。

又因為報禁開放之後，各類型媒體的大幅增加，記者評價自身的參考固然仍以影響政策與立法面向為主，但被其他媒體跟進也成為多數記者認為最明顯可見的成就感，也是確認稿件影響力與博得同業認可的重要方式(黃順星，2008)，郭石城就因為單打獨鬥的跑新聞方式，獲取同業跑不到的獨家新聞，因此時常成為其他媒體跟進的源頭，從中累積出自己在地方新聞圈的領頭地位。

四、謝錦芳部份

(一)專業意理的形成與實踐

大學就讀外文系的謝錦芳，一開始是基於對攝影的熱情，才對新聞工作產生興趣，大眾傳播研究所畢業後順利考入《中國時報》。謝錦芳的記者職涯過程，除了前四年跑過其他路線，往後都待在財經路線深耕，由於財經報導較為嚴肅，多以數字、圖表等量化資料為報導憑據，而消息來源也多以財政主管機關或企業為主，路線調性的緣故，很難從字裡行間延伸出報導者的個人意志與立場。

但在二次金改爭議中，仍可從謝錦芳的堅持報導中看見她的新聞專業意理。根據謝錦芳闡述自己在二次金改爭議中的行動，以及她認為當記者應該擁有一份正義感，可歸納出謝錦芳對自己的記者角色認知偏向文獻中提及的「解釋者」(interpretative role)，在強調客觀性之餘，仍會在報導中加入個人詮釋，並非單純的資訊傳佈者，認為媒體的主要任務是守望環境、監督政府，不僅僅是呈現真實

而已。

(二)資本累積路徑

1.化「不可能」為可能的鋼鐵意志與膽識

謝錦芳跟其餘四人最大的不同在於，她很快就當上主管職位，也很快地在主管位置上經歷了人力短缺、與同報系的其他報紙協調新聞等挑戰。

謝錦芳所經營的記者路線，是四人之中進入門檻最高的，沒有任何財經相關背景的謝錦芳，靠著土法煉鋼式的自我補強、精進，擔下每一項看似不可能的艱難任務，然後盡全力地完滿達成。

五、黃哲斌部分

(一)專業意理的養成與實踐

黃哲斌的新聞專業意理的養成與實踐，就有如他職涯歷程般的百轉千迴，但仔細追尋探問之下，就能知道看似變動不羈的黃哲斌，其實打從一開始就沒變過，從一而終的擇善固執。

文藝青年期的黃哲斌，就立志要當一名經世濟民的記者，因此大學重考了三次，徹底貫徹了「老子我就是要念新聞傳播科系」的意志，但念了新聞系反而認清自己的「不適任」，轉往劇場、電影等藝術領域發展。黃哲斌從想當記者、不想當記者，卻又陰錯陽差地在新聞業待了十六年，記者職涯中數度動過求去的念頭，途中也曾靠著靈活的思維與文采，寫過唱片文案與網路趨勢評論，到最後以離職控訴媒體置入性行銷的猖獗，乍看之下，黃哲斌像個不甘安逸的過動兒，但從黃哲斌的自我詮釋中，仍然可以萃取出他生命情懷中的主基調。

黃哲斌雖不若何榮幸、高有智般地強調自己的新聞專業意理，或在報導作品中展現高度的個人關懷，但從黃哲斌跑社會新聞時期謹守與消息來源的份際，到他在中時電子報時期、調查採訪室時期的拒絕置入性行銷，都可看出黃哲斌性格上的道德潔癖與不可違逆的原則，他有他自己定義出的個人正義與倫理。也因如

此，從文藝青年到文藝中年，黃哲斌其實從未改變過他的初衷，只是在各個不同時期使用著不同的媒介與工具，去觸碰、去達成他的理想社會。

(二)資本累積路徑

1.有如超鏈結(hyperlink)的多元發展

社會記者時期的黃哲斌，如他自己所言，當熟知新聞產製的運作過程後，新聞報導所能發揮的文字空間有限，走過了最精彩刺激的經營人脈階段，黃哲斌對新聞採訪工作感到倦怠，採寫上手後想學編報紙，於是主動轉調編輯台。因為轉往後勤，黃哲斌有更多的時間拓展興趣，喜歡嘗試新鮮事物的他也因此被主管注意到，在一波人事調動中被擢升至中時電子報擔任責任主編，此後一頭栽進網路世界。

不斷變換工作內容與型態的黃哲斌，能編能採能寫，同時待過傳統紙本媒體與新興網路媒體，因此能巧妙掌握住這兩者的互補關係。看似跳 tone 的轉換，卻成為他保持新鮮感同時又增加經驗值的職涯資本。

2.掌握 Web2.0 的網路公民力量

黃哲斌是從電子報時期開始學習網際網路相關趨勢，並投身、組織網路社群，親身領受 web2.0 由下而上的公民活力，透過網路傳播，黃哲斌觀察到網路上議題發散的曲線圖，因此更能精準計算出議題擴散的路徑與速率，很多時候將主流媒體不重視的新聞議題發表於網路平台，經由社群串連與轉載，有時甚至能引起比主流媒體報導更大的迴響，達到公眾注意與討論的傳播效果。

第三節 當五人同在調查採訪室

當五名記者齊聚調查採訪室，各自帶著領域上所累積的資本，五位資深記者分別運用線上累積的專業知識，本著訓練多年的新聞鼻，發想新議題，發掘出切入報導的新角度，或者把之前在線上沒有時間和人力完成的報導再提出，因為五

名記者關懷和主跑路線有所不同，因此調查採訪室製作出的深度專題往往涵蓋的領域包羅萬象，而從這些報導其中能看出調查採訪室融合了五名成員的想法，透過每一次五人小組會議，從大家的提案與觀點，摸索出屬於調查採訪室深度報導的定義與實踐策略。

一、兩種專業意理的匯流

依據第二章文獻對專業意理的定義：「記者對於媒介功能與記者角色的信念系統，而這樣的系統是經過一段長時間的培養，內化為其製作新聞的指引。」透過自我敘說，研究發現這五名記者一致認同新聞媒介的主要任務是發揮「第四權」守望環境，也都流露出中華文化傳統知識份子的那份胸懷，但五人又分別展現出調查新聞學和公共新聞學兩派不同的新聞哲學。

林照真(2006)比較過調查新聞學與公共新聞學兩者背後社會哲學的差異，從美國新聞史的脈絡來看，調查新聞學意味著個人自由主義，而公共新聞學則反映了社區平等主義。

個人自由主義觀點下的調查報導，新聞工作者自居為揭發扒糞的「看門狗」(watch dog)，新聞角色在於代替大眾監督政府弊端，以及為大眾解析菁英之間的權力運作，因而傳統調查報導重視客觀性，報導的操作手法採用事實報導方式，是一種旁觀者的態度，報導者對被報導者是一種監督關係，揭發的負面訊息對社會是某種正義的實現，而記者在其過程中也能突顯專業倫體與技能。

公共新聞學則揚棄了傳統新聞學奉為圭臬的客觀性，完全介入被報導者所關切的議題，強調大眾的參與及問題的解決。其第一步就是要確立大眾能擁有參與政治等公共事務的機會，提供大眾與記者具有平等討論的機會，讓大眾從被動轉為主動，媒體中也不再只強調專家意見，更要增加讀者的聲音。

若將新聞專業意理化約為一道光譜，中立報導者與參與者分別在專業意理光譜的兩端(但這兩項專業意理並非互斥)，郭石城與謝錦芳在報導作品與訪談敘說

中所呈現出的專業意理較靠近中立報導者，他們認為記者是資訊告知者與詮釋者，報導目的是傳達事實給閱聽大眾，郭石城在訪談過程中透露出其對深度報導的想像較偏向調查新聞學—代替大眾監督政府弊端以及揭開權力者的面具；何榮幸、高有智與黃哲斌則視報業為大眾的代表者，政府的批評者，較有倡導式、介入式的作為，在他們深度報導的想像中，不再只有學者專家的意見，更增加了一般公民的聲音，屬於公共新聞學的派別。

從調查採訪室成立到目前所做的深度專題報導與成員受訪時的言談來看，其報導所呈現出的新聞專業意理融合了五個人對深度報導的想像，既包含了即時性的揭弊調查報導，也包含了貼近公民生活的深度議題報導，匯聚了傳統調查新聞學與公共新聞學兩種專業意理，唯在呈現比重上失衡。

成立三年來，調查採訪室斷斷續續策畫出的調查報導多屬社會議題式的深度報導，但礙於策略上的選擇(不直接碰撞組織敏感議題、先求穩固單位價值)與執行上的困難(人力、時間、經費不足)，多側重公共倡議式的專題報導，著眼於公民社會關注的議題，諸如環境保護、農業再生、族群文化、另類媒體發聲等，這些報導內容雖然不直接挑戰政治經濟結構，並非傳統揭露式的調查報導，但這些倡議式報導傳達了對政府制度、政策不滿的公民，如何透過自我行動應對不環境的不健全。同樣是挖掘的動作，藉由挖掘出小人物的作為也能點出當前台灣社會的景況與缺漏，即使是倡議式的深度報導，也能間接達成調查式報導的撼動效果，作為傳統調查新聞學與公共新聞學交融後的展現。

二、資本累積與實踐策略

(一) 樹立王牌(trump card)模式

五位調查採訪室記者，行使的是一種特許自主權，意即專家記者、明星記者對新聞判斷有其獨立性，再加上他們在新聞組織皆屬於資深記者，累積了不少採訪經驗與路線人脈，因此當這五人已屬於各自路線上的秀異記者，聚集在一塊兒，組成一個工作團隊，更容易樹立出一種「王牌(trump card)模式」。

調查採訪室除了援用五名成員各自累積的資本，為報導帶來專業品質與公信力，更因為「我的小革命」專版陸續獲得社會光明面新聞獎、國際扶輪社公益新聞金輪獎、第二屆學學獎等肯定，小革命系列集結成書後，並得到總統馬英九的響應，同時獲得中時開卷版 2009 年度好書獎（美好生活類）；2010 年「民國久久，台灣久久」大型專題更獲得吳舜文文化專題新聞獎，外界的關注討論與肯定，讓成立近三年的調查採訪室累積了象徵資本，其產出的作品有一定的品質保證與社會關注度，王牌地位由此確立。

在調查採訪室的價值彰顯出來後，報社賦予了調查採訪室更多的專業自主性，陸續將大型專題的任務交由調查採訪室策畫、進行，與調動其他路線記者支援，調查採訪室也持續推出新的深度專題。而以往調查採訪室單位面臨踩線、擠稿，或報導能見度低的尷尬，也隨著調查採訪室在編採會議上的遊說，在報紙站得一席版面位置，讓調查採訪室免除以往運作狀況不穩的窘境。

（二）用軟議題包裹硬理念

由於組織鮮明的政治立場，及調查採訪室的單位價值尚未建立，調查採訪室成立之初即自我定調，選擇不碰觸兩岸關係、政治議題，而是在有限度的範疇內激進，選擇報導社會進步趨勢與文化議題。

在這些看似「軟」議題的報導裡，調查採訪室成員們其實是有意識地夾帶「堅硬的」的理念。以（我的小革命）報導非獨立媒體與媒體工作者為例，就是隸屬主流媒體內單位的調查採訪室，提醒著主流媒體(包括《中國時報》)扮演公共領域的重要性，調查採訪室以一直繞道的迂迴作法，批判自我的同時也砥礪自我。

（三）建置一套與組織互動的 SOP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除了高有智外，調查採訪室其餘四人年資相仿，也都擔任過主管職位，因此即使何榮幸掛名為主任，但權力是五人共享，報導由五人共同討論、分工、負責，單位的權力運作較類似於平行組織，當調查採訪室與組織有所互動、協商，也是在採納五人的意見後再推派出何榮幸代表發言。

以往當個別記者若與編輯室產生衝突，比如稿子不被採用或修改成偏離原意，在產製下游的記者至多只能向基層主管或中階主管反映，甚少能與做最後決策的總編輯直接對話，但直屬於總編輯底下的調查採訪室，五人達成共識後，對外直接對報社高層表示意見，進行溝通。

與組織互動的過程中，不但記者採訪時專業自主性有所提升，即使到了編輯室，由在報社內發言已有一定份量的主任何榮幸作為調查室對外的發言代表，在編採會議上負責向總編輯與報社其他組別「推銷」作品，爭取版面；到了編輯作業上，從標題、內文到美工編輯，都是由身兼報社副總編輯的何榮幸做最後的主控與審核，因此在調查採訪室版面左下角標出責任編輯是何榮幸的名字，別於一般記者交稿後，等同於將修改稿件的權力交給編輯，調查採訪室所生產出的報導，到產製的最後階段都是由調查採訪室「自己人」把關放行。



第六章 結論：當行動者集結歸來

第一節 研究結果與討論

張文強(2009)認為，組織控制會因「行動者的缺席」而得到強化，在媒體不景氣之下，新聞工作者已進入以生存為主的工作模式，在結構下程度不一的自我設限與自我揚棄。但張文強仍樂觀地提出，在以困境為反思線索之上，我們應該考量個人手邊資源與限制，具體發展出屬於自己的解題策略。本文的最終目的就是想找出一個解題策略，雖然各媒體組織的狀況不同，每位新聞工作者的際遇亦不同，但本文仍然希冀藉由新聞工作者的實務軌跡，作為其他新聞工作者或產業後備軍的投入新聞場域的動能。

但首先，我們必須自我探詢：「我有成為一名行動者的意願嗎？」。在擁有了成為一名行動者的決心後，才能往行動的路上啟程。而以下所討論的則是路上所需的裝備：

(一)新聞價值的位移，記者認同的轉換

根據張文強(2009)的論點，站回行動者位置是基本動作，當下的新聞工作者還需要在工作中建立自我認同。Rao(2003)則主張，所謂的「機構」並不單指涉包含特定權力安排、限制個人行動的制度性設計，它更涉及一套指引實際行為的信仰，組成行動者的自我認同。換句話說，想要進行機構性的改變、挑戰主流，不只是直接挑戰結構而已，更需要採取某種對應的「認同運動」，設法在主流內導入非主流的線索，造成新舊認同並存，最後形塑出新的認同。

以《中國時報》調查採訪室為例，策畫出主流媒體較少關懷的專題便是在工作上建立一項新的認同，有別於以往例行路線的產製步驟、寫作格式及關懷視角，也不同於傳統深度報導的揭弊、監督導向，而是將報導焦點匯聚在公民上，隱含著公共新聞學的精神。

黃浩榮(2005)對公共新聞學下定義，他認為公共新聞學是一組實踐性的新聞理念(practical journalistic)，目的在於重建讀者與社區、讀者與媒體、媒體與社區三方的互動聯繫，從而喚醒居民公民身分的覺醒與對公眾事務的關懷。調查採訪室成立以來，報導的執行過程雖與公共新聞學的操作方式略有差異，但卻與公共新聞學擁有相同的理念，就是由主流媒體承載、傳達出一種「由下而上」的公民力量，走出新聞菁英化，以社會中各領域的人物設定公眾議題、激發公共討論，甚或將議題推向政治系統，獲取政治人物的關注。

在報導關懷轉向的同時，記者在其中也勢必歷經了角色認同的轉化，以往新聞記者的典範在於接露弊案的監督者，如水門案，但在多元價值競逐時代，未必只是需要崇尚挑戰政治經濟結構的解放政治，應該也同時轉向認同「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以解放為前提，但更為強調生活方式的選擇，面對自我如何在不同的生活方式選擇中做抉擇。

(二)專業的追尋，資本的累積

在第二章文獻部分，爬梳了記者自主權的相關概念，Curran(1990)提出相對自主權(relative autonomy)與特許自主權(licensed autonomy)，他認為所謂相對自主權，是指記者所擁有的自主權，是基於他在組織中的權力、地位，所以他可以聯合路線上的同業，決定那則新聞要發、那則新聞不發，以擺脫報社組織的干預。

在本文裡面，五位調查採訪室記者行使的則是一種特許自主權，意即專家記者、明星記者對新聞判斷有其獨立性，加上在新聞組織的年資久、累積不少採訪經驗與路線人脈，呈現一種「專業壟斷」，樹立一種「王牌模式」。若以一種知識角度解釋，隨著個人經驗累積的特定採寫編輯技巧，或與眾多消息來源有關的路線知識，這些秘笈式的知識成就了個人資本累積的不可替換性，再轉換成記者個人資源，形成一種專家權力(expert power)，也就是當記者懂得掌握和運用權力的「機緣」，以及在新聞場域中累積資本，並利用資本研擬出各項策略，才能決定

記者在新聞場域內所能佔據的位置以及與他人/組織的競合關係。

五個人在踏入新聞場域前，皆有相當的文化資本(如學歷)。郭石城、黃哲斌、高有智三人擁有新聞系所的背景，在學校期間透過實習等方式，對編採作業、新聞生態已有一定的認識；而何榮幸和謝錦芳雖非新聞科班出身，但社會學的巨觀思維讓何榮幸能以不同視角報導、評論時事，而謝錦芳則是以外語優勢取得採訪國際財經題材的機會。

進入新聞場域後，在不同新聞路線上，五人依據自己心中對新聞專業意理，樹立跑新聞的規矩與記者形象。五人也根據自己路線的不同生態，與採訪來源互動，從中累積社會資本，例如跑過社會線的郭石城和黃哲斌，都習得了與消息來源搏感情的互動方式，獲取消息來源的信任，而跑財經線的謝錦芳，以專業形象令採訪對象折服，願意提供獨家新聞給她；跑政治線和社福線的何榮幸與高有智也都提到，從報導中展現記者專業與個人信用，是提升報導能見度的入門磚，也是開始累積象徵資本的第一步。

記者透過專業智能所累積出的象徵資本，通常意味著報導的品質、公信力與影響力，新聞場域中有卓越新聞獎、吳舜文新聞獎、曾虛白新聞獎等證明記者報導品質的獎項，而透過其他媒介的轉載、讀者的迴響討論，乃至於政府決策的轉彎，也能看出一篇報導所帶來的影響力。像何榮幸與高有智就曾獲得過新聞獎項的肯定，郭石城的報導也常為其他媒體跟進，黃哲斌的文章則因多觸及網路趨勢，也常在網路社群間轉載、流傳，引發討論。

文化、社會、象徵三項資本彼此間又可交互累積、挪用，而這三項資本，皆能再轉化作為記者的抵抗資源，當記者利用專家知識資源、職場地位以及良好的關係資源，往往能在老闆的底線內提高自己的專業自主權。

簡言之，就是當新聞工作者在新聞場域中累積的資本越高，越懂得如何集結抵抗組織的資源，便能採用更為多元的策略。但誠如本文一再強調的，本研究關注的並非停留在個人抵抗的層次，而是一種正規的積極超越，試圖在主流媒體內

找出記者如何透過資源的集結，突破現狀的動態行為。

(三)將個人提升至集體層次

過往探討記者與組織互動的文獻，大多停留在記者個人層次上。個別記者主要可藉由累積專業知識資源、職業地位資源以及良好關係資源，獲取與組織抗衡的位置。這些資本的累積固然是一名菜鳥記者成為老鳥的充要條件，但本文在一開始便強調，本文所關注的並非記者如何運用一己之力的「平民策略」，而是記者如何集結資源，在正規途徑積極尋求超越。

又當我們理解到新聞工作者是在確保飯碗、期待升遷、朋友義氣、效忠長官、親情倫理等脈絡中執行新聞工作，我們需要體察到新聞工作者在個人行動中所涉及到的情境倫理，過去期待單一記者個人的反叛行動，放在現今的環境脈絡底下，難免過於高估與苛求個人能動性的展現。當勞動意識在記者心中難以凝聚成型，普遍記者不熱衷參與工會，高舉專業主義時，也許改為集體的專業作戰，也不失為減低個人承擔的一種方式。與其去要求記者養成勞動者意識，團結反抗資方，倒不如增強記者們在工作上的連結度，形塑出一種集體承擔工作表現的意識。像調查採訪室以集體型式的策畫專題報導，雖然各自分工負責主題，並且全程參與新聞產製過程，當有必要與報社高層溝通協調時，則是以集體為單位，進行意見的協商，在「團結力量大」時某種程度也分散了個人承擔的風險。

這五名記者，在成長過程中受到不同刺激，奠基於個人人格特質與關懷，發展出對記者角色的認知與想像，他們在記者線上，主動累積專業知識，在消息來源面前博得信任，堅持新聞編採自主性和獨立，並且展現原有的積極主動性格，和對於新聞的信念。因此，人的能動性和覺醒，除了個人努力之外，外在環境（包括成長與就學、職場環境）與資本累積(專業知識、名聲的建立)給予的引導或刺激也非常重要。

在艱困的時代，我們仍需要信仰，需要勇氣與熱情，更需要團結的力量。日

本小說家村上春樹在獲頒耶路撒冷文學獎的感言：

我們每個人在名為「體制」的堅實之牆之前，都宛如脆弱的雞蛋，
「體制之牆」太高、太堅硬，也太冰冷。我們唯一的勝算，就在信仰「每
個人都是無可取代」，以及「將個別靈魂結為一體」後得到的溫暖。

唯有將個別靈魂結為一體，才有走出黑暗的可能性。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生命史研究需要深入理解個人歷史、所處社會情境和相關影響因素。因此本研究僅以數次訪談和受訪者著作，容易忽略或簡化影響因素。針對此一限制，研究者盡力閱讀五位記者進入新聞界後的報導作品，理解這群人在進入調查採訪室前後時期的行動軌跡，掌握更多有關他們這群「人」的思想、情感。

記者因為工作特性，因此口語表達非常俐落順暢，但也會發生生命史研究限制中，受訪者「選擇性記憶」和美化過去的缺失。另外，因為生命史是研究者和受訪者共同建構出來的，因此受訪者也會斟酌是否回答，以及如何回答較為私密或敏感的問題，這也是生命史研究無法避免的限制。

為了彌補這一限制，研究者透過不斷將訪談稿和歷史文件交叉檢核、以及詢問不同受訪者對彼此的看法，來獲得更完整的資訊。不過仍有不足，將來研究需要更縝密的透過交叉檢核、新聞文件的內容分析、相關人物訪談來彌補限制。

又由於本文立基於受訪者的主觀經驗陳述，所得結果無法如量化研究一樣，推論至其他個案，工作者的施展力與在不同的媒體組織文化下也各有不同，因此本文的實踐軌跡，只是個別案例的呈現，並不能擴展解釋。

不過，本文雖然有研究樣本的限制，Riessman(2008)卻認為，精彩和長久的理論，往往是對少數個案進行仔細地觀察，從中累積而發展出來；胡元輝提到，談新聞應著重「具體情境的倫理課題」，而非「抽象層次的倫理學說」，換言之，當我們論及當代新聞工作者的困境與出路，應該從媒體採編、經營的結構現狀思考突圍之道，才能將媒體中的個人解放出來。

而本文關注的是在採取隱微抵抗策略以外，還能以一種正規路線在組織中爭取主體實踐與能見度的新聞工作者，試圖在組織權力越漸綿密散佈之下，尋找一種積極超越的可能性。因而從調查採訪室五名記者職涯故事裡所擷取的養分，或許能做為解放新聞工作者的土壤。

但作為更全面的實務探究，本文建議，未來可以其他媒體單位的新聞工作者為研究對象，作為橫向的交互比較與持續深耕。或者，後續研究可採取長期「參與觀察法」，進入受訪者的工作與生活場域，更能掌握受訪者生命軌跡和轉變的脈絡性。

最後，關於黃哲斌的離職，本文以黃哲斌離職前接受訪談的一段話作為註解，

並不是所有電影都會有個 Happy Ending。你有看過一部好萊塢的電影叫做七個畢業生嗎，很久以前的電影，每一個人其實都有他的苦惱，都有他的開心跟不開心的地方，那重點是在於說每一個人在這些開心跟不開心之外大家都還各自前進，發展他們的人生，這其實也是一個很棒的角度啊。

(黃哲斌訪談稿)

不管是選擇離開的人，還是選擇留下的人，每一個人因著自身有限的資源，踏往前進的路上。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書籍

丁興祥、張慈宜、賴誠斌等譯（2002）。《生命史與心理傳記學—理論與方法的探究》。台北：遠流。（原書 Runyan, W.M. (1982). *Life histories and psychobiography: explorations in theory and metho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王天濱。（2002）。《台灣新聞傳播史》。台北：亞太圖書。

王麗雲（2000）。〈自傳/傳記/生命史在教育研究上的應用〉，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編《質的研究方法》，頁 265–306。高雄：麗文文化。

中華民國新聞年鑑（1991）。台北：中國新聞學會出版。

江文瑜（1996）。（口述史法）。胡幼慧(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與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

李金銓（2004）。《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香港：哈佛大學出版社。

李金銓（主編）（2008）。《文人論政：民國知識份子與報刊》。台北：政大。

李猛、李康譯（2009）《布赫迪厄社會學面面觀》。台北：麥田出版。（原書 Pierre Bourdieu and Loïc J.D. Wacquant.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UK : Polity Press.）

何榮幸（2001）。《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台北：時報出版。

何榮幸（2006）。《媒體突圍：2005 新聞獎大滿貫的幕後故事》。台北：商周出版。

何榮幸、黃哲斌、謝錦芳、郭石城、高有智（2009）。《我的小革命》。台北：時報出版。

何榮幸、黃哲斌、謝錦芳、郭石城、高有智、楊舒媚（2011）。《我的小革命：顛

覆主流》。台北：時報出版。

何榮幸、黃哲斌、謝錦芳、郭石城、高有智（2011）。《我的小革命：永續生活》。台北：時報出版。

林志明譯（2002）。《布赫迪厄論電視》。臺北：麥田出版。（原書 Bourdieu, P. (2002[1996]). *Sur la television suivi de L' Emprise du journalisme. Liber-Raisons d' Agir.*）

林照真（2006）。《記者，你為什麼不反叛》。台北：天下雜誌。

吳芝儀譯（2008）。《敘事研究：閱讀、分析與詮釋》，嘉義：濤石文化。（原書 Lieblich, A., Tuval-Mashiach, R., & Zilber, T. [1998]. *Narrative Research: Reading,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California : Sage Publications. ）

邱天助（2002）。《布赫迪厄文化再製理論》。台北：桂冠圖書。

胡幼慧、姚美華（1996）。〈質性研究的分析與寫成〉，胡幼慧（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與本土女性研究實例》，頁 159-170。台北：巨流。

張文強（2009）。《新聞工作者與媒體組織的互動》。台北：秀威。

張錦華（2002）。《女為悅己者瘦？媒介效果與主體研究》。台北：正中。

高宣揚（2002）。《布爾迪厄》。台北：生智。

孫智綺（2002）。《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台北：麥田出版。（原書 Bonnewitz, P. (2002[1997]). *Premieres lecons sur La sociologie de Pierre Bourdieu by Patrice Bonnewitz.*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畢恆達（1996）。〈詮釋學與質性研究〉，胡幼慧（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與本土女性研究實例》，頁 27-44。台北：巨流。

黃浩榮（2005）。《公共新聞學：審議民主的觀點》。台北：巨流。

陳順孝（2003）。《新聞控制與反控制——「記實避禍」的報導策略》。台北：五南。

陳筠臻譯（2009）。《媒介組織與產製》。台北：韋伯文化。(原書Cottle, Simon(ed.),(2003).*Media Organisation and Production*, London: Sage)

舒詩偉、許甘霖、蔡宜剛譯(2002)。《行動者的歸來》。台北：麥田。(原書 Touraine, Alain., (1984). *Le retour de l"acteur*. France: Fayard.)

陳國祥、祝萍（1987）。《臺灣報業演進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

舒嘉興（2001）。《新聞卸妝：布爾迪厄新聞場域理論》。台北：桂冠出版。

楊大春（1995）。《傳科》。台北：生智。

楊中芳（2001）。〈有關關係與人情構念化之綜述〉，楊中芳(編)，《中國人的人際關係、情感與信任》，頁 3-25。台北：遠流。

賴光臨（1980）。《中國近代報人與報業》(上冊)。台北：台灣商務。

學位論文

李秀俐（2004）。《擁抱艷陽天:一位國小女性總務主任之生命史》。明道管理學院 教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祖舜（2004）。《擺盪在政治與專業之間：報紙政治記者對新聞實務與專業角色的認知》。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李筱雯（2004）。《好新聞？好生意？- 台灣報業生產政治的轉變》。國立政治大學 新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呂美慧（1998）。〈從攻城到圍城：一位邊緣教師之生命史敘說研究〉，《花蓮教育大學學報》，26：77-99。

林立珩（1999）。《由勞工意識看女工就業至關廠的歷程經驗》。 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韋任（2003）。《收視率控制與電視新聞工作者的抗爭—以 TVBS 報導《老少配》與《薛楷莉》案為例》。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淳華（1996）。《新聞記者自主權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佩玲（2005）。《商業化新聞操作下的自主空間：記者的反抗策略》。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古淑薰（2004）。《台灣電影生產場域分析，1998-2003》。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邱鈺婷（2006）。《台灣電視記者一窩蜂新聞產製下的死結與活路-以重大社會事件報導為例》。政治大學廣播與電視研究所碩士論文。

師瓊璐（1999）。《跨越生命的長河—三位國小女性教師的生命史研究》。台東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凰婷（2007）。《傾聽生命之歌－儲備教師的生命敘說》。台東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許宏儒（2004）。《Bourdieu 文化資本的思想在教育機會均等議題上的闡釋》。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陸燕玲（2001）。《從「名門正派」到明教教徒？—台灣《壹週刊》新聞工作者的調適與認同》。台大新聞所碩士論文。

康萃婷（2002）。《天人之際：將團少年之生命史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科佃（1995）。《新聞從業人員離職傾向研究》。私立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雪慧（1993）。《台灣報社的生產政治：一個腦力勞動控制的研究》。台大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雅琳（1993）。《報社記者與編輯角色期望之研究》。文化大學新聞學系碩士論文。

陳素鳳（2003）。《不再下海-老船長的生涯轉折故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曾春榮（2003）。《個教育壓力團體的組織生命史研究－以人本教育基金會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順星（2008）。《記者的重量：台灣政治新聞記者的想像與實作 1980－2005》。世新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論文。

黃義書（2004）《新聞產製場域中的攝影記者－認知、角色、專業權力及生存心態分析》，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志弘（1991）。《臺灣地區報社總編輯職業角色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新聞所博士論文。

楊秀娟（1989）。（我國新聞從業人員專業化程度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秀娟（2010）。（報業組織溝通與競爭分析--以中國時報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論文。

楊順美（2002）。《市場導向與媒體組織結構下的新聞專業-以台灣無線三台晚間娛樂新聞為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智慧（1996）《報紙社會版編輯與社會新聞路線記者職業角色認知之研究》。銘傳管理學院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管婺媛（2008）。《台灣 1980 年代《自立晚報》社會運動線記者的專業意理形成與實踐》。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蔡士敏（2008）。《自立事件核心記者的生命故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蔡佩玲（1990）。《台灣地區童書出版社總編輯職業角色之研究》。台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蔡菀瑩（2007）。《資深新聞工作者的處境分析》。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蔡瑞君（2002）。《傾聽我們的聲音--三位國小教師的自我生涯歷程敘說分析》。

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賴富山（2002）。《地方記者人際傳播之研究—以台中縣黨政新聞路線記者為例》。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蕭蘋（1989）。《環保記者專業意理及其影響因素之研究》。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鐘宜杰（2005）。《舞影者：台灣戰後攝影記者習癖與品味的形構》。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鍾秀鳳（2003）。《不只是彩虹：一個骨癌孩童之生命史研究》。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期刊與報章雜誌

李猛（1999）。〈福柯與權力分析的新嘗試〉。《社會理論學報》，2(2)：375- 413。

俞旭、黃煜（1997）。〈市場強勢典範與傳媒的倫理道德—香港個案之研究〉。《新聞學研究》，55：224-243。

高有智（2010）。（記者這一行—我的記者生活筆記）。《新使者雜誌》，122：50-53。

徐蘊康（2001）。（中時、聯合兩大報系的吸金大法）。《商業週刊》，698：109。

陳免（2008）。（中時唱旺台灣 蔡衍明下達擁馬三指令）。《今週刊》622期。

動腦雜誌編輯部（2003）。（台灣媒體專輯「報紙篇」）。《動腦雜誌》，327：38-43。

黃月純（2001）。〈生命史研究在成人教育上的應用〉，《成人教育學刊》，5：219-247。

黃結梅（1998）。〈福柯的啟示：策略性模式的權力分析〉，《社會理論學報》，1(2)：327-348。

熊同鑫（2001）。〈窺、潰、餽：我與生命史研究相遇的心靈起伏〉，《應用心理研究》，12：107 – 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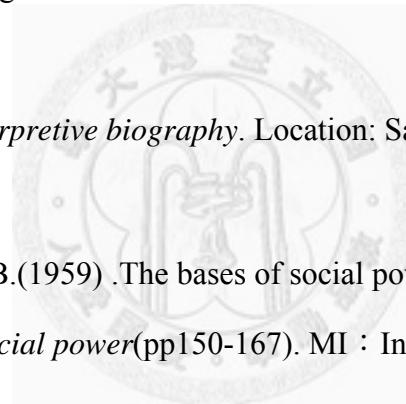
謝慧鈴（2003）。〈《蘋果日報》在台灣發行紀實—「狗仔大亨」黎智英挑戰傳統辦報理念〉。《新華澳報》。2011年4月6日，取自
<http://www.waou.com.mo/detail.asp?id=3496>

英文部分

Breed, W. (1955). Social control in the newsroom, *Social Force*,33,326-355.

Borden, L. S.(2000). A model for evaluating journalist resistance to business constraints.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15(3),149-166.

Curran, J.(1990). Culturalist perspectives of news organizations: A reappraisal and a case study. In M. Ferguson (Eds), *Public communication: the new imperatives* (pp114-134). London: Sage.



Denzin, N. K. (1989). *Interpretive biography*. Location: Sage Publications.

French, J. R. P.& Raven, B.(1959) .The bases of social power. In D. Cartwright and A. Zander(Eds) ,*Studies of social power*(pp150-167). MI : Instiute for Social Research.

Gans, H. J. (1979). *Deciding what's news*. NY: Vintage Books

Garnham.N&Williams.R(1992[1980]).Pierre Bourdieu and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2,17-26.

Johnstone, John W.C. and Edward J. S. and William W. B. (1976). *The news peopl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Merton, R.K. (1968)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 Free Press.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Pierre, Bourdieu,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ohn G.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9). Social space and symbolic power. *Sociological Theory*, 7(1), 14-25.

———(1990a). *The logic of pract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b). The intellectual field: A world apart, in *In Other Words*(pp.140-149).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c). The corporatism of the universal: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 in the modern world, *Telos* ,81,99-110.

———(1993b).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or: The economic world reversed. *Poetics*, 12(4-5), 311-356.

Pierre Bourdieu and Loïc J.D. Wacquant.(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UK : Polity Press.

Weaver, D.H. & Wilhoit, G. C (1986)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A portrait of U.S. news people and their work*, bloomington, IA: Th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White, D.M. (1950). Gatekeeper. *Journalism Quarterly*, 27,383-390

附錄一：訪談題綱

研究問題一：進入新聞場域的背景、專業意理的形塑過程	
記者歷程	成為記者的經過，媒體單位與採訪路線的選擇
	認為新聞應該發揮什麼影響力，新聞工作對自身的意義為何
	進入媒體後，在新聞工作中如何實現自己心中的專業意理
	是否考慮過跳槽或轉業？若有，是哪些因素萌生離開念頭？
場域背景	描述進入新聞界前後的社會風氣和時代氛圍
	是否感受到新聞生態的轉變，若有，轉變為何
研究問題二：這些記者在各自的條件限制下，如何累積、掌握資本，並發展出自己與組織的一套互動策略？	
資本累積	如何在日常工作中得到自我肯定？
	媒體工作生涯裡，最大的成就感和挫折感是什麼？
	新聞工作經歷累積了自己哪些歷練和專業？
抵抗策略	在新聞工作上，與組織有所衝突的情況通常是什麼
	當與組織或主管指令發生衝突時，如何應對？
	是否感受到新聞資歷越深或較受組織賞識的記者，擁有較大的新聞自主權？
研究問題三：進入調查採訪室之後，如何繼續實踐新聞專業意理？如何以集體為單位與組織互動？	
以調查採訪室為單位	進入調查採訪室的過程
	在製作專題的過程中，是否曾經與報社有過衝突？在哪一環節最容易產生衝突？面對意見相左時，如何化解？
	比較進入調查採訪室前後的工作型態與專業自主權

	在爭取版面與經費上，調查採訪室如何與報社、其他組別互動
	認為這次的調查採訪室和過去的調查採訪室有無差異之處？



附錄二：訪談時間與地點

受訪者	訪談日期	訪談地點	訪談時間
何榮幸	2008.12.22	台大新聞所	兩小時五分
	2010.03.06	萬華時報大樓	三十四分
	2010.03.15	星巴克公館門市	一小時十八分
	2010.12.18	萬華華西街兩喜號	三十七分
高有智	2008.12.28	台大新聞所	一小時三十分
	2010.10.15	星巴克士林門市	一小時十八分
郭石城	2010.03.23	萬華時報大樓	兩小時十分
謝錦芳	2010.04.15	台北車站雲門咖啡	五十六分
黃哲斌	2009.01.07	迪昂咖啡驛站延平店	兩小時十五分
	2010.11.09	星巴克遠百門市	五十四分
	2010.11.29	Rufous 咖啡館	一小時三分